

19 14

香山文化简论

王远明 胡波 著

责任编辑：麦汝祥 甘晓星

装帧设计：文 熙 李启锐

香山文化简论

王远明 胡波 著

中山文史第 60 辑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香山文化简论

中山文史第 60 辑

广东省一次性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证粤内准字 2007 第 0186 号

主办单位：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单位：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中山文史编辑部

开本：850×1168 毫米 印张：6.5 字数：12 万字

出版日期：2007 年 12 月 印数：1—2500

本书系 2006—2007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07 年 12 月 广东·中山

目 录

第一章 香山文化导论.....	1
第一节 香山文化的涵义.....	1
第二节 香山文化的内容.....	9
第三节 香山文化的特点.....	41
第四节 香山文化的属性.....	50
第二章 香山文化的成因.....	60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62
第二节 历史社会环境.....	79
第三节 发展变革动因.....	91
第三章 香山文化的嬗变.....	115
第一节 香山社会的发展.....	115
第二节 香山文化的演变.....	123
第四章 香山文化的传承.....	144
第一节 交流与融合.....	145
第二节 传承与创新.....	173
第五章 香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182
第一节 价值表现.....	186
第二节 价值实现.....	197

附录一：香山文化显芳华

——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205

附录二：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

王鲁湘对话香山文化..... 222

第一章 香山文化导论

第一节 香山文化的涵义

何谓香山文化?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地域文化。

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古今中外学术界均没有统一的看法。有时指知识,如学文化、文化人、文化水平等,有时指意识形态,如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伦理、道德、信仰、习俗等精神层面的事情。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一般与文治教化联系在一起,或与武功对称,或与自然科学对应,如“观乎天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都含有道德、精神、思想文化的意义。近代文化概念是海外的舶来品,与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意义不同。

西方的“文化”,源于拉丁语(culture),含有耕耘、掘种

土地、改良土壤的意义，后被引申为凡经人的耕耘、改造、劳动所获的基本生活所需之物，都含有文化的意义。到了近代，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爱德华·伯纳特正式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指出了规范、价值、信仰和表意象征符号四个要素，而且突破了以前将“文化”本体视为单一性实体的思维框架，使人们开始把文化看作是有着不同范畴的复杂的实体。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不过是人类的有组织的行为，并根据这一定义将文化范畴划分为“物质底层”、“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三大基本因子，在此基础上又细分为八个方面，即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和宗教、艺术、娱乐。^②

近代中国人在借鉴西方关于文化的定义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别和三层次之分。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具体而言，广义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

^① E.B.泰勒《原始文化》，1871年英文版第1页。

^② 陈山：《痛苦的智慧——文化学说发展的轨迹》，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内容：首先是物质层面，即物质文化，包括人们的生产、生活所需衣、食、住、行、工具、用品、建筑等人工制造的实物；二是制度规范层面，或称规范文化，包括社会组织、礼仪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形式、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三是精神层面，或称精神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情感、意识、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知识等。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文化是个又大又广的概念，它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由于人类创造文化的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和所处环境和条件的复杂性，文化在形态上又是多元的，结构上也是复杂的。除了按层次将文化分为三个大的层面外，还可以根据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形式与内容、时间与空间等，将文化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按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许多类型，如游牧型渔猎型、农耕型、工商型等；按条块又可分为地域文化和领域文化。地域文化是按地块分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以地域特点形成的文化，是大文化中的一种。领域文化是按领域系统或学科划分的，它是一种新兴学科，是文化学和具体学科领域交叉渗透的产物。^①地域文化根据其形成的特点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如以古代国家概念形成的地域文化，有齐文化、鲁

^① 黄龙保等编译：《领域文化·序言》中国盲文出版社 1988 年第 2 页。

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等；有以自然条件特点为标志形成的文化圈，如草原文化、高原文化、绿洲文化、泰山文化、海疆文化等；有以地理位置命名的文化，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有以民俗和民族聚居形成的地域文化，如客家文化、藏文化等地方民族文化。总之，文化因人们观察研究等方面的需要，常常被定格为不同的类型。香山文化的研究，同样不应太过拘泥于概念的统一性和精确性，而应根据研究的需要和历史文化演变的实际来确定。

香山文化这一提法最早见于 2002 年 8 月，当时并未作学理上的严密科学界定，也没有作更深入的研究，只是现象学上的描述，严格说来还不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①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注意和深入的研讨。2006 年 5 月 20 日，《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一书出版后，“香山文化”这一概念才真正上升到学术层面，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文化概念。^②

^① 胡波在 2002 年 8 月纪念郑观应诞辰 1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主题发言中，就从香山文化这个角度对香山为何出了郑观应、孙中山等大批领风气之先的人物现象进行了分析。但当时并未能对香山文化这一概念作更具体深入的剖析和论述。全文见《中山日报》2002 年 11 月 4 日理论与实践版，《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知与行》一文。

^② 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共收录了 25 位海内外专家学者 35 篇论文，表面上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入，但这些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分析香山文化的不同思路和多维视野。《寻根》部分共收录了 5 篇论文，它们共同揭示了香山文化产生、形成的经济背景和自然条件，阐述了香山文化的内涵、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人物》共收录了 10 篇论文，主要介绍香山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之思想与活动、生平与业绩及地位与作用等，从而深化和丰富人们对香

香山文化也在热烈的讨论中迅速进入理论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视野。什么是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作为地域性的文化概念是否成立？如何界定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与广府文化、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一连串的关于香山文化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问题，随着《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和《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以及《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和《人文香山》、《百年千年——香山文化的溯源与解读》、《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等论著的出版迅速凸显出来，香山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性质与特征、内容与结构、功能与作用等，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①

山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足音》部分共收录了6篇文章，集中地反映了中山近十年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展示了中山人民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视点》共收录了关于中山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论文8篇，目的是告诉人们如何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实现城市理性发展和社会转型；《家园》共收录了关于香山人情风物、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文化散文共6篇，目的是激发人们对家乡的眷恋和关爱之情，强化人们对香山文化的归属感和文化自觉。

^① 王远明主编的《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对香山历代人物进行了较系统和全面的评介；《百年千年——香山文化的溯源与解读》收录了近60篇国内外学人的关于香山文化的研究成果，内容设计文化概念、文化人物、文化事件、文化遗产等。《香山明清档案辑录》收录了明代档案4件、清代档案863件，时间跨度约280多年。这800多件档案，有清朝皇帝的朱批，有大量清朝各级政府和专门机构的题奏本章，录副奏折及相互间的咨呈批示等等，内容涉及军务、财经、外交、治安、文教、科举考试、出国留学等各个方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收录了胡波近5年来关于香山买办的10篇专题论文，内容涉及香山买办形成的自然和人文社会背景，香山买办的各种活动和业绩，以及香山买办与上海、近代中国的关系和相关人物的典型分析。《人文香山》则着重探讨了香山的名人文化、商业文化、语言文化、民俗文化、当代社会文化等问题，为人们了解香山文化的内涵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要了解香山文化，研究香山文化，就必须从概念的内涵、外延等本体论方面入手。如何界定香山文化，就成为人们首先思考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香山文化，就是一种相对于岭南文化而言的地域次文化，它包括物质层面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文化。有的学者则认为既源于中国传统，又融合外来因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创造、制度构建、行为规范、文化习俗以及价值取向等的总和，即为香山文化。^①也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就是指历史上属于香山地区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即思想文化。还有的认为，香山文化从语义学上看，主要包括两种涵义：一是指昔日香山的历史变迁、典章制度、人情风物、宗教信仰、思想文化、方言俚语以及与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心态文化在内的全部文化成果和文化现象；一是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香山名人文化和以孙中山思想理论为主体的，以近代民主革命为主要特征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相结合的精神文化。二者虽属不同层次，但互为表里，共同反映了香山文化的当代风貌。^②这些关于香山文化的定义，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部分地反映了香山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但是仍然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科学性。诚然，要给香山文化这一新的文化概念作学理上的界定或理论上的论

^① 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序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② 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第 4 页。

释，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香山文化作为行政的和地缘的香山紧密联系在一起。地理的香山是容易定义的，作为行政区划上的香山也是十分明晰的，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民也是容易弄清和确定的，但是香山文化的含义却不是那么简单地就可以说清楚和弄明白的。可以肯定地说，香山文化与香山地区的人和事、物等有着紧密的联系。香山文化就是香山人在香山地区创造的文化，但香山人和香山地区不是唯一的标准，一个文化的标准是它的实体风格和精神品质。香山文化应该有它自己的主导精神和统一风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个文化的主导精神和统一风格贯穿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域，一段连续的时间，一群相互联系的人民中的时候，这个文化就构成了一个实体”。^①

从文化形成的过程上看，香山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增量、与时俱进的开放系统，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行政区划的多次变更而分散离析，相反地，它伴随着香山地区经济社会的进步而得以传承和发展。从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香山文化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相互融合的产物，既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古南越文化的特质，又打下了西方近代文化和南洋文化的烙印。方言文化、民俗文化、买办文化、华

^① 郑刚：《岭南文化向何处去》，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7 年第 17 页。

侨文化、商业文化、名人文化和思想文化等，构成了近现代香山文化丰富多彩、绚丽灿烂的画卷。从历史和现实上看，香山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集中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粤、客、闽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等，又有其本身独具的特色，与和岭南文化母体文化——中华文化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说香山文化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而应从香山文化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发展和演变、内容和形式、性质和特点、功能和作用等方面来理解，才能避免片面性和主观性。

基于对香山文化的自然和人文的历史前提的认识，也基于对香山文化的时空变化的理解，结合学术界对文化概念的解析，也综合目前学术界对香山文化的种种不同看法，我们尝试给香山文化以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香山文化主要是指，以包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为依托，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是中原土族移民先后入徙香山带来的不同时期的汉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后，并与海外异域文化交会，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

这一说法虽然不能看作是香山文化最恰当的和最精练的表述，但至少这一表述对香山文化生成的时空背景和人文社会环境，内容构成和性质特征等有了比较清晰的交待，基本上反映了香山文化的本质特征，强调了香山文化的历时性、地域性、

开放性、交融性、互动性和发展性，使人们易于从感性和理性上迅速走近“香山文化”。

第二节 香山文化的内容

按文化形态学的理论和方法，香山文化在内容构成上可划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个层次。但这样划分似乎显得过于形式化和学理性，不便于人们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因此，根据香山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文化特性，我们认为香山文化主要是由香山地区的方言文化、民俗文化、买办文化、商业文化、华侨文化、名人文化和思想文化等七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统一体，也是香山文化最丰富最有特色和最有影响的内容。

(1) 方言文化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①没有语言，人类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持，人类的文化创造也无法实现。语言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

方言俚语无疑是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印证。错综复杂的方

^① 转引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言,既是香山社会的一大特色,又是香山多元文化的一种表现。在香山这块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广东三大方言语系同时并存,且各大方言语系中又有区域间的不同。就今日的中山市而言,粤语系中分为石岐话、沙田话(近顺德话)、三角话(近东莞话)和古镇话(近新会话);闽语系中也有三乡话、隆都话和张家边话之分。香山客家语系固然居民比较集中,语系内部比较一致,但与粤东客家语比较则存在一定的差别。因为它不仅受周边地区的三乡话、张家边话和南朗话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西方近现代语言文化的冲击,言语之中夹杂了不少异质语言文化的内容。^①在珠海同样是粤、客、闽三种方言并存,以粤方言为主。1953年后,随着非粤籍人员的大量流入,珠海地区出现了北方方言。其粤方言分布在香洲区、横琴区、万山区、平沙区、红旗区、三灶区和斗门县的大部分乡镇。根据其内部差异,珠海方言又分为西北部地区粤音、南北部地区粤音和水上话音三大类。客家方言分布在香洲区、三灶区和斗门县的部分乡镇,平沙区、红旗区和横琴区也有部分人操客家方言。闽方言主要分布在淇澳区、平沙区、香洲区和三灶区。方言种类的丰富性和集中分布的特点表明,香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和文化多元的社会。^②

^① 中山市方志办公室编:《中山市志》(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5-1403页。

^② 珠海市地方志编委会编:《珠海市志》,珠海出版社2001年第975-991页。

语言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语言糅合在一起。著名的语言学家萨皮尔认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和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邻居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

^①香山自古以来接触的民族很多，像南洋、欧美和东方的日本，以及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都和香山地域文化有过接触，语言中的借字借词借音的现象时有发生。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香山的方言中，借用英语词汇总数就在 200 个以上，闽南话、广府话和客家话也有彼此借字借词的现象。中山闽语在口语中有一大批闽语所独有的词汇，如骹（脚）、囡（儿子）、涂（泥土）、耖（田地）、厝（屋子）、鼎（锅）等，但也有因受粤语的影响，一批粤语特有的词汇亦进入中山闽语之中，成为他们的基本词汇，如靚（漂亮）、𠵼（能干）、𦘒（舌头）等。不同方言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构成香山独特的语言文化。香山方言文化

^①转引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 21 页。

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交错分布的特点，为人们了解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流变、传承、结构、特征、价值、意义等问题，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如从语言借字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的具体表现，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孳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正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和转变。

香山方言区域分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反映了香山文化的多元性和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历史上的三次移民潮，造就了香山社会结构的层级性和复杂性。据中山市公安局户籍科 90 年代初的统计，全市 100 多万人口中，有姓氏 502 个，超万人以上的大姓有梁、黄、陈、吴、林、何、冯、刘、郑、杨、郭、罗、周、张、卢、房、萧、黎、谭、高、麦、胡、邓、欧等 26 个。又据《香山县志》记载，中山闽语区的居民大部分是宋元之间从福建迁来香山的。中山的客语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从粤东梅县客家话地区迁来的，而中山粤语区的沙田话居民则是来自番禺、南海和顺德等县，古镇话居民主要来自新会和江门市，三角话的居民大部分是近 200 年来由东莞县迁来定居的，操石岐话的居民主要是宋元之际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带迁来的中原人。民国时期出版的《香山县志续编》记载，珠海地区的唐、

梁、容、杨、吴、陆、鲍、韦等主要姓氏，均系南宋宁宗开禧元年至度宗咸淳年间从南雄等地迁入。1990年人口普查时，珠海有少数民族 28 个，姓氏 365 种，60 多万人。他们大都按姓氏或宗族聚居在同一个村落或同一个乡镇，聚族而居的现象极为明显，这一现象也说明香山移民大都是聚族而迁，在文化和社会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宗族性和血缘性。（见表 1）

表 1 香山大姓及其分布表

（主要是今日行政区划上的中山大姓分布情况）

姓 氏	集中地名	姓 氏	集中地名	姓 氏	集中地名
梁	环城福涌、曹边、北台、港口群胜、黄圃横档	甘	南朗、翠亨	孙	张家边沙边村
黄	西区长州、三乡雍陌、沙溪塔园、大涌青岗	欧阳	张家边大岭	黎	黄圃
郑	三乡雍陌、桥头、张家边濠头、沙溪新路	麦	小榄	赵	板芙富围村

续下表

续表

李	小榄、环城恒美、三乡白石、大涌岚田	何	小榄镇、小榄九洲基、乐丰、张溪	方	沙溪大同、濠涌
马	环城沙涌	雷	环城渡头	刘	沙溪云汉、龙瑞
郭	环城槎桥、竹秀园	潘	小榄镇、小榄九洲基	林	大涌安堂、环城庐溪
陈	东区库充、张家边陵岗	袁魏	古镇海洲	徐	沙溪板围园
萧	三乡萧家村、大涌南文	苏	古镇古一	王	沙溪石门
程	南朗	容	三乡	高	沙溪大石兜、豪吐

香山聚族而居和姓氏密聚的现象，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家庭生活的变迁，提供了生动的个案和有益的启示，因为它隐藏的是中国移民的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方言不仅仅是语言在地理上呈现的分布，它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首先是一种文化代码。它表明你是谁或你是哪里人。对本群体而言，方言是一种凝聚的力量、认同的标志和情感的密码；对外族来说，方言就是一种隔膜、一种距离。语言不仅使人摆脱了动物界，构建了文化，而且使人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母语，而每一个民系又总是以独有的方言为特征。了解了语言，也就理解了文化和社会，

甚至了解了特定文化社会中的人。^①

上个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徐松石、罗常培、王力、詹伯慧、李新魁等，曾先后到中山作过方言调查，赵元任先生甚至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在中山、檀香山调研，撰写了《中山方言》的调研报告，在报告中，他说：“中山县的方言相当的杂。除了广州系统的方言之外，在县城以西，如龙头村的语言，完全属潮汕系的所谓‘福佬话’，这种话连其他本县人都听不懂。现在所记的是狭义的中山语，乃是县东石岐地方的方言，就是普通所谓中山话。它分布的地方，除在中山区外，在夏威夷群岛特别通行。它在中太平洋侨界里的势力，还在广州、客家、四邑各方言之上。比方在檀香山中国人办的四个中文中学，全是用中山音教学的。”^②最近二十年，又有不少新生代的学者，对中山“方言岛”现象的形成以及中山方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③中山方言再度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话题。因此，考察香山社会结构和基层组织、村落和乡镇的历史变迁以及本质特征，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买办文化

^① 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页

^② 赵元任：《中山方言》，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49页。

^③ 甘甲才：《中山客家话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

所谓买办，是指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受雇于外国在华商行并做他们代理人的那些中国人。

“买办”一词是借用旧称的。在明代，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称买办。后来，凡在官府从事采购的人员都以“买办”相称。到了清代，连官宦人家的采购人员也都成为买办。18 世纪的清朝，把在广州十三行中负责招待外国商人的商馆办事人员，通称为买办。早期来华贸易的葡萄牙人称这些办事人员为“Comprador”。“Comprador”是由葡文“comprar”转化而来的，即采办的意思。Comprador 即采买者。当时的“买办”一词就是指为外国商人解决贸易中困难的办事人员。他们分别担任供应船舶，办理伙食，管理金钱出纳及雇佣管理工役等事务。鸦片战争以后，买办不仅是洋行的总管、帐房和银库保管员，而且还是大班的机要秘书，在商馆的商贸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做买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且不说有外国商行的种种苛刻的制度和条约限制，而且本身必须具备许多条件。他们必须既精通外国语言文字，又熟悉洋行和中外贸易业务，拥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买办制度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是由于语言的、经济的、心理的和习俗的等方面的因素所致。概而言之，“语言之不同；习惯之互异；商情之特殊”，是买办和买办制度形成的基本原因。

自 16 世纪中期葡萄牙租占澳门以后,澳门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港口城市,对香山县的经济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澳门不仅成为香山人了解世界和向外拓展的窗口,而且也给许多香山人带来灵感和致富的梦想。孙中山在谈起自己从澳门启程去檀香山时的感受时,就说过“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样的话^①。

明清以来的香山人,因长期受澳门和香港两地文化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对海外异质文化取一种逐步认同和学习借鉴的姿态。最初,他们是为了谋生和致富而与西洋商人频繁接触,但在中外贸易和不断交往过程中,他们也不知不觉地积累了不少与西洋人打交道做买卖的经验,而且也部分地掌握了外国语言,熟悉了西洋人的生活习惯。

鸦片战争后,当时的香山县出了不少在国内小有名气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据统计,1830 年—1900 年的 70 余年内,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十分之九,其中香山人的表现尤为突出。如唐廷枢(1832—1892)一家三代都作买办,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唐绍仪(1860—1938)都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他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 40 余家,其中属于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六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 卷,第 47 页。

项。^①徐润（1838—1911），也是著名的买办，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物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更是十九世纪上海颇有影响的“地产大王”。^②郑观应（1842—1922）既是著名的买办，又是有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实业家。他热心时务，先后出版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具有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的论著，不仅首倡“商战”论，而且还是第一个公开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也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甚至改变了清王朝统治阶级对西学、洋务的看法。^③还有莫氏家族，也有不少人做了洋行买办，其中莫仕扬（？—1879），就是英商太古洋行香港总行的第一任买办，为太古洋行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祖孙三代历任洋行买办。其家族或亲戚充当太古洋行买办的累计达千人之众，员工中就流传着“只知有莫，不知有英”的话语。其财富达有数十亿之多。^④香山人活跃在 19 世纪的洋行，也表明香山人在那个极端保守、封闭的时代，就已经具有那种开放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格。

^①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 页。

^② 徐矛主编：《中国十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1 页。

^③ 参见夏东元：《郑观应传》，（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85 年版；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④ 徐矛：《中国十买办》，第 356—358 页。

像徐润、唐廷枢、莫仕扬、郑观应他们这样在洋行或通商口岸做买办而发达的人，近代香山为数众多。在十九世纪，“香山人”几乎与“买办”同义，香山也常被人称之为“买办的故乡”。19世纪50年代后，香山人纷纷迁移上海等中外通商口岸，成为洋行在通商口岸最出色也最信赖的买办和买办商人。尤其是刚刚开埠通商的上海，香山人几乎在与外贸经营有关的领域，如洋行、商号、钱庄等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当时上海主要的洋行，如宝顺、怡和、琼记等的买办均是香山人。一个当时的作者留下了这样的记述：“几乎所有外商雇佣的买办都是（香山）这个县的人，这些人介绍的雇员自然都来自他们的家乡”。^①他们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从事着商业经营活动，在近代中外贸易和实业建设、甚至晚清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中，起着先驱者和创造者的积极作用。

买办和买办文化，是在社会发展变化时期，滋生于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带有间性特征的文化形式，是西方殖民地政策所造成的，通过不平等条约实现和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中西之间文化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许多方面的社会影响，使之在历史效应上成为中国近代资

^① [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本主义的奠基人；另一方面它又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文化现象和扭曲了的文化形态。它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过程的记载和标志。在它的表象之下积淀着的是近代中国那段痛苦的屈辱的历史，反映的是中西文化交汇时期的一种过渡现象。^①

因此，有人认为“买办文化不是指文化买办，却包含了文化买办、经济买办、政治买办等形式的活动和结果。买办文化又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合过程中形成的，是横生于近代文化交流和异质文化沟通过程中的一个奇异形式。买办文化反映着这个时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与状况。”买办文化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征。“非主奴性或依附性”、“居间性”、“扭曲性”、“奴役性”、“掠夺性”、“混杂性”、“中介性”、“扼杀创造性”等都可以说的上是它的特征。^②对香山买办文化的研究，既拓展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空间，又深化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和社会进步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3）华侨文化

香山是著名的侨乡，华侨文化成为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华侨文化？目前学术界颇有争议。有的认为华侨文化与侨乡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华侨文化形成于侨居地，产生于异国土地上。而侨乡文化则形成于华侨的祖国，产生于华

^① 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② 李燕编：《买办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18 页。

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侨乡文化深受华侨文化的影响，侨乡文化并不等于华侨文化。^①华侨文化和侨乡文化又有许多相同相通的内容，侨乡文化是华侨华人和侨乡民众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侨乡文化不仅仅只是华侨文化，还有更多更丰富的本土文化内涵，不能把华侨文化等同于侨乡文化，但也不能忽视华侨文化在侨乡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我们更愿意将学界所说的侨乡文化与华侨文化统一起来称为华侨文化。因为华侨文化更有包容性，涵盖面更广。香山华侨文化与其它地区的华侨文化相比，同样具有自己的特点。

香山人移居海外的历史，上溯南宋、下迄晚清。自香山立县至清末民初近 850 余年的时间，香山人绵延不断地向海外流动。据现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属于中山的华侨有约 320383 人，侨居于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珠海侨乡主要分布在唐家、香洲、前山、南屏、金鼎镇等镇区。唐家镇鸡山村，该村现有人口 600 多人，而在三藩市的鸡山籍华侨华人达 1000 多人。香洲山场村的旅外乡亲是在乡人数的 2 倍。近现代众多的香山人寄居在世界各地，使曾经包括中山、珠海在内的香山县因此成为著名的侨乡。

华侨虽然身在异域，却总是心系祖国和热爱家乡。他们不

^① 余定邦：《华侨文化与侨乡文化》，载胡百龙等编《侨乡文化纵论》，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仅积极支持近现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且关心祖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甚至直接参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们为家乡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出钱出力，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和炽热的爱国热情，感人至深。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称“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的确是实至名归。如今我们说，华侨是家乡和祖国建设事业的重要推动力，也同样是恰如其分的判断。

香山是著名的侨乡，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香山人，从海外带回的不仅仅是大量的钱财，更重要的还有世界各国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思想、人物等方面的信息：一是他们把国外的思想观念带回来，使家乡在许多方面得风气和开风气之先；二是他们把外国的科技运动项目和乐器传回家乡，促进了家乡技术进步和文体活动的发展；三是把侨居地的语言文化中的一些语词、语意等带回家乡，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侨乡“半唐番”的语言；四是他们把国外的一些动植物和商品带回香山，丰富了家乡人的物质生活。总之，他们以自己的言行，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和家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家乡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华侨对家乡香山的贡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侨汇。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成为早期香山人重要的生活保障，而且也拉动了地

方经济的发展。早期香山华侨汇款像其他地区华侨汇款的用途一样，也主要是用来赡 AAA 养家眷及作为自己的养老送终金，因为早期华侨大都具有落叶归根的心态。后来随着华侨逐渐融入侨居国主流社会之中，“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华侨汇款逐渐表现为较强的投资性和捐献性。他们有的在家乡买田建房，有的投资实业，有的捐资办学，有的捐献于慈善事业，有的直接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侨汇流动的方向可谓错综复杂。

虽然侨汇流动的方向千差万别，但对香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大都历史俱在。耸立在香山各大乡镇上的碉楼，虽然没有开平碉楼密集和华丽，但它同样是香山华侨文化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沙涌、竹秀园、北台、南朗、沙溪、三乡、沙边等地，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清末民初华侨的建筑物，它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由此折射出当年香山华侨海外艰苦创业的历史和爱国爱乡的精神。他们回国回乡投资实业，助教助学，热心公益的义举，不仅促进了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而且也繁荣了祖国和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改变了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甚至催生出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和人生观与世界观，从总体上有力地加速了整个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的步

伐。

民国9年出版的《良都竹秀园月报》就有人撰文称：

“我乡古代，业农者众，旅外人稀，风俗淳厚，人情勤俭，畎亩之间，男女常共耕作，田园庐圃，彼此各任其能。农隙之余，男则采薪而小贩，女则缝衣而织麻。熙熙攘攘，有上古遗风。降自今日，营业日艰，生计困苦，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一家数口，皆瞻仰外洋之资，甚至以懒惰不事为清闲，赌博浪游为消遣术，……故婢仆亦纷纷购请，……好言高远，新名词语，冲口而出，……衣服时装，日新月异；金银首饰，千般万化；石岐来往，三天一行；一衣一衫，付之缝工；一线一履，购之于市。不惜男子远涉重洋之艰苦，日望汇金之有无。”

《古镇月报》的《对侨胞的企望》一文也提到：

“家乡和侨胞的关系，密切而且重要，桑梓人士，十之八九，都是仰给于侨汇之家。”

香山侨汇对香山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作用和影响，由此可见。总之，香山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在近现代史上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研究香山华侨与祖国特别是家乡的互动关系，全面探讨华侨文化或侨乡文化的内在结构、本质特征、作用影响、历史流变等问题，既充实和深化了华侨史研究，又加深了人们

对华侨历史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认识。香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文化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发掘、保护、开发和利用华侨文化，广泛征集华侨历史文化资料，建造华侨历史博物馆，全方位地展示华侨艰苦创业的历史和爱国爱乡的精神风貌，也就成为当今香山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4）商业文化

商业，在古代社会，一直被视为“末业”而倍受抑制，商人处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极其低下。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在西力西学的冲击下，商业才开始逐渐繁荣和发展起来，并成为富国强兵之本，商人也扬眉吐气，一跃而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救星。“振兴中国，首在商民，”几乎成了近现代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

香山人向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宋代香山立县以来的石岐，一直是各种商品的聚散地。元明时期，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澳门与香山地区之间的贸易就更加频繁。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定以后，香山因地近港、澳和广州，中外贸易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境内的石岐、小榄、前山、香洲等地，也因商业的繁荣而成集镇。特别是清末民初，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香山的工商业再一次出现蓬勃生机，县治石

岐工商业在原来十八间商铺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虽屡经战乱，商贸活动受到影响，但民间墟市仍然断断续续地进行，对外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止，商贸传统因此也就传承下来。

大致说来，香山商业文化经历了宋、元孕育时期，明、清形成时期，清末民初发展时期，新中国以后为转化和创新时期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宋、元孕育时期乏善可陈。明、清形成时期，因受颇具西方文化特色的澳门之影响，香山的对外贸易和内部商品流通日趋频繁，并逐渐形成了以中外商品集散地为主要特征的商业文化。清末民初，香山不仅造就了为数众多的精通中外贸易业务的著名买办商人，而且也涌现出大批享誉中外的华侨资本家。他们不仅通过艰苦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和财富，而且也以他们的智识和勤奋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时为中山的商业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革新，石岐街的人文社会风貌也因此而改观。建国以后，中山的商业文化经过“三大改造”、十年“文革”和20多年改革开放的冲刷洗礼，经营方式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私营到公私并存，从单一向多元方向发展的历史性转变；经营理念也在过去的诚实、守信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诚信、公平、方便、快捷和文明、礼貌。中山商业文化因此也实现了从传统到

现代的转变。

具体说来，今日中山的商业文化集中地体现在早期中外贸易，买办群体和四大百货公司，以及清末民初石岐孙文西路商业十八间等方面。受买办商人以及早期中外贸易和中西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澳洲香山华侨马应彪、郭乐兄弟、蔡昌兄弟、以及李敏周和刘锡基，他们先后创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不仅把国外百货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经验、各国商品引进到中国，开创了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河，而且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百货业的现代化。

受买办和侨商的影响，清末民初香山商业文化，在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均增添了不少新的色彩。尤其是香山石岐，以孙文西路十八间商铺为代表的市井商情最具魅力。它们既是传统商业在近代社会的延续，又是现代香山商业文化崛起的雏形。当时太平洋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汇丰公司、多多公司、昭信公司、福和盛、生发、宝昌、永安金铺、天宝、信发百货、满新、雨贞布匹、公益纸料行、亚细亚、德士古、美孚等十八间商业店铺的整体格局，店铺门面、室内陈设、经营范围、商品特色、商业用语、商贸活动、工艺制作、招幌市声、店员衣着和精神面貌，既有买办文化、侨商文化的烙印，又具有现代气息和时代特征。

近代，香山商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历史虽然略显短暂，但他在中国商贸史、特别是对外贸易史和商业文化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明末清初以来，香山因地近澳门而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这个时期，中西洋的货物源源不断地从澳门经香山各地进入中国腹地，中国各地的产品又主要借助香山和澳门走向世界。石岐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迅速成为中外货物的集散地之一，其商业文化建设，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其次，买办、买办资本和买办文化，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出现的一种奇特的现象，而那时的香山却是大多数买办商人的故乡。尽管买办难免有崇洋媚外和惟利是图的缺陷，但是，他们中尤其是香山买办在早期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上，毫无疑问地起了突出重要的作用。他们大都生活在异地他乡，但是他们的言行和事业上的成就以及对家乡发展变化的关注和支持，也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其时和后来中山人的价值取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时和当今中山商业文化的发展变化。

再次，香山侨商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不仅是华侨爱国爱乡的具体表现，更是中国百货发展史上的创举。他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东西方各国以商品为主要形式的物质文化，而且也向中

国人传递了西方商业运作方式、管理哲学、以及价值准则等商业文化方面的信息，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商业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最后，郑观应的“商战”论和孙中山的商贸观，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商业思想史上亦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多次强调振兴“商务”，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成为最早主张“商战”的思想家和最早介绍商会、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人。孙中山同样具有明确的重商思想，他不仅认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而且认为士、农、工、商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无贵贱尊卑之别，中外通商、利国利民。他本人不仅与商会有频繁的接触，而且曾有经商的体验。石岐孙文西路中西药局，就是孙中山涉足商业的尝试。

香山商业文化在历史变革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熊月之教授在他的论著中就指出：商业文化是香山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研究价值的一部分。他将其归纳为四个特点：一是视野开阔，视通中西。香山人接触西方早，既知道西方，又了解中国。二是善捕良机。海内外凡是具有发展空间和商机的地方，香山人都很早看到并能克服困难往前发展。三是决策果断。面

对机会，香山人看准就干，许素付诸实施。四是作风塌实，精益求精。如唐廷枢一生自营、合营、参与、主持的多种企业有47家，涉及航运、矿业、铁路、医院、学校等方方面面，每一样他由外入内，仔细琢磨，认真学习，力求做到最好。^①在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起步阶段，香山人自己动手设计制造出第一台火车机头，自己经营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并在中国早期铁路建设和经营管理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黎志刚教授，也认为香山商业文化在中国商业文化中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与晋商、徽商合股，家族式的传统商业文化不同，香山商业由于经常跟洋人接触，具备了国际性的商业视野和专业知识，推动了产业的转化、股份制度的实行以及新式的经营方式。香山商业以创新、务实的香山文化为背景，在近代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推动近代商业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②张晓辉则更进一步认为香山商业文化是浙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具体表现为（一）开放、变革、与时俱进；（二）创新、进取、引领潮流；（三）爱国、自强、造福桑梓；（四）精明灵

^① 熊月之：《上海香山人与香山文化》，《上海社会科学》，2006年9期。

^② 黎志刚：《商业文化成为发展动力》，载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9页。

活、讲求实效；（五）诚信、凝聚、注重亲情。^①

总之，近现代香山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香山商业文化既是近代香山人自我价值实现的具体体现，又是中国近现代商业历史的缩影。香山人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汇的转折点上，借商业为入世之媒，大胆开拓、不断创新，为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成功地实现了自我历史的书写。

（5）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的文化事物和现象的总称，它包括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四个部分内容：

所谓物质文化，主要指人类衣、食、住、行、用和工艺制作等物化形式，以及人们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所构成。

所谓社会组织，指的是人类社会集团中氏族、家属、宗族、村落、乡镇、市镇以及各种民间组织的总称。

所谓意识形态，主要指民间宗教、伦理、礼仪、艺术等，是在物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精神民俗部分。

所谓口头语言，主要指方言俚语，它作为传达思想、情感、知识等的工具，也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① 张晓辉：《略论近代香山商业文化的内涵》，载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95-104页。

可以说，民俗文化沟通着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着集体的和社会的人群意愿，并且通过人作为文化载体进行传播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

大致说来，香山的岁时民俗和红白喜事民俗与中原广大地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一些具体规定和仪式上略显不同而已。最能体现也最具审美和开发价值的香山民俗文化应是香山的民间文化艺术。香山历来是民歌之乡，沙田地区流行的高棠歌、咸水歌和大髻歌，五桂山区的客家山歌和白口莲、沙溪的鹤歌，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以咸水歌和高棠歌为代表的岭南水乡民歌民俗文化，最具艺术价值和开发意义。

另外，今日中山的民间艺术也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有舞龙、舞狮、舞鹤、飘色、放风筝、赛龙舟等，其中比较有名的为古镇的云龙，张溪的金龙和风舞，牛起湾的金龙，长洲的醉龙，沙溪的沙龙，申明亭的鹤舞，崖口、黄圃的飘色和麒麟舞。

放风筝和赛龙舟在香山古今都十分盛行，而且逐渐从民俗文化向全民体育娱乐文化方向转变。赛龙舟成了很好的一种文体竞技活动，成了人们蓬勃向上、奋发图强的一种精神展示。放风筝也不仅是一种艺术创新活动，而且还是一种社会交往、思想交流的契机。古老的民俗风情，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后，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小榄的菊花会和菊花戏，在中国民俗文化史、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民俗文化史上，均具有一定的地位，它们同样是香山民俗文化中的一支奇葩。还有香山的宗教文化和节庆礼俗，以及民间文学，如歌谣、儿歌、竹枝词、民间韵语、通俗故事和诗歌、民间小戏、革命故事等，就是香山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些民间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礼俗迷信，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香山民俗文化的点与面。

中山市持续了 20 年的慈善万人行，其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社会支持的公益性和民间文化艺术的表演性以及其蕴涵的博爱人道精神，为海内外各界所称道。如今一年一度的慈善万人行，已经成为今日中山社会的新民俗。

(6) 名人文化

名人是一种现象，又是一种文化。名人不仅仅在于他是名人，还在于名人与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源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他们既是文化的拥有者，又是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变化，总是离不开个人，特别是离不开那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名人和伟人。香山不仅是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而且是许多杰出人物的诞生地。

早在明代中期，香山文化教育就与中原等地的水平不相上下。嘉靖年间，科举人数日渐增加，中举人数达 180 之众，其

中有 16 人考取进士,有的甚至后来在学问文章和官场上颇负盛名。如黄畿、黄佐父子。黄畿勤于著述,有粤洲先生之称;黄佐参加廷试,五试皆为第一。其著述甚丰,且被广为传诵,时人誉为奇才。还有明末官至内阁大学士、明亡后又被南明唐王召为首辅的何吾驺,以及何述玄等,均是当时的名士。到了清朝,香山人读书应试者众,在清初至科举制废除的 200 余年内,香山有 2 名探花,107 名进士,721 名举人,另外尚有贡生和监生 589 名。虽然科举考试不是人才选拔的唯一途径,也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历代科举取得功名的人员数目更不是历代香山人才的总量,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毕竟是古代香山社会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反映了香山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展现了香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

与传统社会倾向于要求子女读书进学、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不同的是,香山人更多地倾向于工商和外出谋生。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香山人受东西方纷呈的文化影响,创业成材之路不再局限于科举一途,而是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不断进取,多途径多侧面全方位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杨仙逸、杨殷、林伟民、苏兆

征等，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更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和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探索者。沈亚美、刘丽川、容星桥、徐振鹏、陈庆云、容有略等，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更是可歌可泣。孙眉、郑仲、唐雄、杨著昆、马应彪、郭乐、郭泉、蔡昌、蔡兴、刘锡基、李敏周、杨仙逸、鲍华、唐廷植等华侨，其积极投身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精神，为同胞所称道。徐润、唐廷枢、郑观应、马应彪、郭乐、蔡昌等，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工商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均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而容闳、郑观应、钟荣光、刘师复、杨匏安、王云五等的思想主张和文化理念，既惊世骇俗、又前无古人。苏曼殊、阮玲玉、郑君里、萧友梅、吕文成、容国团、江嘉良等在文化艺术和体育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亦令今日中山人感到骄傲和自豪；郑藻如、唐绍仪、蔡廷干、梁如浩等在外交上表现出的才干和气节，同样可圈可点。欧阳瑛、徐宗汉、梁定慧、董慧、徐慕兰、朱慕飞等也是名垂青史的巾帼英雄。在人口不到 130 万的香山县，短暂的民国时期居然涌现出近百名航空人员和 3 名航空学校校长，先后出现了唐国安、钟荣光、韦卓民、容启东等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历史人物都集中地出现在近代香山，实在不可思议。

一部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辞书《辞海》收录了古今中外 2000 名历史人物，有 30 余位香山人。《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收录的 2353 人中，香山籍的就有 188 人，占总数的 8%。在《中国近代史词典》中，收录的香山籍人物也近 30 人。在《中国现代史词典》中收录的 1034 人中，香山籍人物有 15 人，占总数的 1.4%，在《孙中山词典》收录的近 800 个中外历史人物中，香山籍有 42 人，占总数的 5%。而载入其它典籍的香山历代名人亦不下 300 余人。在中国最早官派留美幼童 120 人中，香山籍就占了 39 位，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在近代中国，香山不仅产生了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而且还首开风气，创下了许多近代中国之最。

可以说，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环境，孕育了无数英才俊彦，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其人数之众、知名度之高、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巨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历史并不悠久的香山，因有了这些革命家、改革家、外交家、思想家、实业家、文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科学家、军事将领和体坛精英，而闻名遐迩，誉满全球。

（7）思想文化

香山思想文化主要体现为名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审

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结、民族性格等方面。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经济与商业思想，以及他的爱国爱民精神、愈挫愈奋的革命精神、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和博爱精神，郑观应的“商战”和改良主义思想，四大百货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思想，香山买办的经济思想和容闳、唐国安、钟荣光、萧友梅、韦卓民等的教育思想，以及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等，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篇章。

表 2 郑观应商业思想简表

商 战 论	立商会	1.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
	倡商学	2.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强工业	3.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
	重竞争	4.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
	赖保护	5.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俱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
商 道 论	充分发挥商民的资金优势	6.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
		7.富在工不在商。
商 道 论	充分发挥商民的资金优势	1.泰西各国官与商，财货互相流通。盖官力则有穷，而商资则易集。
		2.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成乎精巧。

续下表

续表

		3. 公使为商榷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
	官府要保护民族工商业	4. 振兴工商，必有待于国内机关组织完备，政治改良之后。
	原则上反对“官督商办”	5. 各国振兴工商之政，须除去各种障碍，诱导民间企业之心。
	维护商民利益	
	研究经商规律	
营 销 论	加强业务联系	商局宜与客商联络招徕生意也。须与各商联络，声气相通，不论事之巨细，时之早晚，随到随办，各无推诿。
	随行就市	招徕客货宜随时探听各埠货物消长。当事者须随时经心挥听各埠生意之盛衰，客货之多寡，本埠船只几何。
	任人唯贤	夫西人之胜于我者，以能破除情面，招徕人才，官绅属托有所不顾，亲友推荐有所不受，是以所用司事人等不但事情习熟，且为守兼优。董事由股东而举，总办由董事而举，非商务出身者不用。
成 本 论	加速资金周转 以降低成本	加强轮船运转速度，提高资本周转率，调度得法。
	查陋补缺	健全各项管理，检查制度，堵塞各种漏洞，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节约挖潜	材料宜自购以节省糜费也；用华人代替洋人，以节省开支；清除多余人员。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合理组织生产	合理安排，精心组织，防止生产脱节，影响生产，浪费资源；注意规模效益，降低成本。

续上表

续表

管 理 论	生产管理、	产品要造销对路；采用承包法；注重产品质量。
	人事管理	用人重德、才兼备，“欲振兴商，尤在首重道德，盖能以道德植其基，然后济之以商学、商才，赏罚严明，厘剔精密，不徇情，不植党，因材器使，滴滴归公，商务之兴自可预决。”
	务实经营	创办一事必须小试其端，先立于不败之地，逐渐推广，方可有功，若亟求速效，务广而荒，必至一蹶不振。
	财务管理	重视集资经营，主张向外国借款。
	内部制度	门卫制度，材料领用制度；采购制度；严格作息制度。
	关于韬略	企业要大造声势，在外部树立一个公司资金充实、实力雄厚的形象，以期先声夺人。
	项目可行性论证	注重项目投资的可行性论证，力求科学、全面地做出决策。
	招标	在企业采购和修理方面主张公开招标。

表 3

孙中山商业思想简表

思想	主 张	措 施	言 论
以商为纬	重商	1、修筑铁路、公路，浚疏河道，使“全国四通八达”，造就兴商务必备的外部条件。 2、改革旧的税制，以扫除商业发展的路障。	1、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2、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续下表

续表

	兴商		3、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 4、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 5、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
	保商		
	百货公司系统的构想	经营方式	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商品销售
		管理人员	取两步走办法解决，从引进人材到自我培养。
货币改革	1、纸币为国家法定货币。 2、国家统一发行，统一管理。	1、“国家赋说保证所发行之纸币”，“成为有效力之纸币”。 2、“社会通融之纸币，则悉由发行局对换而出”。 3、“如国家遇有非常之需”，急需多发纸币时，则通过“责成国民担任，或增加税额，或论口输捐”，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保证多发的纸币有其“代表之物”。	1.家法令所制定纸票为纸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 2.国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观作钱币之兑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 3.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 4.钱币为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 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银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网，财货溢于金银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务必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纸币，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表4 大百货公司经营方式与商业思想简表

公司名称	经营思想
先施公司	实行商品明码标价，买卖不二价，首次以妇女任营业员；统办环球货，实行多种经营方式，注重商业企业文化建设，诚信、勤俭是办事业的根本。
永安公司	顾客永远是对的。经营环球货，推销中华土产；公司生意以货物为根本，做到货如轮转、服务周到、送货上门。
新新公司	多元化独特经营方式；注重广告宣传，别出心裁招揽顾客。
大新公司	推销中华国产，搜罗美备；选办环球物品，总汇精华；诚信经营，顾客至上。

第三节 香山文化的特点

香山文化在发展和传承中，不仅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归纳起来有传承性、包容性、先导性、民生性、创新性和开放性。

传承性。历史地看，香山文化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行政区划的变更而离散，相反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而得到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孙中山的愈挫愈奋、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和博爱精神，在香山可谓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对香山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有深入了解的颜泽贤教授认为，“中山人民正因应经济

转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努力建设‘两个适宜’和谐中山与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示范市，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既是香山文化概念的现代诠释和作为一种活文化的具体印证，也是对岭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深刻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①李恒瑞教授也说：“香山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这里最早接受西方商业文明、近代政治文明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中山与珠海又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先行一步；并卓有成效，这是对香山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光大。”^②也有多数学者认为“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既是对香山 800 多年历史文化的一种概括、反思和继承，又是对香山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超越、转化和创新。传承伟人故里历史文化，弘扬中山现代人文精神，在今日中山，不是一种纯粹的思想话语，而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包容性。香山文化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充分显示“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包容性。古今中外的雅俗文化不仅得到理解和接纳，而且还被转化和创新。严格说来，香山文化就是古南越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近代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融合、转化和创新的产物。颜泽贤教授甚至认为香山文化汇通天

^① 颜泽贤：《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序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5 月。

^② 政协中山网。

下，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香山文化在自身的形成过程中，汇通中原与岭南文化，东方与西方文化，形成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文化。二、香山文化在发展中壮大，并随着香山人的迁移，而“汇通”到世界各地，这从香山乡亲人数众多，遍及海内外就可见一斑。这种汇通，实际上也是包容性的一种表现。

先导性。明清以来，香山涌现出了许多领风气之先的优秀人物，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提出的幼童留美计划，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美国的先河。在 120 名留美幼童中，香山籍的占 1/3，其中唐绍仪、唐国安、梁如浩等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郑观应率先提出实行君主立宪主张，并系统地论述了兵战不如商战的思想，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和发展经济的实业计划等，在当时都具有思想的先导性。著名学者熊月之在《风起伶仃洋》一书的序文中就对香山人在近代中国的表现感到惊奇，他说：“香山以一边陲小县，在近代竟然涌现出那么多著名人物，孙中山、容闳、唐绍仪这些在教科书上都能见到的名人暂且不论，就说那么多买办，徐钰亨、徐宝亨、徐润、唐廷枢、唐廷植、唐瑞芝、唐国泰、莫仕扬、郑翼之、徐渭南，中国百货业巨头、创办先施等四大公司的郭乐、郭标、郭泉、

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为发展中国民族机器工业做出重要努力的方举赞，为发展中国糖果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马玉山，为发展中国烟草工业做出重要贡献的郑伯昭，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独具特色的思想家刘师复，杰出艺术家郑君里，著名音乐家萧友梅，遗世独立之影星阮玲玉，精武体育会创建人卢炜昌、陈公哲，发明四角号码之王云五，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上海市长吴铁城，清华校长唐国安，岭南校长钟荣光……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文化、艺术，群星璀璨，流光溢彩，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令人浩叹！”^①字里行间掩饰不住对香山人开风气之先的惊奇。

民生性。香山人向来务实崇商、重利而不忘义。香山的经济严格说来都属于民生经济，都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有关，这在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中即有鲜活印证。和早期的香山买办一样，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驱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的经营者所持的经营理念也都体现出浓厚的民本思想。

创新性。创新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行为状态，是流淌在香山人血液中的活性因子。香山人是中国近现代工商实业的重要开拓者和推动者，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中，涌现了一批在当

^① 熊月之：《风起伶仃洋·序》，载王远明主编：《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时颇有影响的买办和工商实业家。香山人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就是这种创新性的明证。正如李宗桂教授所言“强烈的创新追求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特质”。^①熊月之教授认为中山市将城市精神概括为“博爱、创新、包容、和谐”很为贴切。指出“我以为最根本的，是地缘与时代两个因素的结合，让香山文化从中华文化边缘地带走到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是移民社会的特点让香山人在异质文化交织中，保持文化自尊与文化宽容有机统一，呈现博爱与和谐，实现文化创新，这是香山文化最根本的特质”。“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洋文明冲击下进行文化调适、文化创新的结晶”。^②

开放性。从历史上看，香山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不断移民的社会，也是一个文化输入型的多元文化组成的开放融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香山人更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善于吸收、摹仿和学习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浓厚，有强烈的开放意识。香山文化中的一些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化的东西，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得到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香山文化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也一度成

^① 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2006年7月27日《南方日报》理论版。

^② 熊月之：《风起伶仃洋·序》，载王远明主编《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第3页。

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范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西方人的“中国观”。有的学者就指出孙中山是香山地区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是香山文化中一块绮丽的瑰宝，它对中国的近代历史，乃至现代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认为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它能够随着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情况，借鉴和吸收西方社会发展变化中的经验教训和适合于我的思想理论，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既显示出它是中西文化不断结合的产物，也显示出它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明显的与时俱进特性。孙中山民生主义的这一产生发展过程，既体现了香山文化的固有特性，也使香山文化的这一特性更为显著”。^①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或价值观，香山文化亦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大致说来，香山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明显表现为崇文尚武、顺应自然和重商传统。

崇文尚武。香山人历来就崇文重教。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许多英才俊彦，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早在明代中期，香山县的文化教育就与中原等地的水平不相上下。嘉靖年间，参加科举人数与日俱增，中举人数达 180 人之众，其中有 16

^① 虞和平：《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发展及其行政影响》，载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 284 页。

人考取进士，在道德文章上颇负盛名的不乏其人。如黄畿、黄佐父子。黄畿勤于著述，有粤洲先生之称；黄佐参加廷试，五试皆为第一，其著述甚丰，且广为传诵，时人誉为奇才。到了清朝，香山人读书应试者众，在清初至科举制废除的 200 余年内，香山出了 2 名探花，107 名进士，其中武进士 67 人；721 名举人，其中武举人 312 人。^①

顺应自然。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出海口伶仃洋上的若干岛屿，所谓“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说的就是秦汉时期香山地区相对独立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大海对缺乏勇气 and 智慧的族群来说，是一种天然的阻隔，香山的先辈们却能围海造田，并将之变成绿洲；大海，有时是一条暗藏杀机的险道，香山的先民却凭借她远涉重洋，开辟金山坦途。靠山抱海，没有内陆地区的封闭和保守，却因拥有深不可测、浩瀚无垠的大海而视野广阔。香山先民就是在这山与海的结合中历练出开放、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刚柔相济、开拓创新的文化品格。香山沧海桑田的巨变，部分归因于自然的伟力，更多的则应是人化自然的结果。香山先民在持久的与自然亲近的过程中，学会了适应、改造、转化和创新，形成了桑基鱼塘、果基鱼塘的循环再生的经济发展模式，成功地变沙田为良田。香

^① 《中山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山文化因而也在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中不断获得再造与新生。

重商传统。香山人向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宋代香山立县的县城石岐（史称“铁城”），一直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元明时期，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澳门与香山地区之间的贸易就更加频繁。明万历 19 年，大戏剧家汤显祖来到香山，被香山繁忙贸易景象所吸引，挥笔写下《香畹逢贾胡》，诗云“不住旧园不树桑，娥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山因地近港、澳和广州，中外贸易和区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境内除县城石岐以外，小榄、前山、香洲等地，也因商业的繁荣而成集镇。特别是清末民初，受孙中山民主革命和“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香山的工商业再一次出现蓬勃生机，县治石岐工商业在原来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香山文化在文化精神上主要表现为坚守正统与开放创新、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等对立又统一的精神品格。

坚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香山文化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多元文化并存是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表现，但是，香山文化在

本质上并没有因不断地吸纳外来异质文化而丧失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相反，香山文化在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中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和提升。孙中山先生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①

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香山靠山抱海，素有重农亦重商的传统。面对大海，他们很自然地有了探究天地之想；背靠大山，脚踏实地，注重实干和讲求实惠之情则油然而生。因此，香山人得山海相依之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一方面务实求真，趋利避害，具有时间效益观、开放效益观和变革效益观等商品意识，表现出趋利务实的个性；另一方面香山人又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对人生充满憧憬，表现出热情浪漫的诗性情怀。

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香山人历来就崇文尚武。如前所述，在历代科举考试中，香山籍文进士、文举人固然代不乏人，但武进士、武举人也层出不穷。香山人一方面素喜习武强身，保家卫国，在历代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斗争中刚勇顽强、大义凛然。南宋末年，马南宝毁家纾难、奋起勤王，后被捕不屈，壮烈殉节。抗日战争期间，领导珠三角地区人民浴血奋战、抵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抗入侵的珠江纵队司令部就设在五桂山区的古氏宗祠。另一方面香山人又具儒雅风范，富有艺术灵气。如黄佐、何曰愈、苏曼殊、古元、郑君里、阮玲玉等表现出的学者情怀和艺术家气质。香山文化因而具有刚柔相济、儒侠兼备的特色。

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沧海桑田的巨变和移民社会构成香山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香山人在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学会了思考和创造，学会了博爱与包容。一方面，他们善于适应环境和灵活变通，处事从容、稳中求进，表现出一种务实守信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香山人在人与社会和人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中，又表现出和睦友爱、守望相助、重礼尚义的人文精神。因此，香山文化具有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合一的文化品格。

第四节 香山文化的属性

要了解香山文化的属性，就必须首先对什么是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以及岭南文化、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关键性的问题有一个较清晰的认识。

岭南文化是什么？通常人们认为岭南文化是岭南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郑刚在《岭南文化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衡量岭南文化与衡量其他文化个体一样，不能简单地以地域和祖籍作为标准。岭南文化以岭南地区创造的文化为主体，但岭南人和岭南地区不是标准，一个文化的标准是它的实体风格。当一个文化的主导精神和统一风格贯穿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域，一段连续的时间，一群相互联系的人民中的时候，这个文化就构成了一个实体。岭南文化的主导精神是一种战斗精神、革命精神和革新精神。岭南文化的风格在它的全部历史中都存在着，是它的创造者和造物共有的精神特质的总和。从总的来说，岭南风格就是岭南文化的所有对象，包括材料、观念、意象、方法等等，在被创造或被改造时，都具有了生猛二性。生是新鲜、奇异并具有生命力，这特别体现于与旧文化的对比之中，岭南文化本质上的革命性和革新性就由此而来。与中原文化和传统文化相比，岭南文化更注意新鲜、奇异和有生命力的材料、观念，而猛则是力度、程度上的饱和，岭南文化在一切生活、文化层面上都以浓郁、猛烈为度，在精美度、实在性上都追求极度。而在另一方面，于文化的外在形式和总体风格上，岭南文化是丰富、多变，生猛的对象一浪接一浪地涌现出来。^①郑刚的这种文化审视和诠释，虽然抓住了岭南文化的特质、神韵，但却显

^① 郑刚：《岭南文化向何处去》，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7 年第 67—68 页。

得过于意象、诗化，不便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岭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本质和特征、价值与意义。

李勤德、刘汉东在《岭南文化论》中，从地理环境和文化形貌、文化转型与更新，以及文化构架和形成过程等方面，采用动态观察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岭南文化生成的环境与条件、文化构成的内容与形式、文化发展的内因与外因，文化分布和文化传播的特点等，均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对什么是岭南文化，仍然语焉不详。^①

李权时、周桢祥主编的《岭南文化现代精神》一书，对岭南文化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岭南文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范畴，是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体系，其依据有：

（一）岭南文化有自己的科学含义，有自己的科学内涵和外延；

（二）岭南文化有自己形成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三）岭南文化有自己的属性和特征；

（四）岭南文化有自己发展的轨迹和规律；

（五）岭南文化有自己的科学范畴、概念和理论概括；

（六）岭南文化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②

与此同时，李权时、李明华等在《岭南文化》一书中，又

^① 李勤德、刘汉东：《岭南文化论》，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② 李权时、周桢祥主编：《岭南文化现代精神》，广州出版社 2001 年第 3 页。

从文化哲学角度界定岭南文化，认为岭南文化就是标志着岭南人的本质力量发展水平的社会范畴，是岭南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岭南人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岭南人活动方式的总和。因此可以说，岭南文化是岭南人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存在物以及对象化活动的有机统一，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在本质上，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感性化、非正统的世俗文化。具有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享乐性、直观性、远儒性等特征。^①

这些关于岭南文化概念的讨论，无疑有利于我们全方位把握岭南文化的本质和特征

那么，岭南文化中的广府文化又是什么？

陈泽泓在《广府文化》一书中认为：广府文化是广府民系的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代表，它是以使用粤方言为语言特征，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珠江三角洲周边的粤西、北部分地区的民系文化。主要特征是开放、务实、善变。开放是民系的环境特征，务实是民系的本质特征，善变是民系的表现特征。^②

李权时、李明华等对广府文化的特征还有更深入的分析 and 评价，认为广府文化有六大特征：农业的多层次耕作技术以及

^① 李权时、李明华、韩强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6—88 页。

^② 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序言第 8—17 页。

经济的多元化，这是广府文化所有内涵的基础；广府地区是岭南商业贸易最活跃的地区，物质生活实用性是广府文化异常突出的特征；开放性和兼容性；强烈变革的意识和心理；平民性和市民意识。^①

虽然目前还没有形成科学的结论，但这些关于广府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看法，为我们了解香山文化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和启发。

对于什么是香山文化？目前多数学者相对认同的看法，是指以包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以香山为依据，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们之间对象性关系而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是中原土族移民人徙香山带来的汉族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并与西方文化交会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②这样界定香山文化，肯定有它的偏颇和缺失，但这一界定如同岭南文化、广府文化的定义那样，客观上有利于人们在更加明晰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层面来观察和研讨香山文化。事实上，这一定义已经比较清晰地表明了香山文化的地域范畴、文化主体、形成过程、构成要素和性质特征的独特性，从而使香山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华文化、海外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晰。

^① 李权时、李明华、韩强主编：《岭南文化》，第64—65页。

^② 胡波：《香山文化的现代诠释》，《学术研究》，2006年6期；王远明：《香山文化论纲》，《学术研究》2006年8期。

关于香山文化与岭南文化、中华文化、广府文化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香山文化的属性，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岭南文化和一般文化一样，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三个层次构成。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岭南文化的主体性、客体性和中介性三要素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都贯串着本根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汉文化、海外文化四个方面的内涵，它们共同构成岭南文化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特殊结构，表现出岭南文化的特殊本质。其发展经历了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中西文化碰撞期和走向现代化五个时期，在空间构成上，首先包括珠江系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其次包括桂系文化；再次包括海南文化，最后还包括近代以来的港澳文化。其中，以珠江系文化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广府文化无疑是最能集中体现岭南文化的历史发展、内容构成、性质特征。^①

香山文化经历了汉、唐、宋、元文化萌芽期、明清文化积累期、近现代文化成型期和当代文化发展期四个阶段，集中体现了岭南文化之珠江系文化中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是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南洋文化、西洋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它既有所属的大文化——岭南文化的本质特征，

^① 李叔时、李明华、韩强主编：《岭南文化》，第36—41页。

又有其自身独具的特色。其发展历程与岭南文化大体相同，到明清，特别是近现代，则成为岭南文化的火车头和代表者。可以说，成型时期的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本。^①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香山文化足以成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一是任何文化都脱不了其地域性，而香山文化的地域概念，包括现在的中山、珠海、澳门一带。这一地域虽历经朝代更迭，但总体上还是一体的，其中的居民，不论在生产、生活习惯，还是语言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共通性。因此，香山文化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二是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它应该既有大的区域文化共性，也应该有在这个大区域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小区域文化的特质，在共生之中有其独创，香山文化正符合这一特点。三是一种文化概念的提出，还应有一系列的文化人物和事例作有力的支撑。而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启蒙人物许多都诞生在香山区域内，这正可以作为确立这种文化的一个有利注脚。脱胎于此的香山文化，包含了岭南文化体系之中的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质，其本身又独具特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文化与岭南文化同步发展，演绎了中国近现代文明的壮丽篇章，是中华文明的优秀范式。^②从

^① 胡波：《香山文化的现代诠释》，《学术研究》2006年6期；王远明：《香山文化论纲》，《学术研究》2006年8期。

^② 颜泽贤：《香山文化·序》，载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这个意义上说，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则是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香山文化，实际上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识，丰富岭南文化内涵。

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则更是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内容和性质方面大体上与岭南文化同构同质，在历史发展和文化演进上几乎同步同速，二者相互促进，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论者往往误认为香山文化就是岭南文化中广府文化中的附属物，不能将香山文化与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岭南文化主体内容等量齐观，以为香山文化实质就是广府文化。其实这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读和对香山文化的误解。广府文化是广府民系的文化，是以使用粤方言为语言特征，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珠江三角洲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的民系文化。不仅与潮汕文化、客家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有着本质上和内涵上的区别，而且与涵盖粤、闽、客三大方言民系文化的香山文化有着质与量的差别。

从香山文化和广府文化各自的内涵和外延来看，香山文化具有广府文化开放、务实、善变等特征。或者说，广府文化的开放、务实和善变等主要特征，在香山文化体系中同样都得到充分体现。但是，不能因此说香山文化就是广府文化，或者就是广府文化的代表。因为在香山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与演

变过程中，广府文化并不是唯一的要素。事实上，以闽方言为特色的闽文化和以客家方言为特色的客家文化，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闽方言和闽文化在香山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山沙溪、大涌、环城、三乡、南朗、张家边等人口稠密的地区，隆都话（闽方言）和闽文化依然充满活力，就是有力的佐证。就是在珠海、澳门，同样有众多的人属闽方言民系的移民。他们大都是在明、清时期因海上贸易而南迁进入香山的。诚然，广府文化对香山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曾产生过持久而深刻的影响，甚至让人误以为香山文化就是广府文化或是广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香山经济社会的发展、粤方言和人口的分布、以及文化的传播与互动等方面看，香山文化首先不是象一些学者所说的完全是广府文化，尽管在香山文化系统中有着十分突出的广府文化的特点。

从文化的生成、特征和更新、以及其内容构成和本质特征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上可以看出，香山文化不是广府文化的派生物，也不是闽文化、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的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香山土著文化、中原内陆农耕文化、海外文化（西洋文化与南洋文化等）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香山同一区域汇集和互动的产物，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三大民系的人口和相应的文化的介入，以及相互间的交流与吸纳，直接决定了香山文化

的本质特征、内容构成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明清中外通商以来，闽人的商品意识和经商才能，广府人的开放兼容和务实善变，客家人的坚韧勤俭和耕读传家，西洋人的契约观念和理性精神，在香山这个山海交错的自然环境和方言驳杂的人文社会环境里，得到最广泛的交流和最有效的互动，从而使多元的异质的文化在明清以来的香山社会里实现了新的整合、转换和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和充满活力的香山文化。自明清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先导性、开放性、兼容性、务实性与创新性等特征的香山文化，甚至直接被誉为岭南文化的缩影，广府文化的典型代表。

总之，香山文化形成的历史、内在的结构和外在的表征告诉我们，香山文化不是广府文化，也不是广府文化、闽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和西洋近代文化的简单相加的产物，而是一种相对独立且又属于岭南文化范畴的新质文化。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就指出“香山文化理所当然应属绚丽多彩的岭南文化之一支，堪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支脉相媲美。香山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岭南文化研究的深入与扩展，而且也有助于整个中国文化大系统研究的深入与扩展。”^①

^① 章开沅：《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序》，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3页。

第二章 香山文化的成因

空间，是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作为地域文化，空间的限定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文化区域中，空间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单纯由物质形态展开的自然空间，即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地理环境，包括区域中的物质构造，土壤结构，山川河流，气象水文，地形地貌以及与人类生存有着直接关联的生物种类及植物覆被；另一方面，文化的空间又包括由人类的各种类型文化所构成的氛围，它从有机的、动态的角度，印证着地理环境无机的、静态的特征，从而成为文化区域中所特有的文化形貌。文化形貌是对某一地域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它是对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之间相互渗透和作用关系的一种概括。无论是地理环境或文化氛围，都是以空间的组合形式呈现文化的基本特征，而文化本身就是时间与空间的一体化结构的产物，正像文化不可能脱离空间一样，文化也不能脱离时间而存在，文化之所以成为一个“过程”，也就是基于它是和人类历

史并进的动态发展。^①按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看法，文化形貌是文化元素组织成统合整体的一种外观情况，包括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这些文化元素会根据自身特征出现一种文化布局，由于这种布局的不断协调和强化，最终出现的文化成就将“超乎其各部分相加的总和。”^②作为一种历时性的文化，时间流逝使文化的演变显得十分重要，而作为地域性的文化，时间则像匆匆过客，将文化形貌依托地域特征而遗留在区域内，从而使区域文化保留着强烈的地域色彩。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地理环境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就曾指出：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③

同时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盛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

^① 李勤德、刘汉东：《岭南文化论》，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第 11 页。

^② 《北美文化的行貌》，见李勤德、刘汉东《岭南文化论》，第 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多样化。^①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社会的双重存在，是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交织的环境中创造文化和文明的。在早期，由于人类的自身能力有限，迁徙和流动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不可能翻山越岭，远涉重洋，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环境选择和环境适应，当所选择的环境基本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之后，便在这一地域内的生活空间中相对定居下来，成为今天我们所谓的土著居民。这时期，地理环境的因素和特征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人类也运用自己的生产能力和思维意识开始改善环境，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生存生活的需要。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先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②早期香山文化，也被笼罩在定型化的地理环境的氛围之中。

第一节 自然生态环境

近代学者香山人何大章在《中山县地形志》一书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家乡香山地形地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中山县（1925年前为香山县）为珠江三角洲之一部分，所称三角洲，即粤省西江，北江及东江出口合力冲积而成之一大平原，其范围包括今本县、南海、顺德、三水数县全部及番禺、新会、东莞等县一部之地，据实测计面积逾九千平方公里，以本县所占面积最大，达百分之三十以上。本县地形，一般显示河口三角洲之特征，冲击现象至为发达。县境北部一片平原，田畴万顷，河道密布；中部及西南部山地崛起，自西南向东北，形势雄伟，西江干流自此出口，水流浩荡；海外岛屿，星罗棋布，景象万千，县境平原地形，山地地形及海岸地形毕具之，地形之复杂，较三角洲各县为甚，地力之富庶，物产之繁多，为三角洲之冠，其原因概关系于地势优越之影响。中山道光祝淮自序云：‘广州滨海县七，而香山独斗出海中，勃郁淑之气，……洵（广属）沃土奥区也，早有地理之见。’^①

先贤何大章这种全景式的鸟瞰和富有感情色彩的表述，使历史上的香山生动地进入我们的眼帘。

用今天地理学的观点看，香山地处低纬度，全境均在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太平洋辐射能量丰富，终年气温较高；濒临南海，夏季风带来大量水气，成为降水的主要来源；地形以平原为主，中南部有较大面积的低山丘陵和海岛

^① 何大章：《中山地形志》，第1页，广东中山文献会编印1950年。

分布。因此形成了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干湿分明，灾害较频的气候特征。台风、霜冻、低温阴雨、寒露风、暴雨和咸潮等，成为灾害之源，也直接影响香山人民的日常生活。又由于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南部，东临伶仃洋，珠江八大出海水道中有磨刀门、横门、洪奇沥等三条经香山境内出海。境内水资源十分丰富，且咸淡水交汇，河网密布，水陆交通相对而言较为发达，便于水上运输和海外贸易。因地形和地理构造复杂，高温多雨，香山境内的各种水生和陆生动物以及各种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为香山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生产生活资料。因此，远古时代，香山地区就有靠渔猎和简单的农耕为生的居民，他们也许就是最早的香山人。

据史料记载，远古时代的香山，只是珠江出海口外南海之滨的小岛。宋代以前的香山，实指五桂山及其周围丘陵、平原、海滨的地方，是珠江口西岸对开海面岛群中的一个较大的岛屿。香山岛山脉蜿蜒，面积 300 多平方公里，绵延连续 9 个山峰，其中位于中部的最大最高山峰有五个高峰，均产木犀（桂花一种）、岩桂，故称五桂山。又据史载：五桂山“多奇花异卉……多产芝菖蒲，……神仙茶丛生焉，色香俱绝”，“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①千百年来，香山岛由于山洪冲泻及岸滨积附，岛

^① 清·光绪：《香山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岸因此不断向外延伸，出现浅湾变海滩、海滩变沙田、沙田变陆地的现象。唐、宋时期，在五桂山的周围浅海处逐渐形成一些面积较大的平原，如平岚平原，石岐平原和南朗平原。唐代香山诗人郑愚的诗作《泛石岐海》，就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香山山海相连的自然景象：

此时携琴剑，
飘然事远游。
台山初罢雾，
岐海正分流。
渔浦颺来笛，
鸿逵翼去舟。
鬓愁蒲柳早，
衣怯芰荷秋。
未犬虞翻宅，
休登王粲楼。
怆然怀伴侣，
徒尔赋离忧。^①

郑愚的诗作表明唐朝时，岐江周围宽阔如海，上接来自西江、北江的水道，下分东河口、西河口两面流入大海。当时的

^① 《香山诗略》（上），第2页。中山诗社重刊1986年。

香山长洲、沙溪、大涌一带，皆属石岐海的海面。石岐的南面，史书记载的所谓南下码头，早就成为渔船和商船、客船停靠的码头。

到了明代，石岐仍然是海水包围、渔舟唱晚的商旅驿站，有诗歌为证：

香山秀山南海壖，
四围碧水涵青天。
七星峰峦拥楼堞，
北斗照耀开云烟。
云烟长白峰峦起，
复露千家连百里。
渔歌菱唱不胜春，
桂楫兰桡镜光里。
石岐夜泊白鸥沙。
南台渺漂浮梅花，
蛟浦澄澄洗明月。
龟城蔼蔼升繁霞。
繁霞明月从昏晓，
翠拱朱簷纷窈窕。
井奥空传北骑仙，

乌岩多见南枝鸟。

鸟飞仙去杳难寻，

木自成乔水自深。^①

就是到了清代，香山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依然是：

岐江返照夕阳平，

渡口喧闹发棹声。

历乱渔灯连远近，

呕哑人语杂乡城。

烟横两岸霜初落，

潮长前湾月渐生。

最岁绿杨分手处，

踟躇含睇不胜情。^②

浩荡三烟阔，

山明六县秋。

帆樯飞鸟疾，

日夜大江流。

邑井通蛟户，

^① 《香山诗略》(上)，第254-55页。

^② 《香山诗略》(上)，第200页。

人烟接唇楼。
自来边海地，
南顾不须忧。
郭外烟初合，
闲登近海峰。
千山连沅潏，
一气混鸿蒙。
沙屿浮朝日，
鱼梁号夕风。
梯航安可极，
怅望虎门东。^①

香山本土的诗人佳作所反映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环境，虽然不一定完全是实情实景，但诗人借景抒情之中，也无意地向我们展示了当时香山山海交融、渔农并存和商贸频繁的自然景观和经济社会状况。

事实上，历年来考古发现的文物古迹也证实了古代香山曾经沧海变桑田的历史。在今天中山的南朗、张家边、三乡、沙溪、大涌、黄圃、板芙、五桂山、石岐等地，均发现了不少人类活动的沙丘遗址和石器、陶器以及捕渔的工具。^②在珠海的

^① 《香山诗略》（上），第219页。

^② 《中山市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9页。

凤凰山脉和黄杨山脉周围以及附近海岛中，都发现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和石器、陶器以及网坠等。^①在澳门半岛及路环和氹仔岛，同样发现了古代沙丘遗址，出土了不少与海和渔业有关的文物。^②这些沙丘遗址和出土的文物表明，香山古代先民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已经懂得舟楫之利。他们选择依山面海、避风僻浪，有淡水，有潟湖或浅滩的海湾，从事渔猎活动和采集植物根果，始终坚持在这块山海交融的地方繁衍生息，薪火相传。

汉唐时期，香山岛周围的沙滩逐渐形成沙田，并得到不断入境的新移民的开垦利用，香山经济开始从“渔盐之利”向农商并重转变。唐代至德二年（757年）设香山镇，属东莞县辖。北宋香山镇是盐和银的产地，成为朝廷和地方财政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根据《香山县志》载，香山山场村在唐宋时期就有谭、陆、洪、萧四姓家族在此定居，他们主要从事渔、盐、农、商等生产活动。宋代，香山镇成为有名的盐场，盐业兴旺。在香洲银坑，宋代以产银为主，并成为香山县重要的财源。《元丰九域志》就有“东莞有香山崖银场”的记载。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有“恭常都鸡柏村银涌角宋初产银”的说法。

《广州府志》记述似乎更加详实：

^① 《珠海市文物志》，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

^② 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36页。

北宋末，距香山横石玃偏南约百里之釜涌镜，海隅有银矿，庶民争赴开采，至有举家迁徙者即聚居虞海边渍地，村民晨昏轮番入矿，挖百镞甚多，皆船运至府西之彩虹坊，由官窑鼓铸成银……^①

宋元时期，香山周围的沙田进一步得到开发利用，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特别是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香山以原东莞县香山镇（文顺乡）的行政区域为基础，“又割南海、番禺、新会三县滨海地益之”，建立新县——香山县（属广州）以后，农渔工商各业均得到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建县初期香山中部为香山岛，东部为海岛，西北部尽为滨岸或岛屿。香山各乡“筑堤护田，大兴水利。”他们在平原、山区和较早成陆地区，以修陂坝，建堤坐为主；滨岸、河网沙田和新成陆地区，以拍新围、筑大堤为主，变滩头、潮田为沙田。甚至在海中的香山三灶山，也有人筑围耕作，积极兴修围外水利。^②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关于香山田土类型划分的记载：

“香水土田凡五等：一曰坑田。山谷间稍低阔者，垦而种之，遇涝，水流沙冲压，则岁用荒歉。二曰旱田，高硬之区，潮水不及，雨则耕，旱干则弃，谓之望天田。三曰洋田。沃野

^①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珠海市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② 银铠：《中山邑史考》，第66—72页。

平原，以得水源之先者为上。四曰咸田，西南薄海之所，咸潮伤稼，则汛堤障之，依山溪水至而耕，然堤圯苗则槁矣。五曰潮田，潮漫汐干，汐干而禾苗乃见，海西潦东注，流块下积，则沙坦渐高，以草植其上，三年即成子田。子田成然后报税，其利颇多。”^①

又说：“古时五岭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后渐为州岛，民亦藩焉。东莞、顺德、香山又为南海之南，洲岛日凝，与气俱积，流块所於，往往沙坦渐高，植芦积土，数千百亩膏腴，可跼而待。”^②

何大章在《澳门地理》中也说：“本地附近中山县金斗湾、企人石一带潮田，均有海堤围护，以防咸水之入侵。”障海堤由原先的围护咸田转向保护潮田，一方面说明沿海潮田的开发广度已逐渐向外拓展；另一方面则表明沿海地区对潮田的经济价值较前代更为重视。^③香山由筑堤护咸田到护潮田的发展趋势，就说明香山人重视田地和农耕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用价值，也表明香山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适应自然，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和水平，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实行大规模围海造田的同时，古代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

^③ 刘森：《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香山人还积极开办盐场、渔场，发展农工商业。香山立县以前，香山场、金斗湾一带的大型渔场、盐场，以官办或地主富豪商办为主，产品多内运供应各大都会及中小市镇。立县后，县令陈天觉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使渔、盐二业迅速兴旺起来。香山场、金斗湾、磨刀门一带的海田、海滩，凡有澳、湾、洲、岛的地方，都有众多的渔民和晒盐、养蚝者集结，因而很快出现了大批新渔船、新盐场、新蚝田。以浅滩为盐场的有金斗湾、香山场沿岸的官办盐场和周围大批的小型盐场；以深海为渔场的有淇澳渔村、三灶渔村、濠谭渔村、濠镜澳渔村、神湾渔村、石岐海渔村和东海渔村等；以浅海为蚝田的有金斗湾沿岸、德庆乡的芙蓉沙、禄泉沙及深湾等地的小蚝田。渔业、盐业和蚝业的兴旺也推动了香山地区的农、工、商贸业和市镇的发展。在宋、元时期，香山各乡已经出现了集市、墟场，仁厚、丰乐、宁安乡还出现多个集市，区际货物交易十分兴旺。但是，集市墟期各地不同，或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较大的集市有石岐街市、平岚墟、小榄墟、山场街市和南朗墟等，^①石岐十八间商铺也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十多间新的铺面。香山人称定期集市为“墟”，长期设置之市场则称为“街市”。明清时期香山墟市已有 30 余处，

^① 嘉靖《香山县志》。

如所前市、南门市、埕头市、东门墟、坑口墟、山仔墟、南荫墟、水撒墟、斗门墟、沙岗墟、石岐墟、新墟市、沙溪墟、朔关市、万安街市、县前街市、西市、大井头市、上基市、大社坛市、沙园市、平岚墟、墟仔市、下栅墟、长沙墟、行流市、聚源市、鸡鸭市、迴栏市、泰宁市、三角市、大榄市、布行、下基、古镇墟、南镇市、岗头市、沙垌墟等。墟期各处交错，除农历初十之外，天天有墟。下栅、大涌墟期为农历一、四、七；南荫、沙溪、鸡笼（现东升镇）墟期为农历二、五、八；三乡、黄圃、石岐沙岗墟墟期为农历三、六、九，而小榄镇不设墟，天天为市。大年初三称为“头墟”，年终二十九，称为“尾墟”。

到了明代，香山出现了“农人以殖百谷，灶人以办盐额，织人以成布帛，牧人以蕃孳畜，园人以毓草木，渔人以备鲜错，猎人以储皮腊，市人以售酒食，矿人以攻金石”的局面。据史料记载，明代香山城乡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邑商人造其事，于县城西，集商十八间。另有所前市，在（县衙侧）拱辰街南；南门市，在南拱桥；埕头市，在学宫前；东门墟，在县治东附廓沙岗墟，旧在迎恩街（现孙文西路东段），明弘治初（1488年），迁于此，其（墟）期三六、九（日），贩布为盛。洪武初，县置税务使、副使、掌受商税、门摊、课钞、

解府折俸（商税扣除税源薪金后缴给省）。^①

到了清代，由于西洋商人纷至沓来，香山境内的澳门成为葡萄牙等西方商人从事海上贸易的枢纽，也成为西洋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香山商人因此得以与西洋商人进行贸易活动，西洋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成果，也得以进入香山人的生活领域和文化视野。清康熙年间（1680年），官府开放对澳门的陆地贸易，以今拱北关闸界口为交易市场，中葡商人贩运货物到此交易互通有无。这时期，香山出口的商品有生丝、粮食、茶叶、糖果、茯苓、瓷器、黄金等，进口物品有食盐、锡、蜡、胡椒、檀木、丁香、象牙、槟榔等。葡人在澳门所需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品，有相当部分是从香山县境的商铺里购买的，香山民间亦从这个口岸得到不少西洋的商品和器物，中西文化也在这里得到交流与融合。

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彭豫任香山县丞，在任期间因一桩经过香山入京的外国贡品发生问题而受牵连。香山县志是如此记述的：

时外物（国）贡方物自香山入京，典其事者失封缄。朝廷遣御史接问。事连豫，其子启愿以身代，邑民皇皇，恐豫得重

^① 李国瑞：《岐海商涛》，中山文史第30辑，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68—69页。

罚。会赫获免，民大喜，迎以归。坐是不得迁。^①

这件事表明，在明代就有外国贡船停泊在香山沿海码头。明代西方传教士利马窦在《中国札记》里也说，“他们（广东人）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但不能太快，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即贸易时期结束后，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一个贸易点。那里有一尊叫做阿玛（Ama）的偶像。今天还可以看见它，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在阿妈湾内。”^②清人尤侗所写的《默德那》竹枝词，也极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香山濠镜辨光芒，

妙女儿干进秘方。

最是同侪多意气，

郑庄千里不斋粮。

鸦片战争后，香山地区中外贸易更加频繁，许多进出口商品都在香山当地随行就市，见货议价，就地成交，然后由钱庄结算帐目。当时外贸入口主要有海味杂货，化肥、药品、烟叶、鸦片、煤油、火柴、布匹、棉针织品和机械工具、铜铁器皿；

^① 黄佐：《香山县志》卷五，《官师志》。

^② 利马窦、金尼阁：《利马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页。

出口货物以生猪、家畜、蛋品、塘鱼、生蚝、蚝油、干蚝豉、虾蟹、虾羔、谷米、果菜、蚕丝、夏布等为主，外汇岁入约 800 万两。后来，县城石岐出现了代理外国产品的商号，计有合诚号（在小榄设合诚兴分店）、怡昌洋行、光记公司、和记公司等，代理美英亚细亚、美孚、德士古的汽油、煤油、柴油、机油、凡士林、白蜡、沥青等产品的销售。还有其他商号代理销售外国药品、士敏土（即水泥）、洋面粉、奢侈品，甚至鸦片烟。港澳两地也从香山大量购买白米、塘鱼、生猪、白酒、果菜等生活品，每天数以十万公斤计，还转口大量中药材到世界各地。^①

表 5 1910 年拱北海关报告统计表

进口

货 色	估值关平银 (两)	运往何处	经 过
米 谷	3558134	新宁、江门、长沙	马溜洲
洋 药	2393032	新宁、香山、雷州、顺德	马溜洲、前山
棉 纱	1087464	新宁、东莞	马溜洲
鱼介各类海味	1009000	新宁、石岐、江门	马溜洲、东澳
糖	413591	新宁、长沙、水东、香山、阳江	马溜洲

续下表

^①李国瑞：《岐海商涛》，中山文史第 30 辑，第 100 页。

续表

煤 油	280726	新宁、长沙	马溜洲
香菌木耳	227611	陈村、江门	马溜洲
粉 丝	203321	新宁、江门	马溜洲
绸 缎	185049	新宁、陈村、顺德	马溜洲
铁路材料	132942	新宁	马溜洲
药 材	129452	新宁、东莞、水东、石岐、阳江	马溜洲、东澳
衣帽等类	129203	新宁、陈村	马溜洲
糠	126235	新宁、江门	马溜洲
面 粉	103523	新宁、江门、陈村	马溜洲
花 生	96827	新宁、江门、长沙	马溜洲
布匹类	182446	新宁、石岐	马溜洲
五 金	153470	新宁、阳江	马溜洲、东澳

出口

货 色	估值关平银 (两)	来自何处	经 过
白 丝	186210	龙江	马溜洲
野蚕丝	604026	龙江	马溜洲
乱丝头	11849	龙江	马溜洲
绸 缎	39724	龙江	马溜洲
席 子	423833	雷州	马溜洲
纸	341642	陈村	马溜洲
各类竹竿竹器	256598	江门	马溜洲
各种扇	253123	新会	马溜洲
红 茶	234881	新会	马溜洲

续下表

续表

各种木料	189969	陵水、陈村	马溜洲、前山
各种烟叶烟丝	308981	江门	马溜洲
鲜果及菜蔬	290193	石岐、陈村	马溜洲
牛羊猪鸡鸭鹅	308433	雷州、香山	马溜洲
柴	168616	肇庆	马溜洲
鱼介各类海味	107637	香山、石岐	马溜洲
香 油	141909	江门	马溜洲
酒	101103	佛山、石岐	马溜洲

说明：清末澳门与香山等内地之间，贸易关系十分紧密。

这是 1910 年拱北海关统计报告。

香山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为历史上的香山人生产生活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辽阔的海洋为香山人发展渔业、盐业、商业等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拓宽了香山人的事业，开阔了香山人的胸襟，使香山人较早地懂得了利用大海的资源 and 条件求生求存求发展。海岛、沙田和陆地，同样为香山人发展种植业和工商业，改善起居、饮食日用和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条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这种适应和改造山与海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香山人逐渐形成了内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区所不能具备的海洋意识和商贸传统。特别是泥沙淤积和潮田的出现，为香山人大规模地围海造田和沙田开发，实现从渔盐商贸为主的海洋经济向农、工、商并举的农耕经济转变，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第二节 历史社会环境

香山先贤郑道实在《香山诗略》中，曾对香山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作过富有诗意的表述：

“吾邑三面环海，有波涛汹涌之观，擅土地饶沃之美，民情笃厚，赋性冒险，圆阆栉比，林壑森秀。士生其间，既获游观之乐，复鲜生事之厄，孕育涵濡，历世绵邈；或则家承诗礼，学有渊源；或则起自孤根，性耽风雅，兴之所至，发为咏歌。虽则丰啬各殊，显晦异致，然关河边塞，能为激壮之音，吊往惊离，不胜凄惋之调，鉴其佳什，奚让前贤。兼以僻处偏隅，鲜通中土，无门户主奴之见，有特立独行之风”。^①

郑道实对家乡香山自然与人文的依存关系和互动结果的描述，也揭示了香山文化产生的人文社会背景的特殊性。

人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产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一旦产生，又置于社会关系之中，与自然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严格说来，地理环境和自然外貌，只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场景，只有当自然环境和人类

^① [清]黄绍昌等纂辑：《香山诗略》，中山诗社1987年重印，第318—319页。

生产结合起来，并互相渗透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才由此生发出来。这种人与自然的交互过程，通常称为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是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选择利用，改造和开发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所创造和建立的各类生活环境，都是通过人类物质生产力来完成的；自然的人化是地理环境因素在人为化的功能作用下出现的地域特色，地理环境的状况演化为区域文化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先决条件。前者是文化源起中由动态到静态的过程，后者则是一个以静态到动态的过程。它们平衡式的展开和交叉式的系结，从而成为香山文化生成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前提与条件。

远古时代，香山先民以蹒跚的步履出现在香山山海相连的这个生存空间之后，便以自身的努力不断地改造着自我的生存环境。但是，生存环境不同于地理环境，它注入了人类的意识和意志，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自身的生产活动，将简单无序的客体分布改造成系统的、有序的物质环境。人类进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地理空间改造、利用、开发成适宜自身生存环境的过程，即“人化的自然”的过程。而“自然的人化”主要是指对文化认识的观念形态，它也包括在此观念形态影响下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在这里，“人化”的痕迹常常显见于自然之上，“自然”则是附着于人的社会能动之下的特定区域的范畴和特

定生存环境的外部轮廓。这些范畴、环境的指谓，完全是基于人的作用而定型的。“人化”则不再是单单为着生存而努力，并完全按照环境怎样适应的概念，而是指人作用于某一地域环境，从而产生的社会制度、观念形态、思想意识、礼乐文明等文化的总和，加上环境感应所带来的区域色彩，展现了区域文化的建置构架和本质特征。它已迈出了单纯以人类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环境的发展阶段，成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促进意识强化的一种能动力量。自然的地理环境虽然也有一个随时间而改变的历史进程，但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固态的空间范畴而不是主观意识。所以，“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观念注入在周围环境之后的区域文化形成过程。^①

山海相连的自然环境和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一方面，决定了古代香山人以渔盐和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和以乡村耕读与商贾并重为特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断从中原和福建沿海迁来的新移民与本地居民融合后，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改变了自己，改变了社会，改变了自然，从而使香山山海相连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人文社会风貌融合在一起，形成初具雏形的香山文化。

^① 李勤德、刘汉东：《岭南文化论》，第11-12页。

香山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恰恰是香山文化形成的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见证。历史上不断定居香山的新移民，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和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利用海洋资源，向海洋要田要粮，筑堤造田，兴修水利，发展渔盐和农商各业，改变了香山原始的渔猎和不稳定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长期以海为生的香山先民开始朝农、商并重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迈进。香山沧海桑田的变迁也同时揭示了香山移民社会的本质和特征。移民使香山地区不断地让自然环境“人化”，同时也更加强化了香山社会的“人文”特色。

自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香山设县建制以来，香山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宋、元时期，南雄珠玑巷居民大规模的迁徙约有三三次，陆续个别南迁的则有 130 多次。其中迁入香山的人口主要分布在香山的小榄、南屏、谭井、平岚、大都、大车、麻子、濠涌、南塘、冈背、坎下、张溪、古壩、赤坎、海舟、莆山、南村、永原、象角、北山、四字都、山场、鸦冈、良都、麻州、隆都、水塘头、龙头环、唐家湾、婆石村、过城、四都黎村、大涌南文等地。^①南迁香山的五十五姓中，小榄十四姓，建成小榄围；曹、古二姓始迁曹步和古镇，垦辟荒垣，有人在附近建有四沙小围；王、麦二姓在黄旗阁辟丘造田，由

^①吴述超主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2 页。

麦氏“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名黄阁堤；当时尚在海中的三灶山，也筑起黄字上下两围。^①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福建人经由陆路或海路南下至香山。如谷都南湖郑族，始祖郑菊叟，于仁宗朝自福建兴化府（今福建省仙游县）入闽粤，任惠州路通判。家于都之榕树埔，徙桥头。子姓分支乌石、平岚、南屏、雍陌，约万余人。仁良都南湖郑族，乾道壬子年七月，由福建莆田县徙香山，卜居莲塘。……分居城内东里、深巷、基边、厚兴街、张溪、东了、库涌、柏山、沙溪等地。人口约千余。良都长洲黄族，始迁祖黄猷，字文宪，先世闽之福州人避乱徙新宁潮镜乡，凡八传至猷。宋理宗朝宝祐进士。景定三年，官行人，册封安南王陈日煊。归舟遭风漂泊至香山。复命后，遂卜居长洲。所娶平南林氏女为继室，生子佑孙广派定居良都，析居城北。分支大塾、麻洲、外界涌等处，人口约万余。仁都邑城高族，原籍闽之莆田，始祖师曾，官宝昌县丞，遂家南雄。子南洲，宋室祐乡举，初徙香城，孙参军添，猷粟饷宋军，从端宗至冈州御敌殉难。遗孤宸英，生子四，曰元生、梁生、洪生、忠生。其后分支城南麻洲马头街，治东节尾，新村、白庙、城西长塘街，隆都豪兔、岐坑、大石兜、青羌、良都、长环、尖涌、寮后北台、磨刀等处，人口约 7 千余。^②

^①吴述超主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第 149—150 页。

^②转引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31 页。

在明清时期，又有不少中原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入徙香山。如“沾涌陈姓，始祖景云，住嘉应府兴宁县，至九世祖秀潭，迁居增城，生四子……雍正初年（1723 年），移居香山沾涌。神湾刘姓，始祖进，原籍兴宁，乾隆二年（1737 年）祖尚德，迁香山神湾”。“旗岭下村毛姓，始祖元凤，雍正二年（1724 年）由长乐迁居邑下恭都神前村”。“沙埔洋罗姓，始祖德锦，由惠州龙川县迁来。”^①这些从北方迁徙来的新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厚重的历史文化，有效地补充了香山沿海沙田开发急需的劳动力，使大片潮田、沙田得到开发、维护和利用，改变了香山乡村社会结构也使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香山有了新的生气与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香山沙田为珠江三角洲之最，而且沙田土地肥沃，最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除此之外，还有渔、虾、蛤、鸭之利，是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土地。沙田又有浮生子田之利，人们在围垦成熟的母田边缘种植芦苇等植物，截积流沙，可以形成子田。一块有希望浮生的沙裙，经过数年或数十年之后，“有以百亩而生数百亩者。”此外，沙田税额也相对较轻，所谓“沙田之税皆斥卤，其输将甚轻”^②正因为沙田获利甚丰，明清初年，香山“滨海诸屯，帅暴横为民害，往

^① 厉式金主修：宣统《香山县续编·舆地区族》，1923 年刊本。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往泽民膏腴诬为荒废，据占自利，郡县不能制”。^①屈大均也说：

粤东之田，其濒海者，或数年或数十年，辄有浮生。势豪各为承饷而影占他人正熟之田为已物者，往往而有，是谓占沙。秋稼将登，则统率打手，驾大船，列刃张旗以往，多所杀伤，是谓抢割。斯二者，大为民害，顺德、香山为甚。^②

可见香山新老移民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和对沙田的开发，均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贡献。

但是沙田的好坏，关键在于基围的建设和对土壤的改造。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落籍香山的移民，根据自己对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认识，有选择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地利用海洋资源，发展以海洋经济为基础的农商混合型的多种经济。他们一方面向海洋要渔盐和商贸之利，另一方面又向海洋要粮田，发展农耕，稳定社会秩序，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曾属香山县管辖的黄阁，根据《小榄麦氏族谱》记载：“自宋南渡后，我麦姓五必公均南迁广州，而必达祖遂至黄阁，甫抵其境，见西沙高时，石门迴开，溪深悬泻，土沃泉甘，谓此诚避边。遂相彼隰，筑室而居。”而且“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在黄阁地区开始经营沙田的垦殖。明代嘉靖年间，香山有沙田

^① 康熙：《香山县志》，卷五。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

35 个，到万历年间“大小黄圃之沙坦弥多，顺民告承接踵。”^①

香山原先设有的盐场，也因“年来沧桑屡变”和人口大量增加，沙坦逐渐得到开发，结果是“斥卤尽变禾田”。^②

明代开始浅浮的坦洲，到清代光绪年间，“蚶洲周回八十里”，“西临大海，弥望稻田，万绿无际。”^③而鲟鲤沥，光绪年间已经是“海门内沙田日淤，昔之浩荡而去者，今则曲折回薄而不能达。鲟鲤沥适当咽喉之冲，沥以南卤渐退，而田日美。”^④离石岐 50 余里的横档山下的镇南村，“自乾隆己卯（1759 年）始有民居”，但到道光时（1821—1850），则“渚田日高，海水不溢，生聚渐繁。”^⑤宋元明清以来，历代迁入香山的族群，在沙田垦殖与海洋争地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学会了修筑堤围，防咸防潮，保护沙田，懂得用“种芦积泥成田”的方法加速围垦，创造性地形成“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的循环经济模式。清代香山诗人何纪就的诗作中，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乡村渔农生活和村民与水争斗的历史：

积海流天地，

双崖束一门。

^① 咸丰：《顺德县志》，卷三，澳地略风俗第 36 页。

^② 道光：《香山县志》，卷五，金石，万历四十三年《但侯德政碑记》，第 45 页。

^③ 光绪：《香山县志》，卷四，舆地上，山川，第 19 页。

^④ 光绪《香山县志》卷七，经政，水利，第 31 页。

^⑤ 道光《香山县志》卷一，舆地上，山川，第 79 页。

长堤盘岸石，
孤塔矗山村。
水落鼃鼃跃，
涛奔风两喧。
谋生渔罢乐，
即此是桃源。”^①

香山人吴建业也有诗为证：

东流汇横门，浩浩入涌口。
两山为门限，一塔作枢纽。
何人障百川，填海出巨手。
中流卧长堤，斥卤成千亩。
怪哉九窦闸，口与风涛吼。
乱石堆作滩，众水纳自牖。
蓄为鱼虾会，截断蛟龙走。
当其族窦时，快壮得未有。
急奔撼雷霆，震响落星斗。
纵横蟹入箔，跳跃鳞在罟。^②

张铁生在《沙田行》中更自豪地说：

海水摇天天不动，海岸积沙沙成陇。

^① 李浩主编：《中山农韵》，中山农业委员会，中山诗社1997年编印，第8页。

^② 李浩主编：《中山农韵》，第8页。

潮来潮去几经年，沧江转瞬变桑田。
初时鹤立还防倒，继乃膏腴能种稻。
底须卖剑买耕牛，奇货可居珍似宝。
不愁西潦不愁风，万顷黄云岁屡丰。
何止多收十斗麦，令人美煞富家翁。
井田废自泰商君，青苗耦起壬介甫。
而今立法重升科，取什之一仿前古。
我来试作沙田行，绿章叶草奏通明。
乞将世上不毛地，尽化沃壤苏苍生。^①

诗人的记述虽然不能完全看作实景描写，但从诗人的吟唱中，亦不难想象其时香山人在与海水和大自然作斗争时的胆识和胸襟。到了民国时期，香山乡村的景象又有了明显的变化，1919年《濠溪月报》中刊发的隆都村歌，就较翔实地记述了当时香山隆都村的自然与人文社会风光。歌词大意是：

泛舟渡岐海，吾都曾遍游。
境入山溪角，聚族皆姓刘。
借问黄与郑，大小亦庞头。
上巷有人居，一村隔田沟。
高山虎逊岩，驯伏大石兜。

^① 李浩主编：《中山农韵》，第10页。

俯瞰沙平下，林壑尽清幽。

掉头白坑口，顺步出豪吐。

绕道过南樟，依稀认新路。^①

从这首村歌里我们不难想象香山人聚族而居、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生活状况和人文社会风貌，也不难体察当时香山人对乡村田园风光的内心感悟和由衷赞赏。

有的学者在对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史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堤围史，为了适应人口的增长，为了改善生活的环境，人们修筑堤围。堤围的修筑，使人们从被动变为主动，这是人们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的过程。”而“昔筑坝以护既成之沙，今筑堤以聚未成之沙；昔开河以灌田，今填海以为陆”，则概括了珠江三角洲沙田垦殖的历史。^②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香山沙田开发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人口迁移香山的移民史。进入香山的移民因迁移的时间不同呈现出各自相对独立的族群特色。如从珠玑巷进入香山的麦姓、何姓、李姓、赵姓和黄姓、郑姓、陈姓等宗族，与从福建进入香山的同姓同宗，在习俗语言和行为方式上就有较大的差别。至今，迁入香山的客家人、福佬人和广府人仍然保

^① 《中山文史》第51辑第163—164页。

^② 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持着各自的族群文化特色。^①不过，由于长时间的沙田开发和持续频繁的贸易活动，迁入香山本土的客家人、闽南人和广府人在语言文化和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融汇，在改变对方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如大约在三四百前进入香山的客家人，到达中山前，平原地方已为当地福建、中原等地的移民占据，他们只得居于五桂山的脚下。早期虽与操闽语和粤语的居民相距不远，但来往甚少，语言交流互动的机会也较少。近现代以来，客家方言受粤语的影响较大。相较而言，中山闽语与粤语之间的相互影响则比较明显。有研究材料表明，南朗闽语语音成分的渗入才是石岐话语音产生南朗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②

香山经济社会正是在移民不断地对香山海湾和沙田的开发利用中逐渐得到发展和进步的，香山文化也是在这种移民构成的社会和对外贸易与交往活动中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香山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开发海岛和向海洋拓展的历史。而由粤、闽、客三大方言民系的移民构成的香山社会，就是香

^① 参见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甘甲才：《中山客家话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林洪主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志云：《珠江三角洲城市文化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张书琛主编：《体制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人的价值观》，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② 甘甲才：《中山客家话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

山文化生成的人文社会基础。

第三节 发展变革动因

香山文化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内因和外因，又取决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具体说来，也就是除了以上所说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人化的自然等外部客观条件的推动作用以外，还有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和外在的历史社会变革的推动。香山的历史地理变迁表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香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遭遇过多次的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形成了一个兼容并包、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体系。香山社会发展史，既是一部移民史，又是一部创业史；既是一部革命史，又是一部爱国史。从整体上看，促使香山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移民与社会融合对香山文化的推动。

在交通和通讯等沟通联络手段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人口迁徙。某一地区人口的膨胀或社会动乱，往往会造成大量的人口迁移，而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必然造成异质文化的交流。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是精神文明、学术文化的结晶。士人流动必然形成学术文化

与思想观念的传播。古代移民大都是仕宦或中原望族，因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优势，是难于长途跋涉和大规模的异地迁移的。三国、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历史转折或大变动时期，曾有几处大规模的中原人口南迁。历史上的香山县，就曾多次接纳了大批因战乱和其他原因被迫迁徙的中原望族。

南宋咸淳十年（1274 年），由于官军追杀私逃出宫的苏姓贵妃，使定居南雄珠玑巷的 33 姓 97 户人家，结伴逃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有部分人落籍香山^①，并与当地土著融合，逐渐成为香山社会的主体。南宋末年，宋端宗及其部属兵败逃避到尚不发达的香山。南宋覆灭后，大批宗室和部属的后裔又相继流寓香山。元大德《南海志》中亦有这样的记载：“大抵建安东晋永嘉之际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广者众，由是风俗变革，人民繁庶。至宋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甚至有人认为“建安以后，中原人士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于是衣冠礼度，并向中州。”^②《小榄麦氏祖谱》也说：“自宋南渡后，我麦姓五必公均南迁广州，而必达祖遂至黄圃，甫抵其境，见西沙高峙，石门迴开，溪深悬泻，土沃泉甘，谓此诚避地，遂相比隣，筑

^① 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永乐大典》卷 2339。

室而居。”而且“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开始在黄圃地区经营沙田垦殖。明清时期，又有不少中原内陆其它地区的大户人家南迁香山，在此耕读传家，繁衍生息，逐渐成为香山社会的一支新生力量。

大量来自北方内地农耕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移民，带来了香山沙田开垦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经验、技术、资金和劳动力，也带来了成熟的且较为先进的礼俗文化，如宗法制度、家族组织、宗教信仰、方言俚语、生活方式与民情风物等。尤其是来自福建沿海富有商业传统和海上贸易经验的移民，他们落户于香山的沙溪、大涌、三乡、环城、南朗等地，聚族而居，农商并重，表现出开拓创新、务实进取的精神品质。

大量移民进入香山，不仅加速了香山地区沙田开垦和土地利用，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也推动了香山地区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事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宋元时期，县境西北部大片海域淤浅成陆，包括今小榄、古镇、东升、坦背、横栏镇的大部分地方，在自然的伟力和大量的人力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形成广阔的平原，后人称之为“西海十八沙”。其主要沙洲是：

榄面沙（今小榄镇沙口、东区村）；

螺沙（今小榄永宁螺沙）；

流板沙（小榄绩西村流板、顺成）；

绩麻沙（小榄绩东一、绩东二村）；

高沙（东升高沙村）；

乌沙（东升镇益隆、东升村）；

白鲤沙（坦背白鲤村）；

太平沙（坦背太平村）；

庵沙（坦背永丰村）；

观音沙（坦背观栏村）；

石岗沙（横栏三沙村）；

同戈角沙（横栏同戈角、裕祥村）；

白 村（横栏五沙、六沙村）；

指南沙（横栏指南村）；

拱北沙（横栏宝裕、同裕村）；

横栏沙（横栏横东村）；

鸡翼沙（横栏横西村）；

赤洲沙（横栏横西村十三顷）。

但当时由于人口稀少，仅小部分沙田开垦成农田，用作种植水稻、菱角、咸水草和养鱼等。

到了明代，由于新移民的进入，民屯和军屯发展迅速，西北部出水成陆的沙洲继续增加，并逐步得到开垦。中部从石岐

西北到浮虚山宽阔的石岐海面，当时也已成为“海中多洲滩，种芦积泥成田”之地。由于沙洲不断增多，在今黄圃、南头、东风、阜沙、三角、浪网、民众的大部分和港口东北部扩展成大平原，即人们所谓的“东海十六沙”；范围包括：

大拗沙（今东风民乐、同安村）；

中沙（东风和泰穗成村）；

罟步沙（今东风东罟步、西罟步村）；

坡头沙（今南头镇南头、汲水、民安、华光村）；

吴婆沙（黄圃吴栏村），马鞍沙（黄圃马安村）；

石军沙（黄圃石军村）；

浮圩沙（阜沙镇阜圩、牛角、南强村）；

大南沙（今阜沙镇上南村和港口镇惠民、横河村）；

三江沙（今三角东会村）；

白鲤沙（三角沙栏圩、合作、乌沙、和平、东平、光二村）；

浪网沙今民众浪网、上网、东星、万安村）；

鳘称沙（民众锦村、锦丰村）；

田基沙（民众新平、五四、新民村）；

海心沙（港口群乐八村）。

到清代，“东海十六沙”大部分沙田已开垦成田，并且“因农成村，因村成市”，形成圩市的有 10 多个沙洲。清代磨刀门

水道以东的板芙、神湾、三乡、坦洲等地的沙滩，也先后浮露成坦，得到开垦。至清嘉庆道光年间，香山耕地增加到 125 万亩，人口增至 43 万多，农业发达，成为广东著名的粮食产区而被列为大县。^①移民在对沙田的围垦和开发利用，以及推动香山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定居香山，开始有意识地修筑庙宇、祠堂，举行各种祭祀、拜神、节庆等大型文化娱乐活动，（如小榄的菊花会，各村镇的迎神赛会、赛龙舟、飘色、舞龙舞狮舞鹤），兴办书院和私塾，提倡子孙走科举进仕的道路，定期组织各种曲艺演出和诗歌唱和等交流会，使一些中原习俗和民情风物，在他们的推动下，进入香山社会和文化教育领域，最终成为香山乡规民约和民俗风情的一部分。香山文化因此增加了新的文化成分。

其次，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冲击。

广州自秦汉以来，已是我国南方著名的海外贸易港口。《史记》中早就有“番禺（即今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玑、毒瑁、果布之奏”的记载。^②《汉书》里也有南越“处近海，多犀、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的说法。^③广州之所以商贸发达，“盖此

^① 《中山市志》（下），第 725—726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②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

^③ 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

地为由西南海上至文化灿开，物产丰富，而为唯一产丝地之中国之咽喉，且系古代奢侈品象牙、犀角、毒瑁、翡翠及珠玕等南货输出北方之出口地，更位于西江主流之乌泥江及沿其支流；而与今云南、贵州、四川等腹地交通之要隘，是故自汉以前，则已有海陆两面之通商，且颇为繁盛，此由种种事情推之殆无疑焉。”^①

唐宋以后，随着大量人口南迁和经济重心与文化重心南移，广东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物产更加丰富，墟市日趋繁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②香山地处广州之南，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周玄暉在《泾林续记》中就说：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待万金，并海外珍奇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船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各有长例。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贲，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③

尤其是在葡萄牙人正式租住澳门之后（1557年），中外商贸活动更加频繁。尽管清政府曾三番五次实施海禁，指令严禁

^① [日]藤田本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35页）

^②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五、六、七章）

^③ 李金明《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帆船私自出海和不许商人与外商有任何往来，甚至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要求“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①但事实上，“海禁”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东南沿海贸易，中外商贸活动仍在沿海、特别是香山地区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香山境内的澳门等地的商贸活动甚至得到朝廷的默认和广东地方官员的保护。1718年，康熙皇帝就批准了两广总督杨琳的奏折，同意“澳门夷船往南洋及内地商船往安南不在禁例。”^②在这种似禁非禁的环境下，香山对外贸易以澳门为中心，一直十分活跃。葡萄牙人更是以澳门为基地，开辟了澳门——果亚——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通过这些航线，葡萄牙商人把中国货物生丝、丝织品、瓷器、铁器、铜、锡、水银、糖、火药、棉布、花生、栗子、枣子、药材等，运往印度、日本及西欧各国；又将各国的货物如胡椒、苏木、象牙、檀香、银子等运到澳门进行贸易。明万历年，壬临亨在《粤剑篇》中说：“今聚澳中者，闻可万家，至十余万众矣。”澳门就是依靠广东、福建尤其是香山县附近地区提供商贸和日常生活所需的劳动力、粮食、肉类、蔬菜和大量的商品交易，才迅速发展起来的，并成为早期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可以说自明清之际开始，特别是到了清朝中晚期，香山县

^① 夏琳《海纪辑要》。

^② 嵇璜《清廷文献通考》，卷七十二，《市 考二·混舶互市》。

便一直处于中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冲突与交流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皆关乎国政，事无巨细往往直达朝廷”。^①

中外通商，不仅仅局限于物与物的交换，货与货的比较，事实上，在物物交换中也传播了多种多样的异质文化。荷兰历史学家戴闻达就指出：

中国人考虑对外贸易之所以重要，总归赋有各种混杂的因素。从实用观点来看，对外贸易意味着从中得益的无数人的兴旺繁荣。国库依靠进口税而充盈，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尽管银钱外流成灾，但从外贸所获利益，特别是对南方各省来说，颇为可观。整个海外贸易主要是指奢侈品，即各种宝玉、檀香、迷香和沉香，香料、珍稀珍品，而这些货物的消费者都是富有阶级的人们，首先是朝廷及后宫贵妇们。^②

也就是说，东西南北洋的货物汇集澳门，不仅为包括香山人在内的中国人了解世界各国民情风物、山川地理、生活式样、风俗习惯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使当时的香山人看到了西方工业革命的惊人成就和科学技术的神奇。同时，在中外通商过程中，香山人最早学会了西方的语言，如葡萄牙语和英语等，较早较全面地了解西方商业习惯和交往方式。曾一度成为中外商贸过程中通用的“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就是较早地从广东、

^①马明达：《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序》，第2页。

^②戴闻达著、胡国强译：《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特别是香山地区开始使用并流行起来的。近代中国香山买办就是“广东英语”的集大成者，“香山买办”因此也成为近代中国买办的代名词。^①

伴随商人和商品而来的还有西方传教士和游客。葡萄牙人于1553年正式进入澳门，大约在这前后，耶稣会士亦来澳门活动，并逐渐形成以澳门为基地的珠江三角洲天主教传播区。不少香山人因生活所迫和其他原因，开始改信耶稣。1746年澳门同知张汝霖就在奏章里详细地报告了中国人在澳门入教的情况。他说：

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门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但其中已有数等。或变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变服，或娶鬼女而长子孙，或借资本而营贸易，或为工匠，或为兵役。又有来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辩，亦欲自附于进教之列，以便与夷人交往者。此种 倏来倏去，不能查其姓名。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十九人。而林先生番名咕大吼吵，住持进教寺内，率其子与其徒，专以传教为事。周世廉番名安哆弥咽里也，又呼卖鸡周，俨然夷船之主，出洋贸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为在澳进教之魁也。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者，缘

^① 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澳门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建于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阔大，系番僧倡首而唐人醵金以建者，向系林先生住居其中，以行医为名，实为传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斋四十九日，名曰封斋。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惟顺德县紫泥人为最多。礼拜之后，有即行返棹者，有留连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到澳，亦必入寺礼拜。一切进教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经诵习。^①

康熙曾一度重用传教士，发生‘礼仪’之争后，于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雍正即位后，采纳了浙闽总督满宝的意见，实行禁教政策。满宝在奏折中就明确指出：

“西洋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教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②

在雍正时期，天主教的活动便严格地限定在澳门范围内。乾隆时，更加严禁中国居民入教和传教士传教。1744 年（乾隆九年），澳门同知印光任在报告中特别强调：

^① 转引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黄鸿钊：《澳门史》，第 528—529 页。

^② 《东华录》卷一、二。

澳门民夷杂处，致有奸民潜入其教，并违犯禁令之人窜匿潜藏，宜设法查禁，听海防衙门出示晓谕。凡贸易民人，悉在澳夷墙外空地搭篷市卖，毋许私入澳，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责令县丞编立保甲，细加查索。其从前潜入夷教民人，并窜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报回籍。^①

1746 年广东政府决定查封澳门唐人庙，“飭令地方官督令该澳夷目严加封锢看守，不许擅开。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内地民人复踵前车辙者，立即严拿治罪。”^②1749 年，香山县又拟定澳门治安条例刻石颁布，其中第十二条规定：

禁设教从教。澳夷原属教门，多习天主教，但不许抬授华人，勾引入教，致为人心风俗之害。该夷保甲，务须逐户查禁，毋许华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结缴送。倘敢故违，设教从教，与保甲、夷目一并究处，分别驱逐出澳。^③

但是由于禁教令时紧时松，传教入教之人似乎不曾削减。1830 年澳门估计有 6090 名中国教徒，其中有 7 名中国神父，天主教堂和相关设施也一直不断地增添，以致澳门成为培养传教士和翻译人才的摇篮和西洋建筑的大都会。^④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

^②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

^③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

^④ 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华人进教，自然在冲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关于这一点，从当时澳门同知、香山县令的奏折和规定中就可窥见一斑。^①传教士在进行传教时，还创办学校、报刊、翻译、出版西书，介绍西方声、光、电、化和西医西药，展示西方科学技术新成果。在澳门葡萄牙人协助下，中国人逐渐掌握了铸造和使用火炮的技术，西洋火炮在清代因此得以逐渐推广开来。与此同时，西洋的科技产品和手工业品也由澳门相继传入香山和中国内地。如玻璃与玻璃制品中的屏风、杯、灯和各种类型多种用途的西洋镜，洋舶（商船和军用舰），纺织品（布、绒、纱等），锡器，硫磺，席，钟表，刀剑，香水，药水等，对于当时的香山人来说，无疑是新鲜事物，并且大开眼界。^②在 300 多年的时间内，世界各国的动植物如番狗、洋桃、香荔枝、番薯、西洋花草、洋山茶、洋葱、木货、烟草、鼻烟、香货、胡椒、贝多罗、丁香树、茶靡等相继进入香山地区。^③甚至西洋的建筑艺术和绘画音乐、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等，亦进入香山人的视野和日常生活领域。^④可以说，鸦片战争前，香山在近 300 年的中西物质文化和精

^① 黄鸿钊：《澳门史》，第 530—531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黄鸿钊：《澳门史》，第 560—565 页。

^③ 黄鸿钊：《澳门史》，第 566—570 页。

^④ 黄鸿钊：《澳门史》，第 570—581 页。

神文化方面的交流互动中，受到多方面深层次的影响，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甚至语言表达方式上均发生了新的变化。可以说，没有以澳门为中心的长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就没有香山文化的脱胎换骨。

再次，近代以来的海外移民和华侨社会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香山文化的转型和发展。

香山人去海外谋生，史籍可考者上溯南宋末年，下至近现代。明清时期虽然也有香山人到东南亚和日本等国谋生，但人数较少，而且断断续续，不成规模，影响也不大。香山人大规模地漂洋过海去寻求发展的现象，还是在新旧金山发现以后的事情。鸦片战争后，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香山人纷纷结伴出洋，到美国旧金山、夏威夷、纽约，加拿大的温哥华，澳洲的悉尼、墨尔本和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去“淘金”。这些漂洋过海的香山人在海外艰苦创业，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便回家乡买田建房，娶妻生子，投资实业或捐资助学，支持家乡慈善和公益事业，改良乡政，修筑路桥，改善交通，甚至将海外的工农业产品带回家乡，使香山经济和社会生活均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澳洲华侨马应彪、郭乐、李敏周、蔡昌等人回国先后创办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开创了中国民族百货业的先河。旧金

山华侨严迪光父子回乡创办迪光电灯所，夏威夷华侨朱英利在石岐创办朱英利织袜厂，澳洲华侨郑泗全集资创办东镇东路有限公司，开办协和米机和协和电灯公司，英国华侨郑芷湘集资开办岐关东路有限公司，经营石岐、澳门关闸东西两路的客运业务。^①

大量侨汇也刺激了香山的建筑业，商业、运输业、工业、金融业、文化娱乐业和公益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侨汇不断增加，香山银业有了快速发展，仅石岐县城就由宝衡、永福利、广其昌、福和威等 24 家金山庄发展到 48 家，比过去翻了一倍。^②有的华侨积极出钱出力，甚至拼出性命支持孙中山发动的民主革命，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回国投资实业，支援祖国和家乡建设。民国建立后，檀香山华侨纷纷持一技之长回国服务。据郑东梦《檀山华侨》记载统计，从民国建立后至 1929 年间，回国从政者 55 人，从商者 38 人，从医者 6 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者 28 人，从事工业交通业者 7 人，共 145 人。^③据刘振光《檀香华侨》一书记载，华侨为家乡和祖国捐输的款项：1930 年美金 51546.48 元，1931 年美金 22628 元，洋银 12310

^① 《中山市志》（下），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1131—1132 页。

^② 《中山市志》（下）第 1137 页。

^③ 叶显恩：《香山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载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第 107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二版。

元；1932 年美金 76975.95 元，洋银 261392.5 元，港币 1000 元；1933 年美金 7988.045 元，洋银 50922.72 元。^①从 1852 年至 1882 年间，回乡者达 4000 多人。寄钱回家和回乡省亲，在当时视为理所当然。又据《檀香山采风记》作者于 1900 年估计，每年从薪金中汇款回家者约有银洋 240 余万元。按当时在檀香山的华侨人数计，每人汇银洋已达百元。华侨寄钱回乡，除少部分用来改善家庭生产条件外，大部分投入生活性的消费。由于这些货币投放市场，对促进香山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镇建设以及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均起了积极作用。

华侨不仅是推动香山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是促使香山文化具有世界性和先导性的关键因素。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动时期，他们不仅将海外异质文化带回家乡，而且还将家乡和祖国文化带到海外。华侨实际上成为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桥梁。总之香山社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发展变化，华侨的作用显然不可磨灭。

最后，重大的社会变革，直接影响着香山文化发展变化。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革常常推动着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的变化。香山文化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

^① 《香山文化》，第 106—107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二版。

经历了几次大的社会变革。而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香山文化的发展。

第一次是南宋末年宋元海战期间，大批宋朝的皇亲国戚，商人、武士、官宦、乡绅等避难香山，并落籍香山成为永久居民。像这样大批高素质的人口进入香山，客观上加速了香山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从落后到进步，从低层到高层的转变。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时期，香山同样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阵痛。这一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给香山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在开发沙田和围海造田的过程中，香山人很快掌握了新的生产技术和沙田改造的方法，形成了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的生产模式，提高了土地产生的效益，改善了生活条件，也加速了香山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变革。如沙田的开垦和农耕制度的改革，就为香山乡村社会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新近出版的《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就有大量关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文献，它们较充分地反映了明清时期香山地区在经济大变革的过程中，于政治制度、社会管理、社会控制，以及文化教育方面始终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的客观历史。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都为香山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次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诞生，以及模范县的设立，既使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的观念植根于民心，又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热情。特别是清末民初，香山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都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政治上，新的县政府在辛亥革命后迅速成立，革命党人开始掌握地方政权，经济上，工业、农业、服务业开始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又如香山设立农务会和香山自开埠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香山地区农、商社会的发展。1909年在《香山县属西海十八沙龙洞农务分所简明章程》中，就明确表示，“本会所遵照农工商部奏定农会章程办理，以互助团结共图公益为宗旨”，并指出：

本会在香山毗连新顺之地，正蚕桑蕃盛农户荟萃之区，多系顺德侨民耕种于此，素来农情涣散，罔知公益，向少教育，积习愚悍。虽田畴万顷、土质肥沃，奈固执旧艺，拘于成见，不明种植新理，灌溉土宜之方，欲图开通民智，习勤祛惰，化莠为良，亟应设立农务分所，多派演说启发愚蒙，并设农事半夜学堂，庶教育渐能普及。

本会创办伊始先设农事演说会场，选聘农学毕业生演说农学新理，改良种植。境内土质、物产、化学肥料有益于农事者陆续调查研究，一俟会份广大，经费充裕，禀请地方官通详查

核，次第兴办。^①

文化教育和人民社会生活，也有了相应变化。新式学校的创办和移风易俗的提倡，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客观上加速了香山社会的转型。

清末《香山县志》续编中就有这方面的反映：

先是邑中习尚豪侈，遇婚丧各事，辄糜巨款，以故世家中落者多，贫者更因窘竭。又妇女喜缠足，其父母徇于习惯，类皆以忍为慈。邑绅屡有提倡，俗仍未革。光绪中晚有识之士，联合同志，如戒奢会，天足会，皆先后设立。复刊派约章者相遵守，巨家入会者数百人。久之而奢俗渐除，妇女亦自求解脱。宣统以后，渐少弓鞋莲步之迹矣。

溺女恶习前三十年黄梁都有之，自郑京卿藻如提倡禁戒，而明达士绅复为之痛切劝止，三十年来，此风遂绝。^②

香山于民国 14 年（1925 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县。民国 18 年（1929 年）被确定为模范县。在模范县时期，中山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均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 1933 年统计，全县小学由过去的 18 所增加到 440 所；中学由 5 所增加到 9 所；县立幼稚园由 2 所增加到 4 所；此外兴办县立乡村

^① 《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上海古籍社 2006 年，第 968—969 页。

^② 清末：《香山县志》，续编·风俗·卷五。

师范两所，并在全国率先实行义务教育制，设立义务教育实验区，在北山和唐家先行试点。同时，创办民众学校 40 所，开办民众教育馆，推行民众识字，扫除文盲。文化方面，全县有 4 家日报社，各区周、旬、月报刊约 30 多种，阅书报社 203 所，通俗图书馆 2 所。^①北部的小榄还成立了民众教育馆和挽世风剧社。^②体育方面，县设“体育委员会”，有体育场所 6 个，国学（武术）传习所 20 个，举办了中山港第一届体育运动会。中山港足球队甚至代表中山县赴省参赛，并取得了省运会的足球冠军。^③卫生方面，在唐家湾建立中山港公医院，免费为民众施医赠药。同时还赠种牛痘，预防天花，在防止各种流行疾病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种植鸦片和吸毒，被严令禁止，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戒烟所”，^④社会风气因此大大好转。

“模范县”时期，人事改革、组织管理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同样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总之，“模范县”的设立，以及清末民初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为香山文化从传统迈向现代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⑤

^① 《中山市志》（上），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② 《中山市志》第 1350 页。

^③ 《小榄镇初志》，第 182 页，1986 年内部准印。

^④ 沈锦峰、唐仕进：《唐绍仪与中山“模范县”》，珠海市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编，《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⑤ 胡波《思想人物与历史文化》，湖北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第 218-221 页。

1931年12月3日拱北海关税务司巴斯图在送呈的海关报告中，这样描述当时中山县的景况：

中山县昔名香山，为孙总理故乡。嗣奉国民政府明令，改称中山县，以资纪念，现名中山模范县。该县行政系由中山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该会共有会员十五人，公推唐绍仪氏为主持，综揽会务，于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旋经议决开辟中山港（该港本名唐家环，即唐绍仪氏梓里）。该会为促进开辟新港计，乃于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命黄居素县长，将县府所属个机关、除司法局仍留原址以便人民外，其余财政、教育、建设、土地各局均迁往该处办公。期年以后，事实委员会章程重加更改，规定该会主席兼任中山县长职务，黄居素氏遂于二十年三月十六日卸职，而由唐绍仪氏接任焉。回溯黄氏以前历任县长，则依次为卢家驹、陈永安、李藩、郑道实、梁鸿光及李禄超诸人。石岐昔为县府所在地。且为全县贸易中心，其市政建设业已举办多端。如拆除城墙、展筑公路、开办中山医院等均是也。

中山港本名唐家环，位于中山县境，内连陆地，前临大海。淇澳岛横亘于前，西江支流环绕左右。港内最深水道名金星门，界于唐家环与淇澳岛之间，内有岬角突出。岛角之中，势成海峡，宽约半哩水位颇深，堪停巨舶。惟海底礁石暗布，四隅屏

障亦付厥如，勢須建筑海壩，并实行濬渫工作，方得成为优良泊船之所。至于港湾以内，则水量较浅，低潮时期距岸一二哩地方，船只犹难碇泊，纵使勉强得停，而客货上下，必赖驳船运送，殊感不便。且自东北以迄东南一带，屏蔽毫无，一遇飓风，危险实甚。是以欲成良港，尚待竭力规划耳。惟是港口优良，即谓足以促进地方之繁荣，恐亦未必尽然也。试观澳门港口原属甚浅，与现在中山港相埒，嗣经葡国当局不惜巨资，兴工修濬，外港水量乃得渊深，且复努力建设，以期周备，乃工商各界以及经济状况迄未急剧发展。反之，省内石岐、江门、公益、长沙、狄海各处均无良港，而繁荣景象蒸蒸日上，非明证与？

中山县不但为中山县政府所在地，且扼香港与西江交通之咽喉。开港以后，粤省出口土货及华南各处进口货物咸冀取道于此，不复经由香港转运，利权得免外溢。至于转口贸易，其取道香港或运经本部实无轩輊，盖以经过香港之土货仍可按照转口税则缴纳税款也。惟往来港澳及石岐（距唐家环十五，为商业重镇）之民船，如果经由中山港进口，则所缴运费较昂，船商未必乐为。其以轮船拖带之民船，现均经由马溜州及伶仃岛往来台山、新会、石岐、江门等处。该项船只将来是否变其航程，舍此就彼，亦难逆料，但澳门渔户为便利购食盐及必需

品计，或有聚集中山港之可能。惟查渔民聚集澳门垂百余年，安居乐业，不啻故乡，欲其改弦更张，犹待积极奖掖，优予便利，方克有济，是在治港者审慎筹划耳。揆诸现势，本港进口货物当以自港澳输入之蛋、炭、麻、皮、猪、赤糖、木材、麦粉、海产品、花生油等为大宗，而出口货品则推咸鱼、陶器、鲜果等为巨擘也。

拱北税务司巴斯图甚至在报告中，还并对唐家的变化作了一番描述：

唐家一隅，街卫雅洁，气候温和，人口约有万余。自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山县政府由石岐迁治于此后，地方日形繁盛，建筑事业亦趋蓬勃，而机器米坊、缫丝工业已见萌芽，石岩炼油厂（自广州湾运输石岩，炼制扁陈油及烟油等）业已设置。凡此诸端，实开新兴工业之先河。自来水长虽尚阙如（居民饮料仰给井水），而银行、学校（可容学生八百人）、新式市场及行政机关等（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及唐加环商埠筹备会等）亦均略具规模。岐关路局复自该路分站之下栅建筑之路一条，直达此间，以利交通而便运输。不但此也，该村密迩总理故乡，钟灵毓秀，桑梓敬恭，观光遗迹、浏览新港者当不乏人，商市繁荣兴有利焉。他如县内农业丰富，旅居海外侨民众多，汇归

款项为数滋巨，在在皆足以促进新港贸易之发展焉。^①

这些记述虽然不能全面反映中山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全景，但从侧面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模范县”时期的一些真实情况。

^① 莫世祥：《拱北海关报告》，澳门基金会 1998 年版，第 119—123 页，第 122—124 页。

第三章 香山文化的嬗变

第一节 香山社会的发展

香山的历史虽然谈不上悠久和源远流长，但香山文化的产生和形成也是有史可查的。

距今 6000—5000 年前的五桂山，仍然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上有海拔 530 米的高峰，山麓有山体形成的多曲折海岸和大海湾。大量考古发掘的沙丘遗址和贝丘遗址，以及摩岩石刻和捕捞工具的残迹表明：大约在 6000 年前，珠江三角洲包括香山在内的地区已有人类在此活动。他们有的在海岛海湾安营扎寨，打鱼为生，兼及采集、狩猎和一定的农业，日常生活也能勉强维持，而且在这里形成并留下了沙丘遗址；有的在江河边或江河入海口的陆地，大量采集贝类作为食物，进而形成含有大量贝壳和文化遗物的贝丘遗址。后来因为海平面不断上升，湮没了他们生活的陆地。为适应海平面上升，人们很自然地就

近往高处迁移。在珠海的淇澳岛的后沙湾、高栏岛宝镜湾、三灶岛草堂湾、香港东湾、澳门墨沙湾、深圳咸头岭、大梅沙等地，仍然有一些早期的居民顽强地生存下来，并留下了一些遗址遗物。^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珠江三角洲古文化，既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文化特点。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前阶段，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居民就与粤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过较密切的文化交流。这里出土的彩陶、白陶圈足盘，从形制、制法、纹饰、风格特点等各个方面，都与长江流域大溪文化同类器物有着明显的相似性。但在新石器中期，这一地区整体上以绳纹夹砂陶为特征，陶质粗糙，流行圜底器，不见三足器，陶器的基本组合为釜、罐、圈足盘、圈足盆、钵、器盖、器座、筒形杯、碗、支脚等。纹饰方面，制纹手法上，刻纹、划纹和贝印纹都颇具特色，其纹饰图案也相当丰富，还有斜线、曲折、水波、三角、菱形、连弧等纹饰，甚至还有编织纹、附加堆纹等。彩陶和白陶虽然颇有特点，亦较精致，并能起到一定的时代标尺的作用，但是，在整个遗址出土陶器（片）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②这一现象表明，珠江三角洲一些文化因素与另外一些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相互影响，并没有改变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相对独

^① 肖一亭：《先秦时期的南海岛民》，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第 60-61 页。

^② 肖一亭：《先秦时期的南海岛民》，第 62 页。

立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先民们在这一地区创造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海洋文化。”^①

但是，远古时代的香山文化，严格说来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地域文化——香山文化。作为地域文化，香山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还是在唐、宋以后的漫长历史阶段实现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香山文化与香山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其演变的过程大至经历了汉唐以前萌芽期，宋元明清积累期，近代成型期，现当代发展期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996年出版的《中山市志》，曾将中山850多年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认为其经历了从下等县——大县——模范县——特等县——县、地级城市几个经济文化的历史阶段。为了便于人们理解香山文化的发展历程，这里不妨将《中山市志》划分的五个阶段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1、下等县阶段

清代以前的香山县，由一群海岛组成，彼此没有陆地相连，人口稀少，可耕地少，经济落后，故在宋、元、明三代均被朝廷列为下等县。明《永乐大典》中就这样介绍：“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宋、元、明三朝，沙田虽然

^① 肖一亭：《先秦时期的南海岛民》，第63页。

得到开发，农田面积不断扩大，农、工、商三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受朝廷变动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影响，香山经济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清顺治到康熙初年，朝廷曾几度实行“海禁”、“迁界”，使岛民不能出海捕鱼，生活难以为继，再加上海盗为患，导致香山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许多岛民被生活所迫，或违禁下海，或迁徙他乡，或远渡异国，“穷困无归”。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东宣布“迁界”令废止，经济才逐步有所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有了新的气象。

2、大县阶段

清代中晚期，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民国初年近240年的时间，因“迁界”令废止，中外通商再次频繁起来，加上大量沙田得到开发，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均有了较大的发展。至道光年间，“乃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同列大县”，结束了长期贫困落后的局面。嘉庆《香山县志》记载：

明永乐夏税一拾三石，秋粮米一万八千七百六拾十，崇祯夏卤米二万五千八百一拾石，则香山终明一代，仍属下县耳。

到清代嘉庆和道光之世，税地一万余顷。道光《香山县志》

就有这样的记载：

嘉庆拾九年，知县马德滋查报通县居民九万三千七百拾六户，男女四万四千四百五拾丁，女拾七万九千五百九拾二口，蛋民一千二百九拾九户，男三千六百五拾九丁，女二千三百五拾四口，合计全县人口四拾二完九千九百五拾五人。

宣统元年（1910年）增至百万，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均有明显的发展，时人就说：“节义文章，駸駸日盛，民物繁殷，驾他邑之上。”（129）^①

3、模范县阶段

1929年2月，国民政府第19次国务会议，以“中山县为总理故乡”，“该县为粤中最繁盛之区，岁出甚钜，民智早开，人才辈出”等方面的原因，确定中山县为全国模范县。当时中山已经有“鱼米之乡”的美名，粮、油、糖、蚕丝、蔬菜、水果等品种都比较齐全，禽畜、水产、农产品种类也十分丰富。远销国内外和港澳市场的名牌产品有三沙龙芽粘、库充马铃薯、金山种甘薯、奇其乐白花番薯、神湾菠萝、九洲基龙眼、张家边猪、沙栏鸡、石岐乳鸽等。就地方财政而言，年财政收入“竟及贵州一省”。虽然“模范县”的建设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① 何大章：《中山县地形志·序二》。

许多规划大都没有付诸实施，但“模范县”时期的创制和建设，已经为中山后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唐绍仪就认为“中山模范县，应是名副其实的模范县，不是一块空牌子”。

^①他认为“经济组织改良”，“思想道德进步”，“民生问题解决”，

“推动文化发展”，全县民众能“共有、共享、共治”，就是模范县要走的路，^②唐绍仪主政中山模范县的五年，应该说是民国时期中山县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山的经济文化在全国也一直居于重要地位。连心豪教授认为：“唐绍仪开辟现代化港口，从事对外开放，发展民族经济，开设无税口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雄心壮志，无疑是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物。虽然唐绍仪这一大胆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但其主观动机却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③1948年11月，广东省政府再次将中山县确定为全省示范县，这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激励。遗憾的是由于政局动荡，又长期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模范县”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其示范作用因而也就大打折扣。

在1947年出版的《中山县地理志》初稿“导言”中，何大

^① 唐兆狮：《我与唐绍仪的关系》，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② 《建设新中山言论集》，载引《唐绍仪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6页。

^③ 连心豪：《中山港无税口岸述论》，载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222页。

章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家乡中山县的：

中山县为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之诞生地，昔称香山县，中山先生逝世后，易名中山，以示纪念。县境临珠江出口，海陆境域五千余方公里（陆境二千，白余方公里）人口近一百万之众，生产发达，几无一不冠于全省，抗战期间更为全面抗战之最前线。）

县境位于广州三角洲之南，粤省西北江出口之处，地势平衍，水道网织，气候温和，土壤肥美，人口稠密，耕作殷盛，是以物阜民丰，一切产业、交通、运输之发展，均居本省首位。全县田畴密布，作物众多，年中稻作二获，可有兼岁之食，鱼鲜、蚕丝、甘蔗、果蔬等，所产极丰，中外驰名。境内村里相望，往来紧密，水道公路，舟车相接，北至广州，西出江门，南达港澳，货物畅销。县治石岐，在全县之中，商业交通均至发达，为三角洲米市；北部小榄镇，为农业大市集；南部澳门，开阜三百余年，与香港并称繁华。县民多务农业，淳厚成性，风气先开尤富进取精神，外侨之发达，革命之发祥，亦有其因。

全县自然，大致相若，地势河流系统，均有共通之性质；气候、水文、土壤亦有一致之表现。人文上主业、运输、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尤多相同，是以米良之增进；土地之改革，乡村之建设，航行之改善，此均全县人民所共同切望者。县境

北部概为冲积平原，土壤最肥，农产至丰，为本县主要生产地，惜以地势卑低，时遇水患，兴办水利，是为急务；中部多为山地，坑田潮田，耕作有限，土地利用，未尽完善，急宜开垦土地；南部全属岛屿，土地星散多山，不利农耕，人多以海为生，发展渔业，是为要图。此外，澳门问题之解决，其他城市工业之建设，物资之交流与调节，关系全县经济发展至大，凡此诸端，当局者知所从事矣。^①

何大章的概述，应该说比较全面而又准确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

4、特等县和现代城市发展阶段

1950年4月，中山县以其人口稠密、土地广阔、财税丰厚、被广东省民政厅列为特等县。在这一时期虽然珠海、斗门从中山县划分出去，部分地方划归番禺、顺德、新会，县域面积缩小了，但经济总量并没有因此减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山大胆引进外资，大力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和中外合资企业，做大做强市属工业，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中山市从一个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县市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

^① 《香山文存》第2辑，第165-166页。何大章：《中山地形志》，广东中山文献会1950年编印，代序——中有“文字”的评价。

龙头，三大产业齐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精神文明不断进步，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198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800 美元，被国家统计局列为我国第一批 36 个跨入小康水平的城市之一。2006 年，全市生产总值达 1037 亿，居全省第五位，是全国 30 个生产总值超千亿元的城市之一，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5 年被列为国家首批文明城市。

《中山市志》将中山 850 年多年的历史分成下等县、大县、模范县、特等县和现代城市五个发展阶段，虽然主要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划分，但也客观地反映了中山 850 多年的曲折历程，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节 香山文化的演变

从文化史这个角度看，香山文化的发展轨迹大体上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吻合。从文化形态学上看，香山文化也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唐、宋、元三个朝代，为香山文化的萌芽期，明清约 400 年的时间 of 香山文化的积累期，近代约 150 年的时间 of 香山文化成型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则为当代为香山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期。

(1) 唐宋元萌芽期

这一时期香山县仍是由海水包围的一些岛屿组成，可耕面积较少。但大批中原内陆移民先后进入香山地区，为香山沙田开发和农业生产补充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力，也为香山文化教育和社會进步增添了活力。据不完全统计，宋元时期，香山人参加科举考试，有进士 4 人，举人 5 人，乡贡 12 人，荐辟 23 人。^①尤其是宋元海战后，大批南宋王朝赵氏族人 and 士宦之家迁入香山，使相对落后的香山增添了浓厚的封建文化气息，儒、佛、道三教文化也相继进入香山。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的村社组织开始成为香山社会的主流文化。同时也出现了中原内陆文化和香山海洋文化交汇，外来人口与原住民融合的现象。香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在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生机。由于宋元之际政治社会环境不太安定，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经济仍然不发达，文化建设因而也没有很好的根基。香山文化在这一时期仍处于萌芽状态，其地域性和相对独立性还没有形成。

(2) 明清积累期

香山文化到明清时期开始进入积累或沉淀的阶段。明代，香山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元代的“西海十八沙”

^① 《中山市志》，大事记，第 16—18 页。

的基础上,这时期又出现了“东海十八沙”,农业用地增至 58.56 万亩,石岐以北,浮虚山以南宽阔的石岐海,已改造为种植水稻、菱角、水草和养鱼的沙田。又由于明末 1557 年,葡萄牙人租住澳门,香山对外贸易和海上走私活动日渐频繁,出现了“农人以殖百谷,灶人以办盐额,织人以成布帛,牧人以蕃孳蓄,园人以毓草木,渔人以办鲜错,猎人以储皮腊,市人以售酒食,矿人以攻金石”的社会分工和专业生产的现象。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后,“海禁”解除,洋货入口获得批准,出洋的侨民准许回国或陆续汇款回乡,加上朝廷政策开始宽松,香山经济社会又出现了发展的势头。到了嘉庆道光时期,香山便成为上等县。与此同时,香山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也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改进和加强。明清时期政府对外贸市场的监管力度比以往更大,澳门被列为特区,设立专门机构,对“就居者”严加管理。

明万历年间(1574 年),官府在莲花径附近设置关闸。康熙十九年(1680 年),官府开放对澳门的陆地贸易,以今拱北关闸界口为交易市场,中葡商人肩挑贩运货物到此交易。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官府在澳门关前设立海关,并放宽对澳门的海路贸易,外地商贩到关闸界口市场贸易更加便捷。香山县商民也顺理成章地贩运大量货物到此成交。香山县境村镇墟市

活动也得到进一步规范和管理。《香山县志》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邑商人适其事，于县城西。集商十八间。另有的前市，在拱辰街南；南门市，在南拱桥；鳌头市，在学宫前；东门墟，在县治东附廓沙岗墟，旧在迎恩街，明弘治初，副使、掌收商税、门摊、课钞、解府折俸。

这就表明当时官府对工商业已有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使工商业在政策的许可下逐步走向正常化。

明清时期，是香山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阶段。经济有了活力，社会因而有了生气，文化也因此昌盛起来。1545年，香山最早的书院仁山书院创建，乡村教育也受到重视，参加科举之人也较过去为多，从洪武年（1374）至1645年，香山科举名列进士13人，武进士3人，举人101人，武举人21人，贡生和监生277人。^①香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居民文化生活和社会风貌因此有了较大的改变。全面反映香山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情况的《香山县志》，在邑人黄佐的努力下编纂印行。经济生活有了改善，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热心人士甚至评出了金鼓朝阳、石岐晚渡、南台秋月、浮墟春涛、阜峰文笔、天池芰荷、金紫岩溜、长洲烟雨等香山八景。清代乾隆时期，香山人民生活状况虽然仍存在所谓“民繁地瘠、家鲜余资、衣

^① 《中山市志》，大事记，第23页。

食取给农圃”的现象，但民间对文化教育格外重视。香山各乡村先后办起了 10 余间书院。古镇的景巷书院，小榄的榄山书院，大黄圃的鳌山书院，小黄圃的旗山书院，平岚的桂山书院，雍陌的东山书院，翠微的凤池书院，前山的凤山书院，下栅的金山书院，坑口的龙山书院等，就是在乾隆时期陆续兴建起来的。^①到了嘉庆时期，（1796—1820 年），又有云衢书院、潭山书院、悦山书院、三山书院相继建成。道光时期（1821—1850 年）和同治时期（1862—1874 年），又新增澄澜书院、天衢书院、佑贤书院、卓山书院、烟洲书院和毓贤书院。按同治《香山县志》记载，除仁山书院已废外，全县共有 21 所书院。由于全县各地陆续办起书院，“弘诵之声便于田野，而延师课士之规视丰榄（指丰山书院和榄山书院）以为准，漪欤盛哉！”

除了书院以外，还有社学，即具有蒙学性质的教育机构也建立起来。明清二朝代，香山社学有了较快的发展。据嘉靖《香山县志》记载，香山县社学大馆创于明朝嘉靖二年（1523 年），以总全县各乡都社学子弟。当时知名的社学有社学大馆、东门社学、东隅社学和莲峰社学。清朝、农村知名的社学，按同治《香山县志》所说有古镇社学、昆山社学、曹溪社学，而城内社学大馆等 4 所社学则在此期内停办，此外性质类似社学的乡

^① 《中山市志》，大事记，第 26 页。

学还有黄梁都乡学，凤岗乡学等。另外还有义学和私塾，甚至还有更为专业性的医学和阴阳学。^①

民间的文化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小榄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举办第一届甲戌年菊花大会。曾是文人圈子的赏菊吟诗活动，开始扩大到整个社区，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成为始祖南迁定居小榄的历史见证和大族确认身份的一种标签。其目的和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大族的精英是想通过定期举办菊花会，表明他们在当地的存在由来已久”。^②

在明清时期，香山乡村的宗法势力和地方精英(士绅)，在乡村治理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均起了重要作用。在香山的各乡都，到处建有宗族祠堂。同族同姓的且在同一村落里甚至同时建有多个祠堂。如南朗茶东村陈氏宗族就建有三个大小不一的祠堂。宗族的祠堂不仅是一个亲属组织，更是一个社区组织。^③祖庙也成为民间信仰表达的场所，每逢神诞节庆，祭祖和拜神的活动都会把捐资者和信徒动员起来，其中每年中元节举行的“打醮”活动就是这类仪式的一个高潮。这种定期进行的“打醮”活动，既是一种祭拜的仪式，又是一种社会动员的大众性文化活动。用学者的话说，“地方节庆活动其实就是本地

^① 中山市教育委员会编：《中山市教育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② 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载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第35页。

^③ 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载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第30页—31页。

文化和政治话语的活力。”^①

总之，明清时期，中外通商，文化交流，社会流动，经济发展，为香山文化的积累和沉淀，传承和创新，奠定了主观与客观的基础。香山文化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示出其独特的个性，崇文尚武、农商并重、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等特点日益明显。香山文化的地域特征，也在各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香山文化具有海洋特性，表现出冒险的精神和开放的品格，重视工商业，追逐渔、盐和商贸之利，富有浪漫、豪迈、洒脱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又务实勤俭，坚守正统，重视宗法、性事农圃、好慕虚文，注重名节，表现出典型的农耕文化特性。香山文化在山海交错的自然环境和移民社会的文化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3）近代成型期

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在西方列强炮口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实行五口通商。香山人因地近香港和澳门，较早地与西洋人交往，熟悉西洋人的语言表达、生活习惯、行为规范和社交礼仪，甚至对西洋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等均有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很自然地成为五口通商后中外交往的中介人或中坚力量。

^① 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载王远明主编《香山文化》，第30页—31页。

首先，香山涌现了一大批洋行买办。

据不完全统计，1830年至1900年的70年内，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十分之九，其中香山人为数最多，几乎占了大半。香山唐家的唐廷枢，一家三代都做买办，他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其中有八九家属国内或地区内首创。香山北岭乡的徐润，也是著名的买办和实业家，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重要经营管理者之一，更是19世纪上海颇有影响的“地产大王”和“茶叶大王”。香山三乡雍陌村的郑观应，既是著名的买办商人，又是有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实业家。他热心时务，先后出版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具有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的论著，不仅首倡“商战”论，而且还是第一个公开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也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甚至改变了清王朝统治者对待西学、洋务的看法。香山金鼎会同村莫仕扬家族，也是三代任洋行买办。莫仕扬本人就是太古洋行香港总行的第一任买办，为太古洋行在中国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祖孙三代历任洋行买办达半个世纪，其家族或亲戚朋友充任太古洋行买办者累计千余人，太古洋行员工中就流传着“只知有莫，

不知有英”的说法。在五口通商后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莫仕扬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四大家族，互相提携，共创大业。他们借助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成批迁移到上海、天津、汉口、九江、厦门等通商口岸城市，成为洋行在通商口岸最信赖的买办商人。尤其是刚刚开埠的上海，香山人几乎在与外贸和商业经营有关的洋行、商号、钱庄等领域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上海的宝顺、怡和、琼记、太古等洋行中的买办，就主要是香山人。^①十九世纪的香山几乎成了买办的故乡，香山买办甚至成为买办阶级的代名词。^②香山买办在洋人的庇护下，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着买办和商业经营活动，在近代中外贸易、洋务运动、甚至晚清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中，成为事实上的先驱者和创造者。一方面，他们是洋行买办或买办商人，是中外商贸过程中的中介人和实践者，有力地推动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同外商的密切接触，认识到新式企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当时任何其他阶层的人形成同样的意图之前，就已经投资新式企业，并积极身体力行地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在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成为真正经济上的富有者，政治上的改革者，思想文化上的引领者。^③香

^① 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第5-6页。

^②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③ [美]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

山买办商人的开放、务实、进取、创新精神，与江浙宁波买办相比，表现出更浓厚的海洋文化特性，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香山买办文化。

其次，香山人率先走向世界，成为近代留学西洋的先驱。

香山南屏人容闳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经历，苦心孤诣，努力奔走十七年，最终促成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的实施。他希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在当时到美国，好似天涯海角一样，去而不复返。一般家长父母是不愿其子弟远行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容闳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得到香山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的支持，说服乡亲帮助幼童出洋留学。在120名幼童中，广东人83名，约占60%（江苏22人，浙江8人，安徽人，福建2人，山东1人），其中香山人39名，约占全省的一半，占全国的1/3。^①容闳等香山人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可谓殚精竭力、劳苦用心。这批留美幼童回国后也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力量，“他们对于商业及友好关系上，带给中国正确的方向和利益，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和进步，而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友邦中。”^②除了容闳和留美幼童外，香山还有不少人率先进入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求学，如容闳的同

^① [美]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

^② [美]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珠海出版社2006年。

学黄胜、黄宽，也曾赴美求学，黄宽后来毕业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黄胜后来因病回国，充任中国驻美出使馆译员，后又长期从事出版业，介绍西方文化。以容闳为代表的香山人，在传播西洋先进文化，融汇中西文化方面均起了推动作用，并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文化观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史观。容闳就认为“革命之在中国，固屡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而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因而积极主张中国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良，其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

再次，香山人在近代中国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大旗，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积极推动经济变革和政治革新，成为近代民主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189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创立兴中会时，入会的20多名会员绝大多数是香山人。1900年至1905年加入兴中会的195名会员中，香山籍的就有79名，占总人数的40%。同盟会成立前，

兴中会 268 名会员中，有 98 名香山籍成员，占总数的 30%。最早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起义人员中，香山人的表现也尤为突出。^①早期香山籍士绅刘学询支持孙中山固然别有用心，但同乡富商黄咏商的支持和水师军官程奎光、程璧光和程耀宸，以及陆皓东的参与，就给了孙中山莫大的鼓舞。程奎光、程耀宸、丘四以及陆皓东的牺牲，更坚定了孙中山反清革命的信念，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就说：“皓东沉勇，其节之烈，皓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他们虽死，其精灵之蒙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②正是在同乡及亲友的支持下，孙中山不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兴中会，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为民主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还以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精神，组织和发动了近 10 次武装起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开启了闸门。香山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也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向现代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动时期，香山买办和香山留美幼童，以及大批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的华侨，积极回乡投资实业，兴

^① 胡波：《思想人物与历史文化》，第 100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235 页。

办学校、医院和改善交通，改良乡政等举措，对于移风易俗，改变香山人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审美观念、行为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均起了直接或间接作用。香山因地近港澳，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香山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近代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谱写了激动人心的乐章。这里不仅涌现了一大批在文学艺术方面卓有建树的杰出人物，而且还产生了一群“志在冲天”的航空将领和军政要人，以及工商界的精英人物。他们虽然有的在外地出生，对家乡香山县知之甚少，或根本没有感性认识，但他们通过同乡团体和各种社团组织，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仍然会产生比较强烈的乡土情结和家乡身份认同。（补郭绪印的上海同乡团体方面的资料）以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莫仕扬等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官场和商场上的成功经历，成为香山民间社会羡慕和追寻的对象，并激励着香山人走出香山、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尤其是在清末民初澳洲侨商马应彪、郭乐、郭泉、刘锡基、李敏周、蔡昌、蔡兴等，先后创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既改变了传统中国商业的运作模式和经营理念，也为家乡人进军工商业和改善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就业创业的机会。源源不断的侨汇和各种资金流向家乡，也拉动了家乡香山的生产和消费，使香山城乡生机盎然，充满时代感和富有现代气息。

清末民初的香山县，市场繁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中外贸易和民间商贸活动，成为香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清末香山输往顺德、江门等地的稻谷价值白银 500 多万两，茧丝价值白银 100 多万两，输往澳门、香港、广州等地的水果、蔬菜、海味价值白银 90 多万两，输入外大米价值白银 30 多万两，输入布匹、杂货、砖木价值白银 600 多万两。全县输出大于输入。全县人口到清末增加到 184872 户，822208 人。有清一代，香山科举名列武探花 2 人，进士 40 人，武进士 67 人，举人 409 人，武举人 312 人，贡生和监生 589 人。^①

表 6： 1930—1939 年石岐部分物价表

物 品	规 格	单 位	年 度 (单位:银元)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生油	土榨	市斤	0.211	0.216	0.226	0.189	0.151	0.192	0.262
食盐	生盐	市斤	0.056	0.056	0.054	0.056	0.060	0.059	0.058
食糖	榴花白	市斤	0.121	0.115	0.194	0.167	0.168	0.174	0.203

续下表

^① 《中山市志》，第 33 页。

续表

米酒	30°	市斤	0.139	0.137	0.139	0.140	0.139	0.134	0.137
白布	23×21 龙头	市斤	0.084	0.099	0.109	0.092	0.092	9.092	0.088
肥皂	源昌双刀	条	0.080	0.088	0.083	0.083	0.083	0.083	0.075
毛巾	大良 242 劳动巾	条	0.160	0.158	0.151	0.136	0.103	0.117	0.144
纸张	31×34 日报纸	张	0.011	0.011	0.014	0.012	0.012	0.009	0.013

(资料来源:《中山市志·上》)

表 7 民国廿八年(1939 年)中山谷米价格表

品 种	价格(银元)
金风雪谷	11.4
金风雪米	15.8
金山粘米	18
旧新兴白米	17
丝苗粘米	18.7
旧龙牙粘米	18.5
金风扑米	14.9
雪赤扑米	15.5
本地玉糠	7.2
暹南白糠	7.8

(资料来源:《中山民国日报》民国廿八年四月廿日)

(单位以 100 斤计)

表 8 民国元年至民国廿年中山居民生活水平表

类 别	金额（单位：银元/月）
普通公务员	70——120
中学教师	80——100
工人	12——15
店员	6——8

（资料来源：《中山市志·下·人民生活》）

清末民初，香山开始有了近代机器工业，隆镇华侨蔡锦佳等人，在石岐创办的香山机器制砖有限公司，是我国最早的轮窑砖厂。1912年四区濠涌华侨严迪光在县城石岐开办迪光电力灯所（火力发电厂），成为香山最早的发电厂。1916年，刘荣阶等人合资在小榄也开办了兴业电灯公司。港商开办岐港轮拖恒利有限公司，石岐至香港的大轮拖渡客运通航。1920年县公署安装20门电话交换机，香山县城开始使用电话。岐关公路和水上轮船运输线，也于民国时期相继开通。与此同时，各种现代文化娱乐设施、教育和医疗卫生设备等，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914年石岐泰东戏院正式开业，主要上演粤剧，兼放电影。侨立医院、周菴学校、女子中学、纪念中学等也相继建立。各种商会、工会、农会，海外同志社等民间群众组织和行业协会

也相继成立。文物古迹开始得到保护和修缮，地方志得以重修，禁烟禁赌活动全面铺开，中山纪念图书馆落成，中山《民国日报》也正式创刊。古老的香山县城墙拆除后，宽阔的带有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出现在石岐孙文西路两旁，旧城变新街，县城石岐俨然成为香山文化的重镇。香山文化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型，成为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冶炼出富有香山地域特色的新质文化，即真正文化学意义上的香山文化。

（4）当代转型期

进入新中国以来，政区面积依然保持香山县时的水平。上世纪 50、60 年代，又先后划出了珠海和斗门两个地区，部分地区又划归番禺、顺德管辖，政区面积大大缩小。但这并不影响珠海、斗门、中山三地间的互动与合作。改革开放前，三地虽然行政区划上互不统辖，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往来却依然十分密切，尤其是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三地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后，珠海成为经济特区，在经济改革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但在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化上并没有脱离相对古老的香山文化圈。中山市也没有因为不在中央设立的经济特区之内而放弃发展的机会，相反地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社会资源，以及中山人的团结、进取、务实、爱国的精神，汇集海内外中山人的热情和力量，在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文化创造和制度改革等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澳门也在 1999 年回归祖国后，重新确立了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重视历史文化和人文社会资源的挖掘和保护，主动与周边地区如珠海、中山、江门等地之间搞好合作关系，积极整合珠江三角洲，特别是珠海、中山的人力、物力和文化力方面的资源，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综合竞争力。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山、珠海、澳门三个曾统属于香山县的地区，在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三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近年来，澳门和中山、珠海的学者和民间社会，积极推动大香山经济圈和香山文化圈的建设，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三地在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研究和保护、利用等方面，均做了大量富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工作，尤其是对三地“历史同源、文化同根”这一事实表示了高度的认同，并且在各自的环境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本土主体文化——香山文化。

特别是中山市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主题，坚持实施“工业立市、工业强市”和“产业强市”的战略，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三化”并重的方针，不断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化水平达 60.6%，信息化综合指数达 72.49%。建立党政网络信息统一平台，实行网上审批制度。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38.48%，全市森林覆盖率为 22.6%，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文化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群众文体事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以“人道、博爱、奉献”为主题的“慈善万人行”活动持续了 20 年，而且越走越有活力和魅力，成为当今中山城市的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和时代新民俗。29 年来，中山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城市规划管理先进单位”、“全国园林城市”、“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畅通工程模范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全国科技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首批文明城市”和“最具幸福感的城市”。1997 年获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

①

珠海原是一个以农、渔业为主的小县，经济结构十分单一。改革开放后，珠海人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艰苦创业，使特区的经济迅猛发展，成为南中国的一颗明珠。1990 年在全国城市综合实力评估中，国内生产总值递增 67.4%，位居全国城市的第四位；国民收入递增 63.3%，居全国城市第 2 位；人均国内

① 《中国城市巨变》，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年，第 180—183 页。

生产年总值 22,546 元,居全国第二位;人均国民年收入 13411 元,居全国第 3 位;人均财政年收入 2504 元,居全国第二位;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 25407 元,居全国第二位。人均住房、用电量、供水、供电、供气的比率,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城区绿化覆盖率达 39.7%,居全国第 4 位。珠海实现了从昔日一个经济落后的边陲小县一跃成为现代新型的花园城市。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获国家、省有关领导授予的“双拥模范城市”、“卫生城市”、“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十佳城市”、“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园林城市”、“计划生育先进城市”等光荣称号,并荣获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①

从珠海中山改革开放 29 年的实践来看,在经济建设方面虽然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在开拓性、创新性和兼容性等方面,两地又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两地都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均衡关系,始终坚持环境保护和资源优化配置,强调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宜居宜创”的原则,重视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智地选择和稳步地发展。在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大胆引进名牌高校,实现了跨地区办学的设想,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

^① 《珠海市志》,珠海出版社 2001 年,第 4 页。

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新时期中山人精神就明确地表现为“博爱、创新、包容、和谐”。这一新时期中山人精神的确认，既是对历史上香山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创新，又是对未来中山人理想和追求的一种期望。现当代的香山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趋同化的背景条件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吐故纳新，在生产和建设中逐渐构建自己的新的文化体系。

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是永远封闭的。香山文化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总是在开放、吸纳、兼容、创新中实现其特殊的价值和当代意义。从宋元时期的萌芽阶段到明清时期的积累阶段，再到近代成型阶段和现当代的转化与创新阶段，香山文化不断地吸收新的文化养分，在融会贯通和创造性转化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品质，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香山文化真正象学者所说的那样：“汇通天下，历久弥新”。

第四章 香山文化的传承

香山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香山文化产生、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吸纳新质文化成分，扬弃旧的文化因子的传承与创新的过程。

在这一动态发展过程中，文化交流、文化选择、文化融合、文化创造、文化传播一直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香山文化严格说来，就是多种异质文化交流与融合、转化与创新的结果。虽然从行政区划上看，原来的香山已经划分为中山、珠海、澳门三个不同的行政区，但香山文化并没有因行政区域上的划分而离散，相反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趋同化的世界潮流之中，更加受到强调和维护。三地在文化上的自觉和创新，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似乎更加突出。对早期香山文化的认同和对香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以及大香山文化旅游战略的实施，就是最突出的表现。

第一节 交流与融合

文化的生成是和人类的形成、人类社会的出现紧密相关的。虽然常说“有了人，便有了历史”，但远古时代，即人类社会初期的“文化”，并没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地域文化。香山早期文化，（即原初文化或原始文化），目前尚无特别有力的证据说明它是在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和推动下自然成型的文化，但可以肯定地说，早期香山地区的先民一方面在适应海岛的自然地理环境，求生求存求发展的过程中，对“水”和“海洋”，以及“水与土”，“海洋与陆地”这些自然的因素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发展了渔猎经济，形成了以海为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不断地与异质文化交流和融合过程中，逐步形成香山原初社会格局和原初文化，但是，这种落后的原始的文化，在与其他异质文化接触中，就会受到刺激和挑战，就会因此而变革。

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香山原始文化一开始就有受到来自周边内陆地区农耕文化影响的痕迹。^①但是，远古时代，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毕竟有限，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就值得仔细考量。

^① 《中山市文化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珠海市文物志》，2007 年版。

真正促使香山文化快速全面发展的是宋元之际北方人口的迁入和明末清初以来的海外多种异质文化在香山地区的传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批外来人口的进入。大致说来，香山文化在宋元萌芽期，主要是本土原生态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农耕文化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体现在政治上的宗法一体，体现在文化上的重等级尊卑、王权父权至高无上，体现在文化心理或文化性格上的盲从迷信、守旧怕变。但就中国宋元时期的农耕文化而言，则主要是先进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追求稳定与和平的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宗法一体化的政治制度。这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随着大批中原移民的进入而得到示范和传播，使以渔盐为业的香山原住民很快掌握了耕作技术，开始围海造田，发展农业和工商业。先进的农耕文化与相对落后的以渔盐经济为主体的香山原型文化，在长时期的交流中逐渐实现了文化的融合。香山原住民在宋元时期，就开始从渔盐进入农业、或农渔并重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期。在这种本土原型文化与农耕先进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原生的香山文化实现了自我超越和创造性转化，初步萌生了现代文化学意义上的香山文化。

其次，在明末清初时期，香山本土文化主要是与姗姗而来的西方文化短兵相接，在冲突中实现融合。香山附近的海域曾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海上走廊”，过往的船只大都经过香山，并在此地避风、补充给养或直接进行货物交易。但宋元以前的“海上贸易”，对香山本土文化的冲击不大。明末清初以来，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并以此为枢纽开展东西方海上贸易活动。频繁的商贸往来和近距离的交往，西洋的商品裹挟着西洋科技、宗教、历史、文化和观念等一起进入香山、广州乃至中国内陆。澳门因此成为明清时期西洋文化直接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门户，也是香山人了解西洋文化的重要窗口。从澳门这里，香山人直接感受到西洋文化的异域风情和诱人的力量。尤其是体现欧陆文化的澳门城市建设，富有欧陆风情的葡人社区，几乎全方位地展示了西洋文化风貌。明清时期的澳门，可谓“华夷杂处”。^①除了来自西欧大批的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的商人以及一些官员外，还有大批来自福建、广东等地到澳门谋生的中国人。据万历四十一年郭尚宾的记载，在澳门有许多商人是专门为葡萄牙人提供粮食和日常蔬菜、白菜供应的，他们常常进行私贩买卖。也有为葡萄牙人提供硝磺等物质的；还有为葡萄牙人贩卖人口而藏身于澳门城市里的，他们为葡萄牙人提供服务，并接受葡萄牙人的保护，做葡萄牙人的翻译。万历中后期，是华人进入澳门的一个高峰。华人在半岛的南端，住在妈

^① 刘芳：《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3号，第15页。

阁庙附近，在北部住在望厦村附近。在明代，澳门的华人形成了两大势力圈，一是澳门城内以怀德二街为中心的华人商业区，这里的华人很多，都跟葡萄牙人长期打交道，模仿葡萄牙人的风俗、语言和习惯，信奉天主教，他们多在内城从事商业贸易，手工及翻译工作。据庞尚鹏的记载，澳门的翻译人员多是福建人，而工匠、贩夫、店主则多是广东人。^①在文化教育上，澳门也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特点。有一位教会学校的学生曾在他的《三巴集》中，生动地记述了这种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景况：

性学难逢海外师，
远来从者尽童儿；
何当日课分卯酉，
静听摇铃读二时。
门前乡语各东西，
未解还教笔可通；
我写蝇头君鸟爪，
横看直视更难穷。”^②

学者们也对澳门圣保禄学院等教会学校在培养人才和文化

^① 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② 吴历：《三巴集》，《小石山房丛书》第13册，第1-4页。

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圣保禄学院等“以非常广泛的方式遵循着欧洲的教学大纲，人们在那里学习语言、文学、科学、美术、哲学和科技，但圣保禄学院还包括了日本和中国文化、语言的学习。文化的融合、交流始终在进行，这对耶稣会教士为适应环境在日本和中国改进其传教方式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①这些从福建、浙江、广东其他地区迁入澳门的人，虽然不是香山的原住民，但他们来到澳门经商后，大都定居下来，接受香山地方官的管辖，成为新的香山澳门人。这些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来到澳门的人，以地缘、血缘、神缘、物缘和业缘等五缘文化为特征，聚集在一起，并在澳门建立了妈祖阁、莲峰庙、康公庙、女娲庙等多座庙宇，还建立了自己的公共行政组织，如三街会馆就是华人议事场所。这些从外地迁来香山澳门的华人与葡人，他们分别居住在不同的社区内，但彼此隔墙相望，形成比较和睦的社区。在长时期的商贸往来和日常生活中，江浙人、福建人、广东人和葡萄牙人等相互交流，相互依赖，关系更加密切。^②香山原初文化与福建、

^① 《百年庆典的意义——对马爱德神父的采访》，载澳门《教育暨青年报》，1995年第2期。

^② 按严忠明研究表明：明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可谓“一国两制”，清代中国乡村社区是以望厦村为主，基本按照中国传统乡镇的模式进行管理，军民同知和香山县丞是这里的政策制定者和最高权威；乡村社区遵循着传统的保甲制度，向香山县缴纳田赋和地税，同时开展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地方还利用宗教信仰和宗族观念约束村民的行动。严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第198页。

江浙地区的闽文化、吴越文化和以葡萄牙文化圈为主体的西洋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香山方言文化、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

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后，香山文化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与西方近代文化、南洋文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碰撞，最后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香山侨乡文化、商业文化、买办文化、思想文化、名人文化等，从而使香山文化从传统迈向近代，从原始萌芽阶段进入到成型和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香山辖属的澳门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西方的商品源源不断地从澳门输往香山及中国内地，香山地区仍然受到来自澳门的西洋文化的影响。熊月之先生对此就有过精辟的评述：“香山人能大名垂宇内，香山在中国人文版图上能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得益于中西交通，得益于中丙文化汇合。自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租占澳门以后，澳门就成了中西文化交汇中心。澳门本属香山之一部分，澳门人都是香山人，澳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中心，香山就处于中西文化交汇前沿。本处于中华文化边缘地带的香山人，接触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洋文化，直接、具体、丰富而感性，较少云遮雾障的想像，较少雾里看花的朦胧。他们知道西洋人怎么船坚炮利、凶狠蛮横，也知道西洋人怎么认真诚实，知道西洋人怎么吃饭穿衣、怎么起房造屋、怎

么航海经商、怎么传教育人。他们不会相信西洋人好食小儿的说法，尽管连博学如顾炎武者都相信；也不会相信西洋人挖人眼睛、以供炼银煎药的传闻，尽管连开明如魏源者也这么说。在实事求是、见贤思齐这一中华文化基因的作用下，香山人勇敢而睿智地取西洋文化之长，补中华文化之短，学外语，当买办，出洋，留学，经商，闯荡出一片新天地，成就了常人难以想像的丰功伟业。”

表9 澳门至各埠木船运输价格表（价格单位：银两）

货色	单位	石岐	陈村	江门	新会 埠头	阳江及 高州	水东	雷州
洋棉花	包					0.3	0.4	0.22
土棉花	包	0.1	0.1			0.1		0.22
棉纱	包		0.18		0.12	0.3	0.4	0.36
布匹类	匹	0.005			0.005			
布匹类	捆		0.18			0.3		
布匹类	担						0.3	0.26
咸鱼	担	0.04	0.06	0.02	0.04			
麦饼	担	0.02	0.03	0.024		0.12		
旧铁	担						0.08	0.08
药材（一级品）	担				0.08	0.2	0.22	0.26
药材（二级品）	担				0.08	0.15	0.22	0.26

续下表

续表

花生油	担		0.06	0.05	0.06	0.22		
煤油	箱	0.02	0.02	0.02	0.04	0.04		
药土	箱	2	2	2	2	3	3	3
米壳	担	0.03	0.02	0.02		0.06	0.065	
红糖	担	0.03	0.04	0.04	0.05	0.12	0.12	0.1
白糖	担	0.05	0.04	0.04	0.05	0.12	0.12	0.1

表 10 各埠至澳门木船运输价格表 (价格单位: 银两)

货色 (担)	石岐	陈村	江门	新会 埠头	阳江 高州	水东	雷州
鲜果	0.03		0.03				
麦饼					0.1	不等	
牛皮							0.24
牛角							0.2
花生油					0.2	0.2	0.2
纸	0.05	0.06	0.05				
猪					0.5	不等	0.4
米谷	0.03		0.04	0.04			
糖					0.1	0.1	0.1
粗茶				0.12			
烟叶			0.03				
鲜菜蔬	0.03		0.03				

表 11 澳门至附近各埠客运所需时间及旅费表

地点	航程平均时间（每天航行十二小时）	旅费（银两或银元）
省城	3 天	0.36 两=0.50 元
陈村	2 天	0.36 两=0.50 元
石岐	1 天半	0.144 两=0.20 元（一般舱位）
石岐	1 天半	0.216 两=0.30 元（住买办舱）
石岐	8 小时（拖轮牵引）	0.216 两=0.30 元（一般舱位）
石岐	8 小时（拖轮牵引）	0.288 两=0.40 元（住买办舱）
斗门	1 天半	0.20 两
江门	2 天	0.30 两
单水口	2 天	0.30 两（买办舱位）
单水口	2 天	0.20 两（一般舱位）
荻海	2 天半	0.30 两
长沙	2 天半	0.30 两
广海	2 天	0.30 两
阳江	2 天	0.30 两
石龙	3 至 4 天	0.30=0.50 元

（莫世祥译：《拱北海关志》，第 9—11 页，18—19 页。）

近代香山诗人郑彼岸，在他的《走翠微》一诗中就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石岐人到澳门附近的墟市做小生意的艰辛：

石岐女儿年十五，生值乱离兼丧父，近来寄住濠头村，学

走翠微养老母。每天米担预备完，床上终宵听更鼓。五更饭后便起程，行到长江天谱鹵（石岐话谓天色将晓为谱鹵光），长江过后要穿山，此时行路最艰难。山程约莫三塘讯，三个钟头行不尽。山路崎岖最恶行，忽然斜迳忽深坑。沙𧇗（粗大沙粒）时时伤脚板，石头又搥了哥青（石岐话胫骨前部为哥青）。大队人人行得快，紧紧跟随难歇乃（意谓疲倦），无情烈日晒当头，额上汗珠如豆大。行尽此山到大布，远望茶亭在前路。此时担子虽在肩，心里已如释重负。赶到茶亭暂息肩，粗茶到口如甘露。饭鹅取出冻冰冰，胡乱吃完又举步。再行半路到翠微，时钟恰好报三时。米已卖完投客栈，豆粥一餐当晚饭。幸遇居停好主人，招呼茶水意殷勤。此时渐觉周身痛，脚一洗完寻好梦。最恨睡眠还不足，栈主高呼饭已熟。睡眼惺松立起床，食完早饭等天光。天色麻沙到圩市，未到人声已聒耳，最怜小贩皱眉头，个个愁无“直版纸”。只因拣纸延时候，买货争先唯恐后。卅斤货物“打”回头，一半青盐一半豆。盐豆分开做两袋，旧路回来跟大队。此时天色阴阴地，共说今天好运气。谁料归途半路中，忽然翻雨又翻风。带得蓑衣只一个，不敢搂身为搂货。北风凛冽雨淋漓，湿透重衣冷袭肌。将到濠头筋力尽，两眼昏花路难认。初更报罢才到家，湿衣换罢全身震。等到天光货卖完，算来赚得十多元。米价每元三两几，不够娘儿吃两天。吁

嗟乎！石岐女，我所知，其他我不识，痛苦亦如斯！君不见濠头街市前，许多小贩坐街边，压肩货担刚才歇，又摆街边求卖脱，买者须知豆与盐，尽是贫民身上血。^①

由此可见，澳门不仅是香山人求学和谋生的地方，如容闳、黄胜、黄宽、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孙中山等，均与澳门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也是近代香山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特别是香山与澳门之间频繁的物质文化和商品经济的互动，从而使澳门成为香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②

澳门又同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之一，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前，它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在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前，澳门只不过是香山县境内的一个小小的渔村，人口不多，经济不发达，文化相当落后。但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的二百多年里，澳门迅速成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鸦片战争前，文人雅士到澳门游历、学道、定居者，不可胜数。游历过澳门的内陆人，对澳门的新鲜事物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如 17 世纪初到澳门的刘天虞记述说，他在澳门时，“见塑像，几欲与之言，熟视而止，”^③对西方艺术大为倾慕。汤显祖到澳门后，

^① 《中山农韵》，中山市农业委员会诗社合编 1997 年版，第 16—17 页。

^② 胡波：《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思想人物与历史文化》；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③ 王临亭：《粤剑篇》玄览堂丛书本，第三卷 21 页。

写下了“不住田园不树桑，娥珂衣锦下云樯”和“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的诗句，并在他的名著《牡丹亭》中描写了柳梦梅的澳门之旅，直接在舞台上展现了香山岙的风光。

^①明清至民国以来，寓居澳门的著名文人至少有 66 人。^②他们包括张穆、吴历、吴兴祚、成克大、劳之辨、屈大均、陈独漉、何绛、方颢恺、大汕和尚、何栻、刘世重、杨节、汪俊来、王轸、印光任、张汝霖、李珠光、罗天尺、陈官、李遐龄、蔡显原、何健、吴启苞、李龙耀、汤貽汾、钟启韶、阮元、魏源、赵源、冯龙宫、黄德峻、谭莹、鲍俊、简朝亮、陈荣袞、丘逢甲、余采香、吴亮挺、何逢初、左秉隆、梁乔汉、杨增辉、郑观应、沈泽棠、汪兆铨、汪兆镛、丁仁长、吴道叙、潘飞声、黄节、崔师贵、朱秉筠、张学华、陈洵、李蟠、黎畅久、梁彦明、张国华、陈融、黄棣华、张树业、金曾澄、张虹、傅学友、马复等。这些游历和寓居澳门名人雅士，给文化贫瘠的澳门无疑地增光添彩，同时也使不为人知的澳门所代表的西洋文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得以传播开来。

香山作为澳门最近的地区，很自然地使人们联想到它与澳门的相互关系。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通过澳门进入香山和中国内地的过程中，对香山社会的影响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可

^①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 6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方言编著《澳门始末问题》，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3 页。

以说明，但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在澳门的传教活动和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及教会学校对香山人的影响，还是有据可寻的。据龙思泰研究，19 世纪初期，就有不少香山人和澳门的老居民的孩子进入教会学校读书。1815 年，至少有 8 名年轻的中国人在“布道团修道院”学习。1831 年有 7 名年轻的中国人在该院学习。^①容闳、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唐实等就曾在马礼学校学习。^②容闳曾回忆说：

替郭施拉夫人办杂物并兼任秘书的人，恰巧和我们同乡，而且又是我父亲的朋友的邻居。我父母从他那里听到有关郭施拉夫人学校的情况，于是通过他的关系并经他设法，父亲把我送进了那所学校。比我年龄大得多的哥哥在正統的私塾读书，如今父亲为什么忽发奇想要送我进外国学校，这件事对我来说始终是个不可解的谜……我对于他这样做所能找到的惟一理由，就是当时中外交往正在兴起，我的父母预料这种往来不久将波澜壮阔，于是抓紧时机送个儿子去学英文，以企将来可以当个高级翻译，谋取优越的职位。从而跻身于外交界或经商。我认为这就是促使我父母送我进郭施拉夫人学校的主要目的。

1835 年我刚刚七岁时，就随父亲来到了澳门。到校后，立即被引见给郭施拉夫人。她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英国妇

^①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 31 页，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 8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出版社。

女，在我单纯无知的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见她穿着一件飘飘然的白裙袍，两只袖子鼓鼓膨膨的像两个大球，……当时那一刻我惊愕极了，被这身长大的裙袍——我从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装束吓得浑身发抖，紧紧抓住父亲不放。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和周围的新环境，我感到茫然……老实说，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展现在我面前。^①

在 19 世纪中后期，澳门基督传教士创办的学校、报刊和慈善机构，对香山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等的影响从容闳的回忆中便可一叶知秋。

澳门对香山文化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澳门所代表的异质和先进的西洋文化，对半封闭状态下的香山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启发、暗示和引导这一层面。

首先，澳门的市政建设、都市生活方式、社会控制、文化教育、经济形态等，都给香山人以深刻的印象，并对他们的思想转变、观念更新、知识积累等产生深刻影响。

郑观应在他的《澳门感事》诗中，就抒发了个人对澳门现状的感慨：

澳门上古名莲峰，
鹄巢鸠占谁折冲。

^① 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 1—3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出版。

海鏡波平涵电火，
山屏烟起若云龙。
华人神诞喜燃炮，
葡人礼拜例敲钟。
华葡杂处无贵贱，
有财无德亦敬恭。
外埠俱谓逋逃藪，
名街频闻卖菜佣。
商务鱼栏与鴉片，
餉源以賭为大宗。
历查富贵无三代，
风俗浇漓官势凶。
屋价千金抽八十，
公鈔不纳被官封。
昔有葡者极暴虐，
竟为义士绊其凶。
其谓文明实皆瞞，
不识公法受愚弄。
请问深知西洋者，
试思此事可曲从。

而且，在澳门的所见所闻，对郑观应的内心世界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他对澳门贩卖“猪仔”的行径和聚赌寓匪之情形，就深恶痛绝，并多次撰文进行抨击，要求禁赌和禁止贩人为奴。他说：及时澳门一隅，实系西人管辖其他，亦当设法禁止。盖万国律法，未有不衷乎义，循乎理者，以理折之，亦当无词以对，则其禁止亦不难也。^①并指出：凡有游手好闲之徒，即仿西法拿入院中，教以手艺，自然赌博与盗贼日少。或虑经费难筹，然岁抽赌饷四百余万，绰有余裕，乃不分半治理民风，坐视盗充斥，不亦慎乎？^②

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一书，就是在澳门隐居期间完成的。他主张设立议院，讲求武备和发展工商业，提出以“兵战”对“商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显然与他在澳门所见所闻的刺激、暗示、启发有关。

孙中山接触西方近代文化也是从澳门开始的，他说：十三岁随母往夏威夷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③后来求学行医，孙中山又多次停留于澳门，澳门的景物和人事对孙中山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行医遭葡籍医生的排挤，与葡籍友人飞南第合作创办《镜海丛报》

^① 郑观应：《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7页。

^② 郑观应：《澳门富匪论》，《郑观应集》上册，第17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却红红火火，在孙中山内心深处肯定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和深身层次的认识。至于其他的人如郑彼岸、林君复、刘思复、杨鹤龄、孙眉等香山籍的革命志士，在香山与港澳之间的来来往往，不仅有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也密切了两地之间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关系。

其次，澳门的都市化发展和西方文化特色，既向香山人传递了文明先进的社会生活信息，又为香山社会文化近代化提供了酵母或加速器。澳门的报业在近代一直比较发达。清末至民国初年，澳门先后出版了中文报，《澳门新闻报》、《镜海丛报》、《知新报》、《镜报》、《濠镜晚报》、《澳门通报》、《濠镜日报》、《澳门时报》。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时期，是澳门中文报业空前活跃时期，前后出现中文大报近30份之多。^①这些报纸大都在香山各地有一定读者。香山人对世情国情和海内外重大信息的了解，部分与这些报纸的宣传有关。同时，受澳门报业的影响，香山也较早地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据有关资料显示：1912—1931年间，香山县及其石岐镇共出版四种日报，即《仁言日报》、《铁声报》、《民报》和《新报》。^②在一个不到130万人口的县境，竟有四种报纸出版，显然是受了澳门报业的刺激和引导所致。报纸的创办和澳门报纸的销量，对香山人了解中

^① 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6年版，第447—450页。

^② 《拱北关史料集》第357页，第371页。

国与世界、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经济与生活、政治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无疑地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报纸作为信息的载体，在近现代社会生活中是进行大众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媒介，它对人们的知识、思想、信仰等方面所产生的广泛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澳门城市的建筑风格、组织管理的特殊形式、学校的教学内容与形式、社会交往的规则与礼仪、宗教信仰的态度与要求、衣食住行方面的习惯与风俗等等，也同样地影响周围地区的人特别是香山人的思维方式，激发香山人追求新生活的热情，并树立醒目的人生坐标，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逐渐脱离中国传统的轨道。

据拱北关 1902 年至 1911 年的十年报告称：

在沿海的荒岛上，渔民的子女极少有机会读书；而香山县近年来已办起较为像样的初小、高小和中学，并招收了大约 900 名男生和 70 名女生。这些学校大多数是公众捐款建立的，并由有关村落的长者和绅士们严格监督。初级小学的课程仅限于中文，通常招生 40 名；高小和中学通常招生 90-120 名，讲授的课程有汉语、英语、地理、历史、图画、体育和伦理学。附近地区最古老的一间学校是 1901 年在前山创建的，目前共有学生 127 名；其余学校均建于 1906 年至 1908 年之间。1906 年，在石岭开办一所男子中学，两年后，又在那里开办一所女子师范

学校，人们认为，这两间学校的设备最为优良。在初级小学，每个学生平均每月缴交学费1元，而高小和中学的平均学费则为两元；此外，湾仔和银坑两地一些村民创办的学校可以免交学费。香山县天主教会也开办了几间学校，而澳门有两间学校专供华人子弟读书，一间由市政府提供经费，另一间由私人捐款。^①

又据1912—1921年的拱北关十年报告称：

辛亥革命后的七年中，学校数量和教育性质都发生了巨变。数以百计的各类学校——国立、市立、行会、教会和私立五种已经一一涌现出来了。在任何一座较大的城镇中，人们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书店和文具商店的识字课本和其它商品，就可以跨过鸿沟，追溯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教育时代。然而，在本十年后期，出现了较大程度上兴起白话教学的趋向，香山县的县城有100多所学校，其中的4所重点学校由广州的省教育厅和当地的官员直接管理。每所学校可接纳150学生；这些学生在入学前，必须要证明他们至少学过五年初级汉语。^②

新式教育的兴盛，对香山社会文化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现代以来香山人才辈出，文化繁荣，与教育的兴盛和澳门的文化辐射就有着直接的关系。

^① 《拱北关史料集》第331—332页。

^② 《拱北关史料集》第354页。

香山与澳门的关系，由来已久而又极为密切。澳门与香港不同，它一直是香山县的一部分，即使葡萄牙人租住澳门，也每年向香山县上交 500 两银子的租金。同时中国政府设立澳门同知和前山同知，直接对澳门行使主权，香山人可以自由地出入澳门，在葡人面前也没有那种自卑和媚外的心理。相对说来，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与香山县衙之间、澳门葡人与香山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处于相对宽松和友好的状态。这就有利于中葡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从我们所掌握的史料上看，澳门在香山走向全面近代化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枢纽之一，为香山人瞭望世界和走向世界，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也为香山人输入新知，转变观念，移风易俗，革故鼎新，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另一方面，澳门与香山在商贸上的来来往往，不仅为香山人提供了许许多多西洋产品，激发了香山人追求近代新式生活的热情，加速了香山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也由于澳门对香山日常生活用品和农副产品的依赖，所以也使香山商品化、专业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从而促进了香山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①

香山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除了澳门这个重要的门户之外，还与华侨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创造有关。香山人出国谋生有史可

^① 胡波：《思想人物与历史文化》166-171 页，同时参见黄鸿钊：《澳门同知与近代澳门》，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考者，上溯可至南宋末年香山人避难于海外。明清时期，因各种机缘和各种动机飘洋过海的香山人不在少数，但他们从海外归来时并不被乡人看重，甚至屡遭官吏的敲诈勒索，言行举止因此比较低调。同时，他们对所到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状况也缺乏深入了解，因此他们不可能将国外的信息在国内和家乡广而告之。近代以来，新旧金山的发现，以及欧美及南洋、澳洲各国急需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穷苦人民得此机会，纷纷出洋做工。香山人受海外淘金浪潮的影响，也相继赴新旧金山和东南亚等国“淘金”。

近代以来的香山人以血缘、地缘等裙带关系相互牵引，成批地奔向海外，并在檀香山、旧金山、澳洲、悉尼、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成立同乡会等组织，形成华人社区。他们落叶归根的心态，使他们时刻关心家乡和祖国的亲人，或寄衣物等日常用品回家，或汇款回家买田置屋，娶妻生儿育女和赡养父母。由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华侨与国家权益有着利害关系，对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华侨在海外归来后，也乐于把在海外所见所闻告知父老乡亲，甚至在言谈举止中不自觉地将中国和家乡与海外各国进行简单比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或想法。孙中山“在乡间，见乡人由广州、香港、澳门、金门、檀香山而回者，经济丰裕，并谈洋务”，又受其华侨身份的哥哥孙眉的影响，才选

择去海外求学和寻找革命事业的。马应彪、郭乐等也是在回国探亲的华侨同乡的影响下决定去澳洲谋生的。他们在海外发迹后，又从海外返回祖国和家乡，参加革命，投资实业，改良乡政，移风易俗，成为家乡思想观念更新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他们从海外带回了异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实物和信息，开阔了家乡人的眼界，激发了他们对海外世界探索的欲望和改变现状的动机；另一方面，他们在家乡的投资、捐赠、以给汇款赡养家眷的做法，也有效地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拉动了香山社会的消费，改变了家乡的社会面貌。

1946年《中山月刊》就有人撰文称：

自抗战迄今，邑人饱受战祸，胜利复员后，更因时局影响，物价继续狂涨，生活较前更为困苦，虽有善后救济分署赈品间或分发来邑，惟数量甚微，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尚幸外洋通汇，邑中侨外同胞怀念故里灾黎，不断汇款返乡救济，贫苦乡人赖以存活者甚众。^①

1946年11月《中山侨刊》又有人撰文说：

本邑自遭敌人蹂躏之后，商业凋敝，农业失收，民穷财尽，生活困难达于顶点。前此邑中全恃以为经济命脉之农产品与侨汇，均遭际于冻结之状态中。在光复后，……百端待举当中，

^① 《中山文史》，第五十一辑，第158页。

建设与教育，均感无法开始，但据记者调查所得，关于乡间之生产建设仍无法着手进行，所幸教育一途，则多得海外侨胞之努力，捐资兴学，以扫除文盲而提高新生一代之才智水准，诚不够得之美举也。^①

1948年《谷镇月报》创刊号中有《对侨胞的企望》一文，再次强调：家乡和侨胞的关系密切而且重要。桑梓人士，十之八九，都是仰给于侨汇之家。

侨汇、侨资的增长，以墟镇为中心的侨乡社会因而获得空前的发展。如沙溪墟、沙岗墟、榄边墟、南朗墟、三乡墟、前山墟和各乡村的街市，摊档林立。它们多以侨眷生活需要应运而生，如以归侨、侨眷为主顾的汇兑，金银首饰、苏杭布匹、百货、建筑材料、建筑承造、搭棚、茶楼酒馆等业，供应婚嫁礼饼的饼铺，因修坟、筑“寿基”（生前准备的墓地）、备长生（生前预购的棺材叫长生，又称寿板）、红百两事需要的石匠、花轿、纸扎、棺材、杵工、迷信品等均有业可营，侨乡因而出现了以消费性为主的经济社会一派繁荣景象。^②

华侨对家乡的贡献，还在于他们积极参与家乡各项事业建设活动，以实际行动推动家乡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1929年，檀香山华侨回国服务，任职于军政界、团体、学校和大企业的

^① 《中山文史》，第五十一辑，第158页。

^② 高民川：《中山侨刊乡报述略》，载《中山文史》第五十一辑，第159—160页。

就有 140 多人，其中不少是中山人。民国时代，中山华侨回乡担任香山（中山）县长的就有 10 多人。

表 12 民国时期华侨担任过香山（中山）县长职务
一览表

姓名	乡籍	侨居国	到任期	附注
林寿图	隆都安堂	美国	民国元年 1 月首任县长	同盟会员
陈永安	恭都梅溪	檀香山	民国 9 年 5 月 民国 11 年 8 月两任	同盟会员
吴铁城	谷镇平湖	檀香山	民国 10 年 11 月 民国 12 年 12 月两任	同盟会员
杨广达	良都北台	檀香山	民国 12 年 3 月	同盟会员
朱卓文	得都西桠	旧金山	民国 12 年 6 月	同盟会员
杨吉	隆都申明亭	檀香山	民国 12 年 12 月	同盟会员 香山县议会 议长
李蟠 (李仙根)	良都石岐南 下	日本	民国 13 年 1 月 民国 14 年 12 月两任	同盟会员 孙中山机要 秘书
许翥	四大都南朗 泮沙	檀香山	民国 15 年 2 月	兴中会会员
李禄超	四大都南朗 李屋边	美国	民国 18 年 5 月	兴中会会员 孙中山机要 秘书
唐绍仪	恭都唐家	美国	民国 20 年 3 月	中国国民党 党员

续下表

续表

杨子毅	仁都牛起湾	爪哇留学德国	民国 24 年 2 月	同盟会员
张惠长	得都大环	美国	民国 26 年 10 月 民国 34 年 7 月两任	中国国民党党员 孙中山侍从武官
林卓夫	隆都安堂	檀香山	民国 29 年 5 月	中国国民党党员
方岳昭	隆都濠涌		民国 32 年 12 月	中国国民党党员
孙乾	四大都翠亨村	日本留学 意大利	民国 35 年 11 月	中国国民党党员

(资料来源:《中山市志》(下)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第 1137—1138 页)

首任香山县长的就是美国回来的林寿图。^①在华侨的支持下, 香山县的教育、新闻、出版业、工商各业, 以及市政建设和乡村治理等方面, 均有较快的发展。

1921 年《良都竹秀园月报》刊登的《一周年之回溯》一文评述道:

夫都市进化易, 乡村进化难……乡村明达之士无多……。以故教育之发展, 工商业之振兴, 与夫一切设施之进行, 乡村类不逮都市远甚, 顾吾人岂可安于自然, 而不设法促进进化哉? 噫, 此我乡有志之士, 所以具发聋振聩之伟愿, 而有月报之刊

^①高民川:《中山侨刊乡报述略》, 载《中山文史》第五十一辑, 第 146 页。

行也……诸同志之组织本报，固非热衷于名利，亦无名利之可图，胡为乎劳其精神，竭其心思，而甘受咎病乎？毋亦先觉者所应有之责任，而欲求大有造于我乡也。^①

显然，该文认为乡村和都市的发展有赖包括华侨在内的先知先觉者的共同努力。1929年的《渡溪月报》又有人发表文章说：

夫国民之发达，必先扩其知识，李居野处如木石，如鹿豕、靡有成者。潮本邑自清季戊申八月，郑君岸父始有组织《香山旬报》，继而《铁城五日报》，再由李澧川君创办日报，斯时专制演威，豺狼为患，尚属不畏强暴，口诛笔伐，出世后一纸风行海外，靡不备受各界欢迎。……光复（指辛亥革命）之初，恢复自由言论，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始报纸鼓动之力焉。于是各乡悯社会之闭塞，藉报纸以开通，纷纷组织日报，各乡月报，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矣……^②

作者们虽然有故作惊人之语的用意，甚至夸大“先知先觉”的作用，但他所说的办报刊以通信息，以启文明，在客观上对于改变香山传统社会的保守、落后、封闭、愚顽等现状，显然是大有裨益的。香山文化在侨胞的倡导和推动下，逐渐打下了华侨文化的烙印，侨乡文化和华侨文化因而成为香山文化的重要

^①高民川：《中山侨刊乡报述略》，载《中山文史》第五十一辑，第147页。

^②高民川：《中山侨刊乡报述略》，载《中山文史》第五十一辑，第147—148页。

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诞生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中山与珠海、澳门的关系虽然没有过去那么紧密，行政区划上彼此相对独立，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的现象从未完全停顿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地间的交流与合作仍在继续，三地各自对外来文化都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不断吸收东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等，使之逐渐融化在香山文化的血脉中。这一时期香山文化受香港、澳门传入的西方文化，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文化影响较大。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港、澳和海外乡亲回乡支持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事业，不仅向家乡人提供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必要的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而且也展示了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上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向家乡人传递了海外发达国家的各种信息，从而激发了家乡人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向往。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华侨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等，也逐渐成为中山人和珠海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与此同时，由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迅速崛起，劳动力的需求和技术人员的短缺，促使更多的内地民工，大学生和机关干部等纷纷南下中山、珠海等地。他们在中山、珠海甚至澳门创业的过程中，既带来了新知识、

新思想、新观念，也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使中山、珠海这两个曾属香山县的地区，在短时间内，汇集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文化。普通话、英语、粤语，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最受欢迎也最流行的交际语言。粤菜、川菜、湘菜、潮汕菜、东北菜、江西菜、湖北菜、淮扬菜、东南亚美食、西北面食，以及西餐等等，在中山、珠海两地几乎是遍地开花，生生不息。西装、唐装、中山装、休闲装、韩装、汉服、旗袍等五花八门的服饰，在中山、珠海、甚至澳门等地不期而至、各领风骚。高楼大厦、小区住宅、园林别墅、粉墙黛瓦、骑楼建筑、欧陆风情的城乡建筑风格，充分体现了中西合璧、古今融汇的岭南特色。电话、手机、电脑等各种电子产品，自行车、三轮车、的士、公共汽车、小汽车等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可谓各显神通。卡拉 OK、星巴克、的士高、电影院、网吧、舞厅、歌厅、茶楼、足浴、桑拿浴、按摩推拿、健身操、麻将房、美容瘦身，各种娱乐休闲的场所和活动也同样一应俱全。有人信佛，有人重道、有人尊孔、有人崇洋、有人敬祖、有人拜神，在宗教信仰上同样是人各有志而志趣不同。今日中山、珠海、澳门的文化，可谓多元多层，相互影响，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交流互动，又有对立统一，共同构建着今日的香山文化体系，不断丰富着香

山文化内涵。

第二节 传承与创新

文化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它始终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因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总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状态之中。但是，文化的变化首先是在传承与创新中逐步实现的。没有文化传承，文化的发展就缺乏根基和源泉；没有创新，文化也就失去活力和魅力。香山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关键在于它有历史传承，有时代创新。传承是香山文化的内在机制，创新才是香山文化的根本特征。2004年中山市提炼的“博爱、创新、包容、和谐”新时期中山人精神，就是香山文化在当代中山社会传承与创新的集中表现。

首先，博爱是伟人故里宝贵的精神元素，也是新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因素。

它是热爱和建设家园与祖国的民族精神之凝聚，既有传承性，又有时代性。孙中山先生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道主义的精髓，他说：“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①并强调：“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页。

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①

因此博爱应与三民主义一起倡行。他的这种伟大的博爱人文精神，既顺应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更为世人留下了关乎人生观、价值取向的宝贵的精神遗产。^②在博爱这面旗帜的辉映下，爱国爱乡的情愫早已融化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

“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关心社会、乐于助人”为宗旨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的慈善万人行持续了20年，不仅在内容上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和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救国救民救世的博爱精神，而且在表现形式上实现了中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培育了现代城市新风尚，形成了当代社会新民俗。可以说慈善万人行是中山人民弘扬博爱精神的有力载体。

地处中西文化交汇的香山县，在明清时期，受西方宗教文化和人道主义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仁爱思想的影响，较早地萌发了社会救助和关爱他人的思想观念。历史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在香山这块土地上共生共荣，相互扶持，彼此包容，形成了富有人文精神的社会氛围。到了近现代，受西

^①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页。

^② 《广东省志·孙中山志》第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方民主思潮和人道主义的影响，在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博爱”思想激励和侨胞的带动下，香山地区的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均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

在中山的五桂山一直流传着古代孝女罗三妹对病母侍奉无倦，因丧母悲痛至极、哀伤而死的孝道传说；中山詹园建园也是出于孝敬母亲，使母亲在舒适自然的环境中颐养天年而建造的。在中山关注老龄群体和贫弱残疾之人的风气流行甚广，影响深远。1987年底，中山市委市政府发出了“娱乐升平迎太岁，太平盛世敬老人”的号召，由市文化局牵头组织的艺术小分队先后到市光荣院、颐老院、福利院等单位，慰问革命老人和孤寡老人，并倡议在中山开展“敬老万人行”。1988年首届“万人行”活动的主题就是“娱乐升平贺龙年，万人敬老众心坚”，目的是给中山市社会福利院筹集资金，改善孤寡老人的生活条件。1989年借鉴香港“百万行”民间的形式，人们又赋予“万人行”以“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的新内涵和外延，使“慈善万人行”活动在组织结构和内容形式、性质特征等方面，均有了更深刻的变化，由开始的敬老和对孤寡残疾老人的帮扶上升到对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新的变化。

1988年到2007年，中山“慈善万人行”走过了20年，20

年来海内外中山人在慈善万人行活动中共捐善款 4.8 亿元。其中红十字会募集 2.3 亿，24 个镇区募集近 2.5 亿。红十字会发放援助金 1.5 亿，为成千上万的困难家庭施以及时有效的帮助。投入 1.8 亿参与共建了 67 个公益项目建设，包括颐乐楼、特殊教育学校，红十字会中心血站，120 急救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等。还拨出赈灾款 8000 万元，参与市内外 33 项重大赈灾工作。从 1991 年的华东洪涝灾害到 2005 年的印度洋海啸，再到 2006 年的华南台风灾害，都有中山人民的爱心和真诚的奉献。“慈善万人行”不仅仅是一种爱的奉献和社会责任感、人道主义的一种精神表现，而且还是传承和繁荣民俗文化，中华伦理文化，培育新的文化的一种社会动员。从首届敬老万人行活动开始，中山人民就赋予了民间艺术文化活动慈善公益发展的使命。20 年来，各镇区的民间艺术队伍加入万人行巡游队伍中，一些曾销声匿迹的传统民间艺术得到了新生。黄圃飘色，古镇云龙，沙溪鹤舞和凤舞，起湾沙龙，濠头金龙，西区醉龙等民间艺术，在万人行活动中得到全方位的展现。一些新兴的广场文化、街头文化、企业文化、教育文化，也随着万人行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繁荣。

其次，创新是流淌在香山人血液中的活性因子，是香山文化和香山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近代中国，香山人敢为天下先，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均创下了多个全国第一，开一代新风，创辉煌业绩。1833年珠海淇澳岛居民打响了反抗侵略者的第一枪，取得了鸦片战争前抵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初步胜利。1854年容闳作为中国第一个在美国高等院校获得毕业文凭的中国留学生返回祖国，并成功地于1872年促成了中国首次官派留学美国的幼童计划的实施。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被誉为轮船招商局三杰，他们成功地使中国第一个大型的现代化企业起死回生，并参与了一系列洋务企业的创办与经营活动，成为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洋务企业家，郑观应甚至成为中国最早公开倡导实行君主立宪和商战的思想家。唐廷枢编著的《英语集全》，不仅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英语，了解西学的必读书，而且也为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学习粤语和中文提供了方便。侨商马应彪、郭乐、蔡昌等先后创办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中国现代百货公司，推动了中国百货业的发展。文化艺术上，阮玲玉的表演艺术，吕文成的广东音乐造诣，以及萧友梅对西洋钢琴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在近现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都谱写了新的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山人秉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出多个全国第一，包括第一个种粮万元户、第一家中外合资的

旅游宾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和第一个东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游乐场等。1998年实施的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能最终取得成功，也得益于创新。中山在国内较早提出实施“三个创新”，即体制、科技、投资环境创新，其中“投资环境创新”理念尤为独特，它不只强调基础设施的改善，更强调软环境的创新。自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后，公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财政不再花钱办工业，不与民争利，给民资腾出发展空间，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经济理念。非公经济蓬勃发展，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近12万户，约占全市家庭户数的1/3，小榄、古镇等镇区更是接近50%。正是因为这种永不枯竭的创新力量，才使中山“以占全省1%的面积、2.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省3.8%的生产总值，经济总量位居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的第五位，并获首批全国文明城市殊荣”。^①

再次，包容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是香山文化最突出的本质特征。

香山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纳移民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化和社会包容的历史。有的学者就指出：

从历史上看，中山的前身香山包括现在的中山、珠海两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地区。近几百年来，各种

^① 颜泽贤：《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序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族群、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会通，特别是明中叶以来，这里更较早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香山在地缘上则是面向大海，因而具有较为强烈的蓝色海洋意识和开放意识，一百多年来成为中国从大陆经济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缩影，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封闭经济文化走向开放经济文化的窗口，从而形成了一个包容、平等心态和开放文化。^①

香山人这种“包容、平等心态和开放文化”，也符合现代社会开明、接纳、多元的价值取向，在今日中山、珠海乃至澳门也得到进一步地体现。中山珠海和澳门人的包容精神，体现在他们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他们这种包容胸怀是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在中山，珠海、澳门对内对外投资者一视同仁，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同步发展。尤其是“同是中山建设者”的口号，一直让广大外来务工人员倍感温馨。外来工被推荐当选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或市政协委员，这在广东乃至全国都是较早且少有的。

最后，和谐是全社会不懈的共同追求，也是香山文化在当代社会传承与创新的根本表现。和谐体现了时代性与群众性，其内涵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

^① 丘树宏：《博爱精神与和谐文化的成功实践——对中山“慈善万人行”活动的几点思考》，《中国社科》，2007年第1期第13页。

多年来，中山市坚持以人为本，着力建设适宜居住、适宜创业的和谐社会，连续 12 年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成为目前广东唯一的“长安杯”获得者。从 2005 年 4 月起创办的城市论坛，每月至少举办一期，公开举行。自愿参与论坛的市民与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共同的平台上，围绕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或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展开交流与探讨，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山注重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断加强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建设，环境质量保持在全省前列。关注困难群体，如斥巨资实施安居工程，为相对困难的家庭圆了安居梦。目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2.81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37.5 平方米。全社会积极参与“身边的希望工程，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实施星光工程，让农村的老人安享晚年；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高度重视解决三难问题，实行农村保险向城市社保并轨等，这些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也展现了中山人的人文精神。^①

2006 年在孙中山先生诞辰 140 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

^①王远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文化资源》，《求是》2007 年第 1 期。

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山人民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他的故乡已成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中山人民将遵照党的路线、方针和十七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方面，结合中山的实际，进一步把孙中山的精神发扬光大，着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走共同富裕道路，把中山市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繁荣，同时使香山文化增添新的魅力。

诗人、作家丘树宏曾深情地说：无论是一页页翻读香山那布满陈迹的百年历史，百年人文，还是一步步回眸近 20 多年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不难发现，这期间始终贯穿和围绕着这样一个词：开放。完全可以这样说，100 多年前，香山是中国从大陆经济大陆文化走向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缩影；改革开放后，香山是中国从封闭经济封闭文化走向开放经济开放文化的窗口。^①

^①丘树宏：《思维洼地》，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 年，第 10 页。

第五章 香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自香山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以来，香山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始受到学人的注意，特别是2006年《香山文化——历史投影与现实镜像》一书对香山文化进行多维的审视与解读，以及《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等论著对香山人物的评价与推介，香山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已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学术界和中山、珠海、澳门三地社会各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有的学者认为“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看，这也是中山市一个高瞻远瞩的举措。”^①有的认为“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给人一种学贯中西的感觉。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将中、珠、澳门三大版块再次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探讨，通过比较、交流、融合、提炼，将积极促进三地经济社会的发展。”^②有的认为：“中山的移民和

^① 周振鹤：《香山可贵的海洋意识》，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② 刘纯彬：《扬其精华促进现代化》，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

华侨很多，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能让市民及华侨加深对中山历史文化的认识，对于增强市民归属感和凝聚力，对于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延续革命和商业的传统具有重要意义。提出香山文化必将加强中珠澳门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将这一文化加以推广，将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①有的更加具体地指出：“香山文化为大香山共同繁荣和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以此实现中山、珠海、澳门三地的资源共享，文化认同和产业合作”。“香山文化的推出，对广东的西江流域地区的发展和我省东西两翼的腾飞，将有不可估量的作用”。^②

学者们从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肯定了香山文化的推动作用。有的认为：研究香山文化，是对岭南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种拓展，有利于深化对岭南文化的理解；有利于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赋予城市建设更高的文化品质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山、珠海、澳门三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中山、珠海、澳门历史同源，文化同根，通过认真挖掘、精心培育、创新发展和广

化溯源与解读》，第8页。

^① 黎志刚：《商业文化成为发展动力》，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9-10页。

^② 杨荷卿：《弘扬香山文化，推进区域合作》，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13页。

泛宣传，香山文化这一传统的文化品牌必将在新的时代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①有的专家认为，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将激发学术界的香山文化研究热，进而丰富香山文化的内涵，拓宽香山文化的外延，为岭南文化、中华文化增添新的色彩。”^②“香山文化的提出开启了对大文化圈内小的文化板块的研究，对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研究很有意义。”^③还有的学者指出：“研讨、拓展、深化香山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推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④总之，学者基本上同意这样一种说法：“香山文化这样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的推出，非常有战略眼光和历史高度，不仅保护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创新和发展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⑤研究香山文化，“有利于拓宽岭南文化的研究领域，深化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有利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有利于加强对

^① 蒋斌：《香山文化历久弥香》，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3页。

^② 颜泽贤：《区域文化研究走上前台》，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5页。

^③ 沈渭滨：《对香山文化研究宏观定位》，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10页。

^④ 张磊：《认真做好现代传承工作》，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6页。

^⑤ 庄伟光：《让“香山文化”成为旅游业推向全世界的有效载体》，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14页。

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和弘扬，吸取先贤思想智慧，赋予中山市更高的文化品位，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有利于开展乡土文化教育，培育市民的家园意识和人文精神，强化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有利于加强中山、珠海、澳门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文化认同和产业合作。”^①“弘扬香山文化，对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广东文化大省建设，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②

虽然社会各界对香山文化和香山文化研究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但是，香山文化和香山文化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不是中山、珠海、澳门三地人所共知的。有的甚至则对香山文化概念内涵、价值取向、文化精神等产生了认识上极大的偏差。认为香山文化与广府文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属于岭南文化的一脉，没有必要在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基础上再加上一个香山文化。

其实，无论是肯定香山文化或进行香山文化研究，还是否定香山文化和香山文化研究，在客观上都表明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和香山文化的研究，对于学术界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新挑战。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在长期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融汇闽、客、粤三

^① 王远明：《香山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光明日报》，2006年6月2日。

^② 崔国潮：《弘扬香山文化，推动中山发展》，《光明日报》，2006年6月2日。

种方言民系的文化特点和海外异质文化精神的乡土文化——香山文化，就是中山、珠海、澳门三地文化的根和魂。作为岭南文化一脉的香山文化，以理论的形态出现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社会大众的关注，表明它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和魅力。但是，任何一种思想主张和学术命题的提出，都会经历一个由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上升到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的认识过程。对香山文化的解读，首先需要有一个弄清事实和衡量其价值的过程。只有在充分了解香山文化的前提条件、内容构成、性质特征、功能作用、历史演变等的基础上，才能判断其价值与意义；也只有在确定其价值与意义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深化人们对香山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关于香山文化的内容构成、性质特征、功能作用、历史演变等本体论的研究，已有了不少富有创见的学术成果，^①它们为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香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学术支撑。

第一节 价值表现

从价值论上看，香山文化具有本体的、认识的和实践的等

^① 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多方面的多重价值。具体体现在学术层面、认识层面、社会层面。

从认识层面上看，香山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近代以来文化自觉的典范”。^①费孝通先生曾指出：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自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去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②也就是说，文化自觉既是对本身历史流变和文化传统的理性认识，也是对外来异质文化的科学抉择。

香山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集中地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征，是中原文化、土著文化、西洋文化、南洋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的产物，是相对岭南文化而言的地域亚文化。在香山文化理念的观照下，具有近代意义的商业文化的勃兴；以念祖爱乡为职志、充满家国情怀的

^①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② 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华侨文化的形成，以中西碰撞为标识，以实践西方工商文化为要务的买办文化的出现；以价值观的重建为核心，以振兴中华为导向的革命文化的建立；以融汇中西先进思想理念为特色并在革命和建设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思想文化的诞生，以及今日中山人提出的“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的确立，都是近代以来香山人文化自觉和文化选择的典型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宗桂先生认为：“香山文化真切而又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中国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历程中的文化自觉意识。”^①

从文化的本体论上看，香山文化的价值还在于它是昭显岭南文化特质的范例。李宗桂先生曾坦率地指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类单纯从民系立足而形成的地域亚文化，并不足以全面系统地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质。既包蕴了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内涵，又具有自觉特色的香山文化，正是务实进取、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的重要特征，其综合性的文化价值，远在单纯的民系文化之上。^②

历史上的香山，政区面积包括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以及番禺南沙和顺德的一部分地区。自公元1152年（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建县以来，香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遭遇过多

^① 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② 雷铎：《香山文化ABC》，《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次的人口迁徙和社会融合，吸纳了广府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三大民系的人群，也大胆地接纳了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商人和游历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兼容并包、文化多元的社会文化体系。用雷铎先生的话说，香山文化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杂交文化，具体而言是“两岭”和“两洋”的杂交。

“两岭”即岭南和岭北，“两洋”是南洋和西洋，这种内外二元和叠加的杂交文化，形成了香山文化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①

香山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经历了汉、唐、宋、元萌芽期，明、清积累期、近现代成型期和当代发展期四个阶段。汉唐至宋元时期，香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主要是受内陆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本土以渔盐经济为特征的及海洋文化尚未凸显出来。明清时期，随着外来人口的大批进入，沙田得到进一步开发，尤其是以葡萄牙租住的澳门为枢纽的海上贸易活动的出现，“香山便一直处于中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冲突与交流的风口浪尖，一举一动皆关乎国政，事无巨细往往直达朝廷”。鸦片战争以后，香山因地近港澳、得西洋风气之先，又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这里不仅涌现出一大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开风气之先

^① 《香山明清档案辑录·序一》，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的杰出人物，如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孙中山，而且还成为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开放与改革的关键地带，香山人因此也成为近代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和倡导者。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王云五的《四角号码词典》、《万有文库》、《百科全书》、以及图书分类法和科学管理方法，四大百货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等等，就昭示了香山文化的传承性、包容性、先导性、民生性和开放性。^①香山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以及内容结构和性质特征表明，它既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本。有的学者甚至更加明确指出，“香山文化无疑是岭南文化的重要构成和表征”，它“既具有深厚的岭南地域文化的根底，也具有扎实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它既是岭南地域文化小传统的构成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大传统的承载者。”^②

今天我们所讲的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享乐性、直观性、远儒性、消费性、非规范性、平民性等岭南文化特征，^③其实与香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十分吻合。或者说，香山文化在近现代成型期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恰恰代表了岭南

^① 王远明：《香山文化论纲》，《学术研究》，2006年8期。

^② 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③ 李权时：《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28页，第249-251页。

文化的基本特征。通常人们说讲的岭南文化，其实所指的是广府文化。《岭南文化》一书中所列的广府文化六个主要特征，即“农业的多层次耕作技术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这是广府文化所有内涵的基础”；广府地区是岭南商业贸易最活跃的地区；“物质生活的实用性是广府文化异常突出的特征；”“开放性和兼容性”；“强烈变革意识和心理”；“平民性和市民意识”等。^①与我们所说的香山文化特征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者说这些恰恰是香山文化的具体表现。因为岭南文化中的广府文化，实际上主要还是珠江三角洲的广府文化。而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的主要代表毋庸置疑地是香山文化。如果恰如陈泽沁先生所说“开放、务实、善变”，是广府文化的主要特征，^②那么，香山文化的“坚守正统与开放创新并存，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同在，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合一”的文化精神，则是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基本特征的最直接最生动的表达”。

从学术研究层面上看，香山文化的价值在于思想解放和学术创新。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在于不断地开拓创新。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意味着对象的发现与确认，领域的开辟与拓展，方法的更新与借鉴，观点的突破与新颖，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① 李权时：《岭南文化》，第64—65页。

^② 陈泽沁：《广府文化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是新时期学术创新的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对本土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批判、继承和创新。“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结果。

过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香山地区的历史文化、思想人物等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如澳门学术界对澳门历史文化的关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解说，以及对郑观应其人其行其言的重视，珠海市学术界对容闳、唐绍仪、陈芳、苏曼殊、徐润、唐廷枢等人物的研究，中山市社会科学界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香山买办、华侨文化、商业文化、名人文化和民俗文化等的探讨，海内外学人对香山地区的人文社会风貌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都程度不同地揭示或反映了香山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作用。但是，这些不同层面不同时期的学术研究，对香山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杰出人物，大都缺乏宏观的审视和整体的把握，大都不是站在香山地域文化或香山文化这个层面去考量香山地区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分散的、单一的、个案的、局部的研究，固然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和最重要的环节，但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分散的、单一的、个案的、局部的学术研究，肯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不能代替整体的学术观照和系统的理论思维。“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是对过去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批判、继承和创新的产物，又是对香山历史文化进行整合、概括和提炼的结果。“香山文化”这一学术命题的出台，既拓宽了岭南文化研究的领域和生存发展的空间，又深化了人们对香山和岭南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的认识与理解，有利于推动中山、珠海、澳门乃至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就认为：

中山市将孙中山研究延展为香山文化研究，还可以说是广东文化学术研究的一次新的极为重要的跨越。孙中山研究虽已成为国际显学，但毕竟不能涵盖香山地区历史文化的全乎，况且孙中山研究也只有放在香山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供发掘，也才能提供更为宽阔的学术空间可供驰骋。从孙中山研究及时扩展为香山文化研究，可以看作是中山学术界又一高瞻远瞩的战略进军，对于本地区文化、学术乃至政治、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并进一步指出：

“香山文化理所当然应属绚丽多彩的岭南文化之一支，堪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支脉相媲美。香山文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岭南文化研究的深入与扩展，而且也有助于整个中国文化大系统研究的深入与扩展”，“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

必将受惠于香山文化研究，而香山文化研究也必将受益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①

首先，“香山文化”是对香山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宏观审视和理论概括。它向学术界提出了新的学术命题和研究课题，促使人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当今行政区划的限制，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山、珠海、澳门过去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并从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香山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风貌进行综合的系统的，而非分散的、单一的、片面的学术探索，从而有利于规律的把握，认识的深化，方法的更新，资源的整合和领域的拓展。其次，香山文化本身就是学术创新和理论探索的产物。香山文化从其内涵、本质、特征等方面看，它不仅仅是中山、珠海、澳门现有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三地共同的精神财富。香山文化是对三地历史同源、文化同根的一种历史性和学术性的还原，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香山文化又超越了历史和现实，是在文化或文明的宏观视野下对香山社会演变的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变化与规律的历史追寻和现实拷问。最后，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揭示了学术创新的本质特征，学术研究既要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学术氛

^① 章开沅：《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序》，载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2-3页。

围，又要有怀疑和批判的科学精神。香山文化就是在批判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大胆创新的产物，它本身就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传承性和创新性。迷信、经验和从众是科学探索 and 学术创新的三大心理障碍。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既是对这三种心理障碍的超越，又是尊重学术规范和关照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的一种新的理论创新。从这几方面看，香山文化这一概念的诞生，实际上给学术界、特别是岭南学术界和思想界，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命题，促使专家学者们重新思考香山文化的本质特征、内容构成，以及对岭南文化发展的作用与影响。2006年10月海内外专家100余人云集中山，共同就“香山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南方日报》甚至以“风起伶仃洋，文化大香山”为题出专版介绍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2007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语言学会、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广东省华侨华人研究会、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学术机构也相继在中山召开了“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学术研讨会、“华侨文化与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第十二届粤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加强了海内外、省内外学术界的联系，也深化了岭南文化、香山文化、中华文化的认识与研究，推动了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层面看，香山文化的价值在于突破现

行行政区划的界限，有利于加强中山、珠海、澳门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文化认同和产业合作。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虽然早已脱离了香山县时期（或中山县时期）的隶属关系，在行政区划上各自独立，但是三地共同的历史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断裂，香山文化一直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在文化属性上三地仍然属于一个整体。虽然长期以来，中山、珠海、澳门之间都有着较亲密的联系与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地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还没有完全上升到操作层面。历史同源、文化同根、地缘血缘人缘相近，是交流与合作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增进三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香山文化和香山文化研究是最好的桥梁与纽带。研究、传承和弘扬香山文化，不仅有利于今日三地的文化认同和资源共享，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外香山人（包括今天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家乡与祖国的眷恋，强化香山文化、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①在香山文化这面旗帜的引领下，中山、珠海、澳门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相互补充，协调发展，逐渐形成珠江西岸香山文化经济圈，整体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大香山文化旅游线路的开辟，初步实现了中山、珠海、澳门三地间的资

^① 胡波：《香山文化与学术创新》，《南方日报·理论版》，2006年7月27日。

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香山文化的价值实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翻开中山近代工商业的历史和有关资料,就会发现香山文化在中山工业从手工作坊到家庭式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激励、推动、保障、传承、转化和创新的积极作用。^①有的学者就指出: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香山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区域文化——香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商业文化的支撑,外来生产要素就失去了扎根的土壤,不可能成功地实现生产活动的本土化。中山集群经济从萌芽到今日的蓬勃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接和最重要的诱导因素在于香山文化包容、开放、理性、科学、自由、善于创新、讲求时效等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②

香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还在于它给市民以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信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趋同化的今天,文化的漂泊感和无根意识,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的淡薄,成为世界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心病。弘扬和传承自己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传统,构建新的文化坐标和价值体系,成为当务之急。香山文化是促进感情认同,价值认

^① 王远明:《香山文化研究之价值与意义》,《学术研究》,2006年6期。

^② 张平:《香山文化与中山工业化》,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第581—589页;谢中凡:《中山专业镇经济的文化诠释》,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568—580页。

同，历史认同，身份认同的强有力因素。弘扬香山文化，有利于现代中山人、珠海人、澳门人构建自己的情感慰藉的意义世界，必将进一步激发三地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培育人们的家园意识和民族精神，强化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香山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创建和谐文化的借鉴。和谐社会的根基是文化，创建和谐文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谐问题。香山文化所包蕴的兼容、和谐精神，中外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国文化系统内部不同地域、不同民系文化的共存，都为我们今天创建和谐文化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借鉴。”^①澳门的学者亦认为：“香山文化的提出，不仅为澳门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也为势在必行的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②

第二节 价值实现

文化是有价值的，但并不是任何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要素都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与社会效益。香山文化在经济、学

^①王悦：《从香山文化看当代中山集群经济的形成》，《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609页。

^②吴志良：《香山濠镜辨光芒》，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545页。

术、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仅仅是其内在的一种属性或功能，是一种非显性的客观实在。如何使这种隐性的客观实在凸显出来，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则需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和操作平台。

作为学术命题的香山文化，其价值主要借助于香山文化研究活动来实现。香山文化研究应该在正确处理好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同时，^①加强香山文化的微观研究，实物的文化属性研究，制度文化尤其是家族管理模式研究，以及文化土壤研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研究，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上，运用多维视野和比较的方法，在理论模式上大胆探索，实现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②2006年广东省学术文化基地和岭南与学术文化研究所也相继在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正式成立，暨南大学亦成立了香山文化研究所，中山市成立了香山文化研究会。香山文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些专门的研究机构的创立而日益彰显出来。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香山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应该成为乡土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建设

^①李宗桂：《香山文化的底蕴和价值》，《南方日报》，2006年7月27日。

^②吴灿新：《香山文化研究之我见》，《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56-61页。

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资源。“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是香山文化特质以及正在丰富和发展着的中山人素质、价值观念、道德行为、精神气质等因素的综合体现。总结提炼中山城市精神的过程，是通过挖掘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赋予现代价值，不断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批评、自我升华的文化自觉过程。它有助于社会形成普遍的价值和文化认同，有助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开拓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有助于加强文化建设，培育厚重的人文精神，正因为如此，章开沅先生认为“中山市把这两项研究（孙中山研究与香山文化研究）联为一体，共生共荣，相得益彰，这是新时期中山人精神——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又一次展示。”^①有的学者还指出：孙中山遗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已经建立的功勋，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正如宋庆龄所说：孙中山留给我们的还有他对革命的“不息的热诚”；他“愈挫愈奋”的品格；他与时俱进的“不断进步的要求”；他“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他的谦逊和他亲近人民的作风”。这些需要继承和弘扬的思想，已经成为香山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使香山文化继续站在

^① 章开沅：《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序》，载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3页。

先进文化前列的极为重要因素。^①

香山文化作为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共同的文化资源，其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价值同等重要。物质文化不仅是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物质结晶，而且物质文化一旦形成后，对于后来者就是一个既定的环境因素，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在时间之维上的载体。香山文化的物质文化同样具有它的内在价值。就香山历史文化的物质形态而言，它就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等。对香山现有文物的保护性维修和合理开发利用，同样会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同样会给城市带来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政治的多重效益。充分挖掘、整理、研究和弘扬香山的方言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买办文化、华侨文化、名人文化、思想文化，合理开发利用香山文化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旅游，加强区域间的多方面的合作，是香山文化价值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通常，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很难完全分开。当我们创造或引入一种新的物质文化之后，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也必然接踵而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城市中的一切物质内容，房屋、街道、公园、场馆、商店等，都反映了建造者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但城市的

^① 盛永华：《香山文化始终站在中国近代先进文化的前列》，载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第239页。

结构又决定和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使城市居民不自觉地形成了严格的时间观念和金钱观念，适应了淡漠的人际关系环境。2007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尊重历史、传承和弘扬本土文化的前提下，提出了创建文化名城的战略构想。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陈根楷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开创中山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局面》一文中就着重指出：要从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树立“大文化”观念，扎实推进文化名城建设。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积极开展理论宣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抓好现代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促进人们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弘扬“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焕发全市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加强特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快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划，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抓好文物普查，挖掘整理本地民俗民间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保护利用好名人故居、历史遗迹、古旧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加强孙中山研究及相关资源开发，凸显我市城市象征和文化特色。发展文化事业。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增强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把文化名城建设纳入

财政预算，增加文化投入。加快新图书馆、博物馆群、名人纪念馆、档案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提成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完善农村、社区文化体育设施，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繁荣文艺创作，打造文化活动品牌，培育文化名家、名作、名企、名牌。发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工作社会化。激发文化发展活力。完善和落实扶持政策，鼓励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支持出版印刷、文化旅游、游艺机、文化用品等优势行业做大做强。深入挖掘产业文化，丰富区域特色经济文化内涵，提高产业竞争力。^①

2007 年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了近期中山要努力实现经济强市、和谐中山、法制社会、宜居城市、文化名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六大目标。关于文化名城建设，社会各界讨论十分热烈，什么是文化名城，更成为问题的焦点。有的学者甚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名城的六大构成要素，即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名人、文化成果、文化产业、文化物标六个方面。^②这实际上为香山文化在创建文化名城中发挥其特殊作用，树立了目标，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如果具备了这六个方面的条件，

^① 陈根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开创中山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局面》，《中山社科》，2007 年第 4 期第 3 页。

^② 王远明：《寻找城市精神的动力》，《香山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310—315 页。

文化名城也可谓实至名归，香山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其特殊的价值与现实的意义。2008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又正式提出了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具体工作规划，组织实施素质山文化工程、历史文化工程、产业文化工程、民俗文化工程、公共文化工程、博爱文化工程、“三名”文化工程和生态文化工程。在城市品牌打造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

总之，文化不仅使社会粘合成一个整体，而且文化的积累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加到已有的文化之中，并传给下一代。这样，人类对自己的周围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乃至自我本身的认识就不断积累下来，使人类一步步走向更文明的世界。香山文化无疑是历代香山人不断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自然也是今日中山、珠海、澳门人进行文化创造和推动文化进步的资源 and 动力。香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种不断创造和薪火相传中实现的。

附录一

香山文化显芳华^①

——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16—18日,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中山市社科联、珠海市社科联和澳门基金会协办,岭南与香山文化研究所和香山文化研究会承办的“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市香格里拉酒店召开。全国20多个省市以及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140余位专家学者莅临研讨。研讨会通过征文和特邀形式,在提交的120多篇论文中海选了86篇,论及香山文化的基本概念、本质特征、演变轨迹、历史名人、香山民俗、香山方言、香山买办、香山华侨、香山商业、香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香山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汇集了海内外众多学人在香山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为多视角、多层面挖掘、整理、研究和弘扬香山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香山文化的内涵和本质

^① 文载《学术研究》二〇〇七年第4期,作者为王杰、胡波。

在研讨会上，香山文化的内涵、特质以及历史演变等论题，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一）何谓香山文化？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主要是指以包括今日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香山旧属为依据，渊源于历史上人与自然以及人脉间对象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生活结构体系，是中原土族移民入徙香山带来的汉族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并与西方文化交汇逐渐形成的一种新质文化。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就是一种相对于岭南文化而言的地域次文化，包括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和制度层面的文化。有学者如是表述：既源于中国传统，又融会外来因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创造、制度构建、行为规则、文化习俗以及价值取向等的总和，即为香山文化。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是指形成于中山、珠海、澳门等古香山一带的大陆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的混合型的属于岭南文化系统的、有着自身价值体系的三级区域文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是指历史与现实中香山地区产生的经诸种文化融会杂交而形成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特质的一切形态的文化成果和文化现象。有学者强调指出，香山文化是指历史上属于香山地区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即思想文化。也有学者强调，香山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地域，是岭南文化的缩影，

孙中山是香山文化之集大成者，香山文化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源头。

（二）香山文化的特质何如？香山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于政治、经济、思想和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令人瞩目。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拓殖性。香山地处对外交流的前沿要冲，形成了积极向外发展的拓殖品格，先行者走出国门，带回新思想，在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中起着启蒙和导引的作用。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和海洋意识等特质，香山华侨文化和买办文化就是香山文化特质的具体体现。有学者做出如下归纳：第一，敏锐接受外来的先进文明是香山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于此考察，容闳不愧为一面光辉的旗帜；第二，与封建的腐朽的文化决裂和彻底斗争，这在孙中山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三，不安现状、居安思危的精神，是香山文化的核心内容，郑观应堪称思想风范。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的特征，首先是爱家、爱乡、爱国，其次是开放，再次是创新。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具有崇文尚武、顺应自然和重商的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上表现为坚守传统与开放创新、趋利务实与热情浪漫、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等对立统一的精神品格。在社会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传承性、包容

性、先导性、民生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具有先导性、包容性、求实性和博爱性等特质。有学者概括了香山文化的四大特点，即目光远大，视通中西；善捕良机，决策果断；脚踏实地，精益求精；融合中西，植根中华。还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的特质是重教的、爱国的、革命的、商业的文化。

（三）关于香山文化的建构。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包括方言文化、买办文化、商业文化、名人文化、华侨文化、思想文化、民俗文化等七大板块。有学者提出商榷曰，用洋务文化取代买办文化更加贴切，因为香山买办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意见认为，香山文化包括思想政治文化、买办文化和华侨文化三个维度。有学者称，慈善文化或捐赠文化、博彩文化等亦是香山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学者特别指出，近代香山商业文化的主要载体是香山籍买办和华侨商人，由此促成了文化的多元化，体现一种典型的中西融合特色，既有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特别是岭南商业文化的底蕴，更带有浓厚的近代商业文明特质。香山商业文化是粤商文化的重要支系，亦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还有学者阐发了香山文化与澳门文化的关系，指出，香山文化是近代澳门文化的根基，澳门文化也对香山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

将澳门文化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段，那么，古代澳门文化是香山文化的一部分；而近代澳门新文化，则以香山文化为根基，通过与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混合的新文化。澳门新文化，成了推动香山文化进步和发展的先声。

（四）关于香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与会学者认为，香山文化是客观存在的。香山文化概念出台，乃将香山文化显性化。事实上，香山文化已成为岭南文化中既有共性、又富本土特性的，与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广府文化相提并论的区域文化，研究香山文化兼具理论、学理和现实的多重意义。有学者强调指出，香山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有利于推动区域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为，香山文化是近代岭南文化的重要源头，对香山文化的发幽探微，有利于深化岭南文化的研究；如果把香山文化的外延考虑进去，它又是中国沿海文化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板块，目前对中国沿海文化整体性的研究，在国内几呈空白，因此，香山文化研究还有利于推进中国沿海文化的研究。一些学者在论及其现实意义时称，香山文化概念，将为当今中山、珠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大的本源性的支撑因素。此地的移民和华侨很多，对香山文化的凝炼，有助于促进市民及华侨加深对本（故）土历史文化的认知，对增强“香山”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对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延续革命和商业的

传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其次，香山文化研究有利于剖析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的个案——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区域研究作为基础，宏观的整体中国文化研究难免会出现蹈空的缺失。香山文化具丰厚和深远的历史传承，又是多元文化的结合，尤近代以降，与西方文化的融汇，充分体现了香山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个性。还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的旗帜，是一种地域范围较小、内容却十分重要和独特的地域文化自觉。香山文化的文化自觉过程，是近代广东文化自觉延续和深入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岭南文化研究勃兴，代表着广东文化自觉的又一高潮。“香山文化”横空出世，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广东文化自觉于地域文化研究中凸显的新建树。也有学者认为，珠江三角洲是中国近代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香山文化作为近代珠江三角洲文化的核心，毋庸置疑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奠基石。学者们认为，近世以来，香山得“西学东渐”之先风，人文荟萃，先驱人物辈出，他们在推动中国历史和文化向现代演进的近代新中国运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如有留学美国、成为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被美国报刊评定为“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的容闳，有立足全国、面向世界、振兴中华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等，他们都是中国人的骄傲，香山人的光荣。对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史

学价值，他们爱国奉献、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对于以承传创新为趣旨的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也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历史人物与香山文化

关于香山文化中人物与事功的研讨，提交大会的相关论文有 30 余篇，约占入选论文的 40%。

（一）关于香山人文。有学者认为，士大夫是古香山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香山置县始于南宋。自南宋至明朝期间，香山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饱浸着地方官和士大夫的心血。由于宋朝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唐朝都有长足的发展，宋朝廷予士大夫宽松的政治参与空间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使之对国家抱有炽热的知遇之恩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报国”成为他们的人生抉择，于宋元之际的政权变革中，他们表现出伟大的气节。明代以降，香山黄氏三代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的贡献实质上是香山文化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晶。许多专家强调指出，在思想政治领域，议会思想、民主革命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香山人引领风骚；在近代商业史上，香山文化建树良多。著名企业家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以及创办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的华侨实业家马应彪、郭乐、蔡昌、

李敏周等，乃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都烙上了香山文化开放性与创新性的时代印痕。

（二）关于香山买办。买办不失为香山文化的特产，他们在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另类”角色，令香山文化增添了奇异斑斓。该会的论文中，有16篇论及香山买办。不少学者认为，买办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昙花一现”的一个阶层，曾显露出不少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买办文化无疑是中国近代潮流中的一朵“奇葩”，地位十分独特，效应令人惊殊。与会者认为，香山买办群体的大多数成员在推动晚清民国社会变迁的实践中，筚路蓝缕、首着先鞭：他们关心民瘼、热心公益事业、兴办学校、草创医院、创办会所、出版报刊、整理古籍、编撰族谱、改良乡政、赈济灾民的种种善举，既有功于文化建设，也有益于政治改良、社会进步，弥补了政府功能的缺失，维护了地方和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西合一，“和而不同，不同而和”，在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上，为时人和后世树立了兼容并包、开放创新的风范。在思想观念上，他们善于西学中用，推陈出新；在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他们有进取心、有商业头脑，善于运作和经营，讲效率、重市场、具冒险精神。他们依靠个人奋斗，由贫贱而富贵，以血汗铺垫成功，实现向上流社会靠近的理想，向时人

展示了从商与西化的机缘和前景，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和冒险性，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的社会变迁。有学者认为，买办文化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可以从买办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教育细节中体味一斑。他们的衣、食、住、行、用等“举止”华洋一体，语言中英并用，子女教育中西结合，人际交往中外兼容，显见“另类”和“时尚”之双重意味，予人以强烈的冲击和深刻的省思。他们是19世纪中国社会渴望脱贫致富者的偶像和榜样，也是冀望由商人仕、跻身上流社会之辈的楷模和努力的方向。他们是旧习惯势力最勇敢的挑战者，又是社会秩序、宗教文化的守护人和社会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三）关于香山人物。有学者对孙中山与香山文化的关系作了论析，有人对郑观应的史学思想作了剖解，有对容闳与近代新中国运动作了阐发，有对杨匏安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了研究，有学者研探了王云五与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转型等等。还有人对香山唐家湾唐国安家族三代与清华大学的关系进行了研讨。有学者强调，苏曼殊一生体现了香山佛教的入世精神。香山佛教始终将个人的修行与社会参与、积极入世联系起来。香山佛教的平民化风格，体现在苏曼殊身上，就是对佛教的理解，从来不陷于艰深晦涩的佛教义理，或佶屈聱牙的名词术语，而是在

日常生活中体悟佛教精神、佛教的基本命题。他从来没写过中规中矩的“佛教论文”，但他的小说、诗歌、绘画、杂文和书信，却无一不渗透了他对佛教的理解。这种化入个体生命感悟的佛教理解，既是深刻而真实的，又是平民和大众的，是普通人也能在自己人生经历中感受到的。苏曼殊的思想还体现了香山佛教的开放性，他虽然深受佛教思想——尤其是“但行直心、顿悟任运”的禅宗影响，所以他多次参与革命组织和活动，却能空名空利，不陷贪痴，孙中山就曾称许“曼殊率真”。

三、香山的民俗和方言

香山地区是一个移民和文化多元的社会，因之，它的民俗文化和方言文化浸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

（一）关于香山民俗文化。有学者指出，在民俗文化方面，香山地区有许多值得研发的品牌，最能体现也最具审美和开发价值的民俗文化应是香山的民间文化艺术，包括沙田地区流行的高棠歌、咸水歌和大罾歌，五桂山区的客家山歌和沙溪的鹤歌，黄圃的飘色等。小榄的菊花会和咸水歌就是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有学者认为，中山南朗崖口的飘色，彰显了典型的民间文化风貌。小榄菊花会是中国菊文化最集中和群众参与性极强的民俗活动。小榄菊花会已不仅是一种单纯的

花卉展览，而是以菊花为主题的颇具特色和个性的综合性艺术展示。

（二）关于香山方言。丰富多样的方言，既是香山社会的一大特色，又是香山移民文化、多元文化的历史印记。学者们对香山地区方言特别是中山地区方言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广东三大方言语系在香山一带并存，这在全省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使用粤方言的人数最多，占总人口的 77%。粤语内部又兼有分别属于粤海片、香山片、四邑片、莞宝片的方言。“三语四片”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已在中山的方言中扎根并对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各大方言语系既有区域间的不同，又共存共荣。学者认为，中山客语居民基本上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生活在南部五桂山区中；中山闽语方言岛分布在市中心周围的沙溪镇、大涌镇、三乡镇及张家边镇等地；而中山粤语则分布在北部冲积平原区的南头镇、黄圃镇、三角镇、东风镇、小榄镇、古镇镇、阜沙镇、东升镇、横栏镇、港口镇、民众镇、沙朗镇，中部的石岐镇、环城镇和南朗镇以及南部的板芙镇、坦洲镇。中山粤语内部又可分为沙田话（近顺德话）、石岐话、古镇话（近四邑台山话）和三角话（近东莞话）四种。多种方言杂居，是由历史上的移民语源所形成。

四、香山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香山文化是一种活文化,它没有因行政区划的分割而离散。香山文化在发展和传承中,不仅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而且也在传承转化中实现了创新。

与会学者认为,香山文化具有传承性和创新性。从历史上看,香山文化并没有因时空的变迁而流失,而是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而“香火”益盛。尤其是孙中山的愈挫愈奋、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和博爱精神,在香山得以代代弘扬光大。有学者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创新则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创新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行为状态,是流淌在香山文脉中的活性因子。强烈的创新追求,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依托民族历史传统的本土文化,吮吸世界的先进文化,立足现实的创新文化,这就是香山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是深厚文化底蕴的香山文化,其独特价值的首要表现,是彰显岭南文化特质的范例。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类单纯从民系立足而形成的地域亚文化,并不足以全面系统地体现岭南文化的特质。既包蕴了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内涵,又具有自身特色的香山文化,正是务实进取、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其综合性的文化价值,远在单纯的民系文化之上。

与会学者还认为,捐赠文化也是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山的捐赠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从捐赠的实体看,可分为华侨华人和社团民众两大捐赠主体,“慈善万人行”经已成为中山市新的民俗文化品牌。捐赠文化尚待发展完善,因之有更大的潜力和空间。研究和培育捐赠文化,不仅可以推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且可以培育现代城市的新风尚,铸造新的文化品牌,有利于营造一个“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有学者认为,香山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代工业文明不仅为文化事业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需求和物质基础,也进一步丰富了香山文化的内涵。工业化中所形成的品牌意识、科技与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现代公民观念、利益向下的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等逐渐深入人心,使香山文化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为完成工业化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事业现代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也有学者指出,中山集群经济从萌芽到今日的勃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诱导因素在于香山文化包容、开放、理性、科学、自由、善于创新、讲求时效等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因而,中山集群经济的诞生和发展,并非偶然现象,乃其文化驱动力使然。

五、香山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一) 香山文化既要定位, 又要拓宽视野。学者指出, 香山文化研究之要者, 乃对之作客观的定位, 既要弘扬香山文化, 又要摆正位置。香山文化是在岭南大文化圈制约下, 带有本土特质的区域文化。众多香山人物是近代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 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引领风骚、成就卓著、地位显赫。此前, 对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人物研究相对多一些, 而对近代商业文化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如著名企业家唐廷枢、徐润, 以及创办新新等四大百货公司的李敏周等人, 都是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人物, 他们的人生经历充溢着香山文化开放性与创新性的芳香。从文化力的角度审视, 把香山文化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 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给人一种学贯中西的感觉。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 将中山、珠海、澳门三大行政区再次整合到一个体系中去探讨, 通过比较、交流、融合、提炼, 将有效促进三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 探讨、拓展、深化香山文化研究, 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 而且是为了推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学者认为, 香山文化为我们考察与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和谐文化形态, 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新的实践逻辑, 为实现科学发展、造福大众、推进文明, 提供了新的理论方向和思想动力。对香山文化的内涵

和价值，我们亟需从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的深刻层面加以把握和思考。

（二）香山文化需深耕历史土壤。学者们认为，研究香山文化，归根到底是要弘扬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中最值得大力弘扬、重点研究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开风气之先的精神，三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有学者强调，要以辩证的眼光探讨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的建构，特别是作为一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对区域文化的探讨，应把握一些原则，即须坚守唯物史观和辩证史观，对区域文化的探讨，不能被狭隘的乡土理念所束缚，要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以世界的视野，长时段、大框架来分析香山文化的特点。研究香山文化，要把握其特质。要注重民间考察，从民众的视角去了解最早的香山地区最早存在的一些文化因素，以便梳理它的承传。还有一些学者强调，要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香山文化。香山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开放性。香山文化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要将之放到当代世界人文领域这个大范围内去研究。研究香山文化，必须理论结合实际，放眼世界，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促进文化的新发展、新交流。研究香山文化，要注意国际学术研究的变化，尽量使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诸如心理学、心智史研究方法等，都可以引入香山文化研究，尤

其是人物研究。香山众多名人，成名并不在桑梓，他们与香山文化的联系应该如何阐释？香山文化的优势体现在哪里？这些都应从新角度进行研究。有学者指出，香山文化的研究不能用一只眼睛去观察，必须两只眼睛协调审视。比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首先必须要从当时、当地的客观历史情况出发，遵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当我们结合现实来审视时，既不能以认识的偏好或情感的专注过于夸大其价值，也不能随意否定其功过，更不能以“现实的需要”去舍取甚至歪曲历史事实。还有学者认为，要加强对香山历史文化土壤的研究，把微观研究引向纵深。广东已有学者运用文化学和历史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孙中山的性格特点和成因，从地域文化特征到人物心理特征、性格和行为的逻辑链上将文化和个人予以整合，展示了“历史研究的新模式”。除现有领域外，晚清以来的书院、社团、报刊（含公司企业的内刊、月报、宣传品）、节庆（妈祖节、牙祭节等）、咀香园食品、沙溪凉茶、石岐步行街等等，极富岭南气息，又具民俗特色，而研讨几呈空白。对香山文化的研究实践，要尝试各种理论模式，博采众长，因地制宜，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文化特性的文化研究理论范式。在研究方法的取用上，审视现有的理论模式，广泛吸取东西文化研究成功范例的经验。文化

研究的成功离不开合理的理论模式，探索出一种合理的理论模式，就可少走很多弯路。

学者们一致认为，香山文化概念的提出，是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研究整合。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无论是对买办文化、华侨文化、移民文化，还是对民俗文化、名人文化，都不能拘泥于它本身所在的领域和体现出来的显著特征，理应多方位、多角度地发掘其多歧取向与多重价值。要进一步扩大香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将研究的视野拓宽到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要注重香山文化的阶段性研究，将不同时期的研究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创新文化建设。香山文化是一个庞大的资源系统，在研发的过程中，务必把保护性开发研究和创新性开发研究结合起来。唯有尊重历史，才能创造未来。

附录二

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

王鲁湘对话香山文化^①

王鲁湘：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以下简称“王”。

张 磊：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原院长。以下简称“张”。

胡 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人文社科系主任，教授。以下简称“胡”。

王：今天是孙中山先生 140 周年诞辰，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其他的那些人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他们和孙中山先生有什么关系吗？我来告诉你，这些著名的政治家、

^① 该节目于 2006 年 11 月 12 日、13 日分别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欧洲台、美洲台播出

思想家、商人、艺术家，还有运动健儿，和孙中山先生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来自一个叫做香山的地方。这个香山可不是现在北京满山红叶的香山，而是旧时广州府的一个县，地域范围包括了现在的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香山这个名字，在现在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无从寻找，因为在1925年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去世的那一年，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将这里更名为中山，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当地的影响之大。同时也有人说孙中山这个世纪伟人只可能出现在香山这个地方，是香山造就了他，这种说法我非常同意。至于原因，还要从一个沧海桑田的传奇故事说起。

旁述：香山，原来只是伶仃洋上的一个孤岛，因为多产奇异花卉而得名。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年），香山县设立，隶属于广州，位列岭南诸县之末。在传统的农耕时代，这里农田稀缺，粮食不足，自然被视为蛮夷。那么这样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是怎样和大陆相连，又是如何变成了众多族群聚集的家园的呢？

王：胡先生，你好！

胡：你好！

王：我手里拿的这本书，是由王远明先生主编，您是副主编，是吧？《香山文化》，厚厚的两大本。封面上的这幅地图我

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就从这幅地图开始。

胡：好。

王：这个地图一看，香山好像是个海岛。

胡：对，过去香山是一个海岛，从番禺广州到香山当时要走三天，坐船也要三天时间。那时候当然没有现在这种轮船，那时候是划船，所以要三天三夜。

王：我从一些有关的资料看到元代的时候香山肯定是一个岛屿，到明代的时候才逐渐逐渐地由于海沙的堆积和包括珠江的一些泥沙的搬运，以后才和大陆联系在一起的。

胡：我们今天说是冲积平原，其实它不完全是。

王：有些是人工的。

胡：有很多是人工的东西。香山这个地理环境的形成，今天形成海陆的环境，其实有两个力量在作用：一个是自然的力量，就是冲积平原，水土的流失和冲积；第二个这是个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咸淡交界的地方，人们必须改造良田，那么就有围海造田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地方的人随着迁居的时间不同，他居住的地方和控制的地方也不一样，比如说福建人来得比较早一点。

王：先占一个好一些的地方。

胡：对，他占那个好的地方，就是在山丘和海的交界的地

方，这个地方刚形成陆地，他就占领了这些地方。客家人相对来说来得比较晚一点，他就住到山里面。

王：变成山客了。

胡：对，有山必有客，有客必有山。再一个就是水上人家，就是广府人。广府人在沙田这个地方进行开发，他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也决定了他这个地域的这个社会的构成。所以香山早期开发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的富有诗意，浪漫。

王：很艰难的。

胡：是非常艰难的。

旁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山市的户籍统计显示，全市100多万人口中，共有姓氏502个，表明了香山人口构成的复杂。根据《香山县志》记载，香山最主要的族群是来自福建的福佬人，来自粤东梅县的客家人，以及来自番禺、南海等县的广府人，他们纷至沓来的同时，也将各地的文化带上了这片土地。

胡：其实香山文化是一种活文化，它是不断地构建或不断在构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再就是吸收海外如西洋文化、南洋文化，加上香山本土的。

王：还有一些土著文化。

胡：对，而且这个历史上的移民不断地迁移，有不同时代的迁移，这样的不断的迁移不断的融合的过程之中，形成一种新质的文化，这就是香山文化。所以香山文化严格来讲，它是包括中山、珠海、澳门在内的一个地域文化。它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缩影，是岭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尤其到近代以后的香山文化，我认为就是引领着整个岭南文化的发展。

王：所以它是一种这样碰撞融合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种香山文化具有兼容并包和多元共存的性格，对吧？

胡：对。

王：在近代以前，香山这个边陲小县并没有什么显山露水令人羡慕之处，它后来的辉煌，得益于中西的交通。16世纪葡萄牙人经过漫长的航海旅程，踏上了中国的版图，而他们首先登陆的，就是当时隶属于香山县的澳门，他们首先见到的中国人也就是当时的香山人。后来，他们以每年500两银子租住澳门，澳门于是成为最早的东西文化交汇和碰撞的中心。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布道。可以想象，当同时期的中国内地依然流传着西洋人好吃小儿，甚至挖人眼睛以供炼银煎药的传闻时，香山人已经知道西洋人是怎样的船坚炮利，也知道他们是怎样的认真诚实，怎样的传教育人。

胡：澳门实际上当时是隶属香山县，因为葡萄牙人虽然租住澳门，但他是每年都要给 500 两银子香山县的。它还是归香山县管辖。在这种管辖范围之内的话，我们的老百姓们认为这个并没有分出去啊。

王：对，我们只是租了一块地给你，你还要给我付租金嘛。

胡：对对，所以它这种主权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澳门本身的这个来往还是非常密切的。

王：特别它民间社会来往非常密切，民间社会没有什么区别。

胡：这个密切的联系使香山人可以自由出入澳门。自由地出入澳门可以了解西方的文化，比较切身地去感受西方的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有很多人可以从书上看，也可以道听途说，但是我们香山人可以直接看到澳门，什么是西洋文化，西洋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王：教会是怎么回事，教堂是怎么回事，做礼拜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家里头开舞会是怎么回事，都可以直接参与其中。

胡：对，它就不会出现义和团时期出现的那些谣传，这个就是很真实的，看到这个文化，他们能够了解西方的东西。

旁述：从 1553 年被葡萄牙人租住，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澳门一直是中国版图上中西文化交流

的唯一窗口。欧美各国来中国传教、游历、贸易，甚至外交都是首先在澳门登陆的。另一方面，林则徐、魏源、洪秀全、郑观应、孙中山等中国近代一批思想敏锐的精英，也是从这里观察到了西方文化。而由移民组成具有冒险精神的香山人更是耳濡目染，得地利之便，开风气之先，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胡：它是移民构成的一个社会，同时它也形成一种移民文化。移民文化最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强。第二个是敢于冒险，这样探索冒险的精神，我认为是非常典型的。

王：还有一点就是移民人身体体质都是很好的。

胡：比较好的。

王：他千里跋涉以后跟我们万里长征一样，身体不好的都被淘汰了，到达目的地都是最棒的。

胡：对，他这个移民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香山人从外地移来，经历了一代发展以后，他们又迁移到海外去。

王：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大的更大范围的迁徙的中转站。

胡：对，从内地迁徙过来，定居以后，繁荣发展以后，他们又向两个地方迁，一个是向海外迁，在旧金山和新金山发现以后，香山有一大批人到了檀香山、旧金山或澳洲，就是新金山，他们是去淘金。后来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有大批的

外国人、洋行到中国沿海五口的地方去通商的时候，香山有大批的人，也跟着去了。

王：这一部分香山人的移民，这种新移民是跟着外国资本的移民。

胡：对，资本的移民。移民社会就像刚才讲的，他有一种比较开放、兼容、冒险、探索的这样一种精神，还有一种创新的精神，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不是猛龙不过江”，他有这样一种意识，有一种敢于适应的意识，他才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文化的基因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

王：那么动态地看，从社会发展史动态地看，刚才你已经实际描述了从这个咱们中国的中古时期开始，这种不断的中原移民就开始往这边动态地流动了。然后到了香山以后；再又继续动态地向世界的范围进行流动。同时从16世纪开始，西方的比较冒险的，也是一批这种移民，他开始向东方流动，也可以说是东西方两支最具有冒险精神，身上流淌着这种冒险的血液和基因的人在香山这个地方碰撞了。

胡：对，他们两个的这种结合，有某种相交相合的东西，他才能够融合。

王：甚至有两个互相欣赏的东西。

胡：对，我们说英雄惜英雄，好汉爱好汉嘛，他就有这样

一个相互融合的东西。这种融合带来这个新的文化的碰撞，他会产生一种新质的文化。香山文化是一个活的文化，是一种不断流淌在香山人血液中的活性的因子，这种文化对后来包括我们今天的中山的发展，珠海的发展包括澳门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14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66年的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出生在香山县的翠亨村。13岁起，他在早年出国谋生的哥哥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在夏威夷、香港等地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西式教育。可以说，当年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对中山先生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其实，留洋海外接受西方教育，在中山先生的故乡可以说早有渊源，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公元1872到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因为他们出洋时平均年龄只有十二、三岁。这群幼童到了大洋彼岸，脱去长袍马褂，以惊人的速度越过了语言障碍，成为各个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考入了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麻省理工，当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他们恰好被送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前沿。归国后，这群欧风美雨熏陶过的精英，是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出现了今天

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出现了中国第一批海军将领，出现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所有这些孩子的故事，和一个香山人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学生——容闳。

王：今天我手里拿到的这一套王远明先生主编的《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我翻开里头一看它，好家伙，香山的人物还真多。第一个当然就是孙中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还有，第二个就是郑观应，中国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和实验家。那么香山还有一些人物，翻到第二页，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容闳，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三个人。按照中国的长幼有序，就从最年长的容闳先生谈起。

张：容闳先生，他是我们的先贤，他是最早去的留学生之一，而且第一个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毕业证。

王：耶鲁大学。

张：对。他现在就葬在那里。

王：那么就说容闳这样一个人物，他好像生于 1828 年。

张：对，1828 年。

王：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部分的中国人可以说是 99.99999% 的中国人，可能都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在那久远的年

代里头，为什么在香山这样一个地方，会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海外去留学。

张：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地缘关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澳门这个窗口，16世纪中叶以来的窗口，那么容闳就不可能到澳门去读马礼逊小学，现在这个小学还有。然后，他和西方的一些牧师发生密切的关系，到美国去留学，他的父亲好像希望他做一个通使。

王：通使就是翻译。

张：对，但是他进入了西方的文化之后，他就感到，一定要有比较先进的民主主义来改造自己的祖国，所以他才这样终生奔波。现在在耶鲁，我们——不但是中国人，包括美国人都去看他的陵墓。

旁述：1854年，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毕业时，他立下誓言“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句话成为了他穷极一生的信条。回国后，他四处奔波寻访，得到了当时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约见，几番周折之后，他的建议终于被清廷采纳，梦想变成了现实，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启程了。

王：当年很著名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向皇帝的奏折，就是要

求选派留美幼童去留学，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那么这个历史事件中间，容闳他的作用在什么地方。

张：我觉得他是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香山文化中间，留学生文化是很重要的，它不是个别的留学生或者比较多的留学生，它是留学生运动，从容闳先生提出。

王：当时，选派 120 个留美幼童，分几批，主要是在沿海各省份。

张：主要是广东。

王：有 84 个是广东的。

张：对，绝大部分。

王：那么这 84 人当中，将近有 40 个是香山人。

张：对，他本身就是香山人，当然就在故乡里着重挑选。另外他开放。

王：对。

张：如果当时在我的故乡河北，比如太行山上，你要说去美国留学，恐怕震动极大，而且会遭到拒绝。

王：对，因为当时明确是要签押的，说好的，二十年，中间不许退回来，也不许转过去，转去做别的事情，而且还不许滞留不归。当时去的最大的好像是 18 岁。

张：最大 18 岁。

王：小的 12 岁。

张：一般平均年龄 14 岁左右。

王：14 岁左右，这么小的孩子离开父母，远涉重洋，二十年，人到中年才能归。

张：我觉得这对近代中国来讲，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为在近代中国，你要拯救和发展它，你再靠诸子百家，包括儒学，都不可能的事情，只能依靠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这些，我们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不可能及时产生，一定要从西方汲取。所以鲁迅先生说，这些留学的、传播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他们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窃取天火来给人间带来福祉。

旁述：然而这一创举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作为留学生的正副监督，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和留学美国的容闳之间屡屡因为管理问题发生矛盾。体育运动、西式服装，都会成为矛盾的导火索。1875 年 2 月 24 日，容闳与美国人玛丽·凯洛克结婚，如此西化的行为，让其他中国人瞠目。他们认为副监督的这种行为，会给幼童做出很坏的榜样。这一年，陈兰彬告假回国。几年后，一位新监督的到来，让容闳和留美幼童们预感到了前景的不妙。

张：大家看到那个照片，都是很小的学生，长袍马褂。我

记得在哈佛的时候，那些外国人看着都可笑，觉得这好像是木偶一样。但是他们不久就把辫子剪了，不穿长袍马褂，然后穿了西装，有的甚至和美国的女孩子恋爱了，这当然就犯了大忌，所以遭到了广泛的攻击。认为是离经叛道，数典忘祖，那当然是很大的罪过，所以顽固派又把这个扼杀了。

旁述：1881年，清廷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已习染”为由，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就这样，当半数中国幼童已经就读于美国大学之时，留美幼童计划宣布破产。

王：当时好像留美学生总共120个，只有两个人完成了大学学业。这中间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詹天佑，就成为中国现代工程之父，科技之父，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就是他当时主持修建的，成为中国近代工程的一座里程碑。

张：但是，我必须稍微给你提醒一下，就算是没有完整的完成学业，没有毕业而肄业，他们也学到了先进的东西。

王：这里头有很多人，在后来回国以后很快就参加了这一个中法的战争，后来又参加了甲午海战，这里有很多的人就在这两个战争中间牺牲了。

张：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商业、运输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你只要看看清末的和民初的很多人物，就看到了肄业生也不能低估。

王：对，这里头，就是这些学童中间，后来我们看到出了一个国务总理——

张：国务总理，唐绍仪。

王：唐绍仪是吗？然后出了好几个海军将领，包括海军部长，还出过这一个邮传部长，就是现在我们邮电运输部长，对不对？

张：交通部长。

王：交通部长。当时就是说，这个近代洋务运动中间，后来一些重要的职务，都是这些留美的学生担任，他们在推动。

张：包括外交都是这些人，因为当时他们终究是比较先一步接受西方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留学生运动，我们对它的估计，甚至研究都不够。这也是我们香山文化很大的一个特色，是符合近代发展的规律的，你要拯救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不管你愿不愿意，接不接受，你必须向西方学习。

王：容闳先生现在留在历史上最重要的就是，作为留学生之父，推动留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按照原定计划，二十年，而且在中间不断持续地进行的话，我想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和包括我们中国的后来的历史，恐怕有一些就不一定是这种写法。

王：容闳的晚年，由一个改良派变成了一个革命派，他同孙中山这位小同乡的忘年之交可能开始于1900年。容闳认为孙中山“其人宽广诚明有志”，是中国的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孙中山也认为容闳声望素著，寓新思想，是一位热心革命的老前辈。辛亥革命后，容闳写信给孙中山，期望中国成为“一个模范共和国”。孙中山也曾邀请容闳回国辅政，容闳接函后准备回国，但突发疾病不能成行。逝世前嘱咐两个儿子回国服务。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哈特福德市的寓所与世长辞，与妻子玛丽合葬于哈城西带山公墓。

王：孙中山闹革命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而能把银子捐出来让孙中山去闹革命的人大多数是华侨，尤其是香山籍的华侨和商人。好在香山华侨遍布世界各地，香山商人又很有钱。说到香山商人，就要说到一个在近代史上特别受诟病的词——买办。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买办，其实也就是香山买办，香山是买办商人的故乡，像后来成为上海“茶叶大王”、“地产大王”的徐润，担任著名的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担任香港太古洋行代办的莫仕扬，以及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就是在洋行或通商口岸做买办而发达起来的。这些香山买办不但参与创办了中国近代的新式企业，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带头力

量，而且以其思想和行动，促使尘封已久的中国开始了近代文化的破冰之旅。郑观应正是以其买办的经历，而终究成为一位启蒙思想家。

张：我只要向你说明一点，你就可以想像，他影响了好多人，他的《盛世危言》在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一种热，就是《盛世危言》热。

王：当时最畅销的书了。

张：对，不要说对维新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他和孙中山先生是忘年交——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毛泽东就是看了《盛世危言》才离开了韶山去到长沙。那本书是他表哥的，他看得很认真，结果搞破了一些，他表哥很不高兴。现在这本书还陈列在韶山毛泽东的纪念馆里，可见这本书的重要作用。

王：这本《盛世危言》其实是郑观应以他对当时整个世界局势的了解，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本质透彻的一种了解，然后反过来提醒国人。

张：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商战的思想，他没有把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看成一种有专注于战争、军事，就看到了坚船利炮，以为学这个我们就可以抵制，他看得更深刻，他看到经济。

王：就是实际上，郑观应在当时对于鸦片战争，有他自己

的一个看法，就是这场战争，说到底就是一场经济战争，是场商战。

张：他的军事和政治是服从于打开中国的大门。

王：对，为商业，为市场服务的。

张：后来历史完全证明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完全证明了。

王：它就是一场商战，在这商战第一战中间，我们失败了，而且必失败无疑。

张：一定失败。

王：郑观应在这个历史上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但是事实上他不是一个空头的思想家，他所有的启蒙思想都产生于他自己的，实际上是洋务实践之中。他在洋务实践中，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的商业文明，因为西方的商业文明就限制了我们很多的市场规范，以及这个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个商业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国家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包括和英国的商人和军权的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话，就逼着他去研究很多的商法、民法、宪法。在这个时候，他认识到，原来英国之所以这么厉害，绝对不是像洋务运动所说的，它仅仅是个船坚利炮，而这个船坚利炮后面那么复杂、那么系统的一个文明体系。

张：也不仅仅是农矿电。

王：所以他一方面，做着洋务派要他做到种种的实业救国的事情，另一方面，他用他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写出来告诉国人，仅仅做这一些造船的事情、开矿的事情、修铁路的事情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改变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

张：他已经接触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就是制度文化，或者包括了理念，不仅是物质生产文化，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是难得的，

王：所以郑观应是当时最早的一个能够清醒的看到这一切的人物。那么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不是和他在香山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有关？

张：对，我想有密切的关系。他 17 岁的时候也考过一次生员，没成功，科场顿挫。然后，他就到上海，刚刚开埠，鸦片战争以后，在上海学习商业，以后他就到了东南亚，当然港澳地区更是他所熟悉的，那么他就成了一个买办，成了一个企业家，我想这就是他一生的道路。如果没有香山的这种买办文化、商业文化，是不可能郑观应，但是他又推动了香山的买办文化、商业文化。

旁述：郑观应不仅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买办商人，他和他的同乡一起，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买办，人称为“香山买办”。说起买办和买办制度，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员，一直

处于被批评的地位，然而，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批判的官僚买办阶级和香山买办之间，在时空和本质上有着极大的不同。

胡：近代的买办，他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个桥梁。我认为是一个桥梁，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大家都不去接受的时候，中西贸易，中西文化交往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瓶颈。什么瓶颈？就说外国人到中国来，首先你语言就不通，你跟我们本地的度量衡也不太一样，每一个地方的经营方式，交往的方式也不一样，买办要跟洋人通英文，又要跟本地的商人比较接近。而且鸦片战争以后有个规定，就是说，买办本身是买办，但他也是商人，他有一个前提，他本身要经商，洋行又允许他做，他实际是一个物质的中转站和介绍，我们说的中介人、经纪人这样一种职责，

王：在我看的话，买办和香山其实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一种关系，买办就是香山，香山就是买办，买办是香山的人格化，而香山是买办的地域化。比如说，香山文化，香山这个地方，它这种我们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香山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像买办一样，它身上兼有着中国和外国的双重特点，同时它所起的作用也是在两个文明两种商业和两种体制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

胡：香山人比较敏感的，而且意识到这样一个发展的，抓住发展的契机，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外贸易这个发展的这个关节点上，他们能够用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积极的态度去接受这种西方的文化，

旁述：然而买办文化到了后期，江浙买办迅速崛起，取代了香山买办，发展为垄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命脉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打压民族资本，剥削人民，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性质自然也早已和他们的前辈们截然不同。

胡：香山的买办基本上后来都在清政府洋务运动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他们积极地参与这个洋务运动，在政府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放弃了洋行的这种高级优厚的待遇，职位和优厚的待遇，把自己商战的经验，经商的经验 and 跟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拿回来以后办民族的工业，来为国家的富强。那时候洋务运动讲了求强、求富，所以我们说他是创造一种新的洋务文化。洋务文化在哪里呢？他一方面是参加了近代的洋务事业，第二方面他们本身这种国际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比较突出。郑观应提出，我们要用国际法的问题来解决“卖猪仔”的问题，还提出商战的问题。这些思想，包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实现君主立宪，这些东西当时来讲，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要杀头的。他们能够来提倡这件事情，

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这种民族的这样一种关心和情怀，所以很难得。

王：香山买办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人。这种新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农耕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的，它只可能在香山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中间和西方的文化，和外国的资本主义，和外国的商人广泛的长期的接触中间，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新人。这种新人我们过去对他新在什么地方，这种新的素质对中国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也主动地融入了这个全球化的过程，我们现在呼唤这样一种素质，我们正在培育这样一种素质。这种素质其实在 100 年以前，在香山买办史上，它已经具备了。我觉得我们香山帮应该在这一方面好好地发掘一下，然后把这种精神好好地发扬一下。

胡：这方面我们中山一直在做这个事。我刚才前面讲到香山文化具有传承性。他为什么有传承性？开放传承到今天，香山文化也一直在发展，而且我们市委市政府非常注重香山文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我们《香山文化》这本书的编撰，里面已经分成几大块，这里面在提炼这种精神，所以我们今天寻找城市发展的动力，寻找乡土的情怀，培养乡土的意识，增强城市的

凝聚力，这方面其实我们也在做这种工作。

王：濒临珠江入海口的香山由于地缘和人缘的契机，在中国翻天覆地的现代化进程中，风云际会地成为了中外交流的一个关键地带，催生出既源于中国传统又融合外来因子的香山文化，得以开风气之先，又能领风气之先。从1847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开始，可以发现正是香山人率先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从而掀开了中国人自强兴国的恢宏篇章，出现了众多思想家、政治家、企业家、学者、艺术家。他们或者为追求国家富强对民主革命做出巨大贡献；或者为推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而功绩卓越；或者呼唤思想启蒙倡导顺应历史潮流；或者在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上建树颇多。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典型代表，也是香山独特的地域文化的精神象征。

王：说到孙中山先生，我们还要回到一个老问题，就是说他是香山人，他显然也是那种地域、那种环境的产物，如果没有那种地域、那种环境，不会有孙中山先生。

张：对，完全正确。我的故乡能出义和团的领袖、大刀会领袖、红樱枪会的领袖，但出不了这样的孙中山。所以孙中山

就是香山的儿子，也是岭南的儿子、中国的儿子，但他同时对祖国、对岭南，特别对香山起了重大作用。

王：那么，孙中山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中国之外的这种事物。

张：也是很年幼，这是只有香山人或者广东人才有这个机遇，12岁跟着他母亲登上澳门的船，用3个月时间到了美国的夏威夷。

王：这个对他肯定是震动很大。

张：他自己后来说了，“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对他后来他的进展，他的不断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跨越，起了重要的作用。

王：你是研究岭南文化也是研究孙中山的专家，你觉得在岭南文化和孙中山之间到底有种什么样的联系？

张：我觉得，只有孙中山经过香山文化的陶冶，他能够开放，敢于创新，他能够包容，所以他接受了西方大量的思想。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他自己多次讲过，主要是来自西方。他借取的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8世纪，自由平等博爱，然后是林肯，美国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总统林肯，他的民有、民治、民享。

王：林肯的“三民主义”。

张：林肯的“三民主义”。然后他接受了很多关于民权，天赋人权，有些他不赞成，他有看法，但是接受。人权、民权这些，民族的独立，这一切在我认为只有香山人才如此敏捷的、大量的、没有保留的接受。

王：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南京，就是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地方，现在南京给自己打造城市文化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城市叫做博爱之城，这显然来自孙中山。

张：我觉得好极了，而我们中山，现在的中山市，在三年前确定当代现代中山人精神，就已经提出了八个字，而群众反应最强烈的、最首位的就是博爱，请你看看——

王：“传承伟人故里历史文化，宏扬中山现代人文精神”，下面是八个字，“博爱 创新 包容 和谐”，这应该说是孙中山的理想是一个现代阐释。

张：对，毫无疑问，它既有时代精神，继承了整个香山文化的传统，而且这里突出了孙中山，因为孙中山一生写得最多是博爱，包括他的夫人——宋庆龄也是这样的。什么叫博爱？孙中山讲得很清楚，为四万万人民谋福利。

王：对，三民主义就是一种博爱精神，没有一种博爱的情怀，怎么会有三民主义。

张：是一种大爱、一种博爱、一种泛爱，我非常赞成。他

就是说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都是要爱，难道这个有错吗？

王：没有错。对于孙中山先生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孙中山自己说过他是越挫越奋，而且所有和孙中山有过接触的人在回忆孙中山的时候，无不对孙中山先生的这种精力充沛，和这一种充满着热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东西，包括他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他能够接受很新的事物。同时的话，他有一种很外倾的性格，不是一种我们内陆文化形成的那种内敛的，他很外倾，他热情洋溢，充满着革命的激情。他的理想是非常宏大的，甚至是很遥不可及的，但他具体是他革命的手段，他却能够进行很多妥协，有时候我们甚至说，有很实用主义的东西。那么包括他这个在很多方面，各种各样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他往往能够很公允的、折中的态度，来团结很多同志，是吧？所有这些特点，是不是和岭南文化也有些联系，岭南人我觉得就有这种特点。

张：非常正确，他体现了博爱、开放、创新、调协。

王：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40 周年，在 140 周年的时候我们来纪念孙中山先生，你觉得孙中山先生给我们国家、给我们民族、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张：我觉得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我不说了，

他的三民主义，还有他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是我们建设新世界的时候必不可免接受的东西。他很多具体的建议和方案，比如黄浦大港和东方大港，我们也在实行，但是我想这个比较容易，可是象他留下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那是长远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取向。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也属于全世界。

